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精神

林贤治主编

（捷）克里玛／著

崔卫平／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拉格精神/（捷）克里玛著；崔卫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3
（曼陀罗译丛）
ISBN 7－5063－1328－6
Ⅰ．布…　Ⅱ．①克…②崔…　Ⅲ．散文－作品集－捷克斯洛伐克－现代　Ⅳ．I51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330 号

布拉格精神

作者：［捷］克里玛
译者：崔卫平
责任编辑：懿　翎
装帧设计：吴　勇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50 千
印张：7.5　　**插页**：4
印数：001－8000
版次：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28－6/I·1316
定价：12.00 元

《曼陀罗译丛》总序

林贤治

说到翻译，自然会想起鲁迅。

作为现代翻译的前驱者，鲁迅最注重的无疑是精神，是思想的破坏和建设。他翻译社会科学书籍，犹如“盗天火”,虽然本意在“煮自己的肉”,可是黑暗中毕竟留下了令人瞩目的火光；用他的另一个比喻来说，亦即所谓“偷运军火”罢？至于文学作品，所译除了俄国，几乎全属被压迫的弱小的民族；选择的作家，也都偏重不大著名或竟是无名的，甚至有意避开“大师”——事实上，贩卖“大师”者大有人在。他走着自以为“最平正的道路”，用文艺来沟通人类，使彼此不隔膜，相关心。他提倡“硬译”，简直唱独角戏，恐怕至今仍然逃不掉博雅之士的讥诮，而以为愚拙。然而，他的目的，正在于拿来救治中国人的思维和文法的贫乏。思虑是更广远

的。

战争，运动，大半个世纪已然过去，可谓世易时移了。今天，除了一些必须的禁忌以外，好像一切都变得“商品化”起来，其中包括文学翻译。一部古典名著，同时衍生出十几个译本；重译未尝不好，无奈粗劣得可以。严肃一点的著作无人问津，而色情，暴力，迷信，却蒙了众多洋人的脸谱，日见挤轧于书肆。细究起来，这也原不足怪的。正如火药，有用以开路者，有用以搏击者，但也有用做爆竹，放焰火者。同为翻译，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有时候便想：鲁迅当年开的路，究是个人走的呢，抑且给后人走的呢？他如此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先生的足迹之后，至今到底有多少人在走？这就不免教人生疑了。

在有限的接触中，知道了居然还有那么几个人，在各自做着寂寞的译事，心里的感动是难以言说的。中国当代散文的路子本来不宽，这几年更见其窄，原因盖在于众多的目光都盯在“纯文学”上面。80年代中期，汹涌一时的社会思想开始退潮，相当大批的作家和批评家陆续宣告回到‘专业’里去,惟恐‘思想’这东西,最终危及“文体”的正宗地位。于是，美学标准变得至高无上。其实，对于知识分子作家来说，只有当他因广泛的社会关怀而获致多方面的刺激，其自主的开放的思想意识，才需要有相应的多样体裁、技法和风格。任何创造都是一种抗争。在这里，与激情相伴随的不驯的思想永远居于首位，因为只有它，才可以使作家的知识

分子角色得以保持而不致丧失。在此之前，我们简直没有权利奢言艺术的纯洁性。至于思想，本身即具有强大的审美冲击力。真正的美学，是思想的对象化；由于思想对艺术的渗入，从而激发内在生命从脑到心的无比丰沛的交流。我不懂弄翻译，不能作章句的推敲；但是，凭着普通中国人的良知，我能确切地感知这些零散的译稿的价值所在，它们不是一般的文学定义所能范围的。这样也就不惮谫陋，自动承担起邀约，催促，收集，以及联系出版之类的事情来。就算是我同另一位朋友一起做《散文与人》时许下的初衷未改：做一个“拾柴人”。只要有火燃着，——这就是私下所愿望的。

作为一套译丛，而终未以火命名者，盖因另外的一套文丛经由我手已先有了一个我喜欢的名字：“曼陀罗”。心想：就让它们作为姊妹书一样出来吧。

1997年1月



目录

Ⅳ

Ⅴ



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

我在记忆中试图回到战争以前那段时间。那时候我是什么样子？我想我继承了我母亲喜欢寂寞的禀性。我们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它位于布拉格城外的一条道路上，属于这座城市工业化地区的北部。我的父亲在其中的一座工厂当工程师。沿着道路还有另外一幢房子和一座酒吧，那些不想付更多的钱去市中心的人就在这里解馋。那时我没有兄弟姐妹，直到我 7 岁我的弟弟才出世。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住在我们的别墅中，还有一个略长于我的男孩住在路边的另一幢房子里。我和他们的关系都不密切，尽管我也和其他孩子在公园里玩，但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我的玩具上。那时候的孩子并不像现在这样被玩具所包围，所以我仍然记得我的主要玩具。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由床单做成的一道帘幕，我的母

亲在上面画了沃尔特·迪斯尼的三只小猪。在这道帘幕的背后我们准备了好几个布制动物的节目，为了一个难得出现的观众。从那时起，木偶剧演出便成了我的一种强烈爱好，在长大以前我举办了好几次，其中一次是在泰里茨集中营。

像许多孩子一样，我怕单独呆在黑暗中，在睡觉之前，我总是请求将通往有亮光的过道的门开着。偶然有时候，我的父母夜间外出，我便发出一种可怕的抗议，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将我单独留在这座房子里；一般总是有一个女仆。

当我的母亲首次送我上学时（我差两星期 6 周岁），这是我生活中最恐怖的经验之一。那天他们允许父母呆在教室门口，而我整个第一节课都死死地盯着母亲，想要证实她不会把我丢给这样多陌生的孩子和那个完全不熟悉的妇女，她老要我集中注意力看她。像大多数孩子那样，我不喜欢上学（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使得我的童年之梦变为现实，因为我不被允许上学），但我学得很好；我很安静，希望得到表扬，实际上却几乎不情愿回答任何问题。我非常害羞。而当我 7 岁，我刚开始习惯我的同班同学时，我们搬家了，我不得不适应新的一套。纳粹的法律不允许我上第四个学期。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朋友，还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事情如此彻底地使我的生活断裂，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忆起那时同班同学的任何面孔或名字。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来自犹太家庭，我母亲的家庭是通过选择而采纳了犹太人的信仰。在 17 世纪，波希米亚只允许两种宗教：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许多新教会议通知他们的成员宁愿采纳犹太教而不是天主教。也许是错误的推断，这项禁令本来是作为临时的，因为在犹太教的外衣之下他们可以继续保持他们最初的信仰。这种临时状态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而当那个时代结束时，原来的新教教徒已经变成犹太教徒。我记得尽管我的外祖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名自由思想家，但他每礼拜五晚上用一种我不能听懂的语言祈祷。如果说我的祖父辈是自由思想家，那么我的父母则不仅拒绝宗教,同样也拒绝他们的犹太人身分。我父亲相信技术无国界，相信他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如同在家里一样。我的母亲认为他自己是一名捷克人，并为她的福音派祖先而感到骄傲（她甚至让我洗礼，战争刚结束时，我在福音派青年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我提到这些是因为直到战争开始，我从来没有听到‘犹太人”这个词,更别说作为一种侮辱。我不知道犹太人的假日，那些点缀般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仪式与其他孩子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

处于 7 岁的年纪，人们通常不可能对政治感兴趣，但是我却记得希特勒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家庭谈话中，并感到它的下面潜藏着不知羞耻的残忍。我的父亲经常在广播中听他的演讲（我的父母都深谙德语，而我不会），尽管我不懂其中一个字，我甚至也感到了这个咆哮的声音的可怕。接着，我知道了因为我不可能理解

的原因，我们必须搬到英格兰，我父亲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为搬迁感到忧虑，但同时，我又渴望一次长途旅行。我得到了我的第一本带插图的英语书，我的母亲也开始和我一起学习英语。我的父亲想要他的母亲和我们一起走，但她的签证迟迟下不来，接着希特勒来了，很快边境关闭，这在我生活中是第一次，“啪”地一声像关上一只笼子的门，更准确地说，像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一个陷阱。

1939 年夏天我们搬进布拉格，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搬家。我们要住进的那幢建筑物仍然完好无损，由我父亲的姑妈特丽莎为我们提供膳宿。特丽莎姑妈，我惟一认识的富人，她拥有一套布拉格最漂亮的别墅之一（1948 年革命之后，新的当局将其没收，开始是总理家人住在那里，后来是总统本人）。在这个别墅后面是一座漂亮的公园，通往特洛加陡峭的山坡。特丽莎姑妈的女儿和她的家庭也住在这幢别墅里，因此我有了我的两个远房表亲。年纪小的凯蒂和我同岁，我和她建立了我的第一次童年友谊。现在看来有点奇怪，因为盖世太保已经支配着这个国家，并且几乎每周都有一个新的反犹太人的条文颁布，而我们孩子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我们在阳台上度过了漫长的、幸福的时光，玩牌或麻将，采集果实或围绕公园互相追跑。我不可能知道这是我许多年内度过的最后的假期，不知道三年以后凯蒂将迈进一间毒气室。

父母将真实情况对我隐瞒了又是几个月，尽管这

更像是他们对自己隐瞒，或者毋宁说，他们不可能真正设想下一步突然发生的事情。

禁令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我不能离开这个城市，接着我不能去上学、去剧场、看电影、进公园或坐电车去旅行。

差不多在那段时间，华尔特·迪斯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来到布拉格。这个诱惑太强大了，以至难以抵抗；我去了，并在被发现和遭受惩罚的恐惧中看完整个电影。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当时还没有坐牢的经验，但是我的想象压倒了我。这种恐惧如此强烈，因为它触及那未知的东西。

在我们最终搬入的那幢住宅里，住着三户犹太人家庭。露西住在一楼，她比我稍长一点，托米住在二楼，比我小一岁。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并互相帮助。那时候，住在布拉格近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那些住在小镇上和村庄里的人们差不多。夏日的夜晚，人们将椅子搬到人行道边坐着聊天。尽管所有娱乐形式对我们都是禁止的，但我们却没有被禁止这种消遣方式——我们孩子在这些人中间随意走动，随时可能被赶走，但事实上却没有人这么做。如果其中有人觉得我们可怜，他们小心翼翼不将这一点表达出来。接着1941年9月的一天，露西满含泪水跑来，说他们将被放逐到波兰。什么叫放逐？波兰在哪儿？

露西擦着泪水和我们每个人告别。我们中有一人紧紧地拥抱她。第二天我就看到他们全家拖着行李箱走在街上。后来再没有人看见他们活着。托米不久也

死在毒气室里。

我差两周 8 岁生日时，战争开始了。我很快明白了这场战争的结局直接关涉我的生活乃至我的幸存。当空袭警报拉响之后，我就坐在我们这片住宅的地下室里听着飞机嗡嗡作响。我不知道爆炸意味着什么，我仅仅希望英国炸弹落下来，而同时我又害怕炸弹落到我头上，因此我希望根本没有炸弹。我开始对政治和战争的进展感兴趣，在我那个年纪这并不多见。一张巨大的欧洲和非洲北岸地图挂在我房间的墙上。大人不允许我在地图上插小旗子或大头钉，但我每天跟踪前线的变化。很多地名直到我死为止都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像纳尔维克、特隆赫姆、敦刻尔克、格雷特、托布鲁克、班加西、阿拉曼、奥赖利、罗斯托夫或沃罗涅日。战后许多年，当我开始收集旧地图时，我无意识地重又急切地查寻所有这些旧战场——在希腊，在法国，在乌克兰，或在利比亚沙漠。

我不被准许上学，逐渐地，大多数非犹太人的孩子开始回避我。漂亮的玛塞拉，住在我们邻近寓所里的女孩，其父亲宣称自己是一个德国人（将令人厌恶的卍字徽别在自己的胸前），开始在大街上对着我喊：“犹太人！”我不知道她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当我必须在前胸佩戴六角星并写上“Jude”的字，我感到更加困窘，并且根本不愿意出门。

我整天呆在家里干什么？我读书。在所有我拥有的书中，我最热衷于一本复述荷马两部史诗的散文。

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直到把每一页都牢记在心中。好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尽管讲故事的人偏向希腊人，而我却更倾心于特洛伊人。我赞赏赫克托尔，我喜欢帕里斯为他的死亡而复仇。我也生活在一种被围困的状态中，因此支持那些被包围的人。

1941 年 11 月底，我父亲接到传唤被驱逐。他不是去波兰，而是参加设防的小镇泰里茨新的集中营的准备。几天之后，1941 年 12 月 9 日，准确地说是正午前一个半小时（我记得母亲正在做午饭），母亲和我接到了我们的传票。上面并没有提到我的弟弟，他才 3 岁。其他的人有三天的准备时间，而他们只给了我们两个小时。

我母亲在恐惧和绝望中哭泣。我的小弟弟怎么办？她哭得死去活来，我试图归置我的东西，在邻居的帮助下，把它们装进一只皮箱中去。其中最主要的三本书：改编的荷马史诗、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这三本书在后来的三年半中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当天下午，我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囚犯。我丧失了我的名字而被给予一个数字，我至今仍然记得它，“L54”。

对大多数人来说，关押孩子（别提屠杀了）是最卑鄙和最该受谴责的行为。当然这是对的，但是它并没有表达出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本身的情感。回顾我的经验，我要说的是我受的罪比我周围的成年人要小。孩

子比成年人尤其比老年人更能适应，他们缺乏正确地观察事物、充分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环境的能力。他们理解空间的概念也不一样—— 对一个成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禁闭的监狱，对一个孩子来说却可能是一个不小的世界 ——因为他们拥有那种将无意义的事情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之上的能力（妇女也远比男人有这种能力），换句话来说，他们会对微不足道的事情感到欣喜或至少深深受其吸引，即使当他们受死亡威胁的时候。

我回忆得出，在数月的监禁之后，我又一次坐在火车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乡村感到很快乐，我实际上渴望一种改变。我意识到这可能更坏，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高兴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将我的弟弟带来，而这样我们将不再分离。

他们让我们呆在属于泰里茨营房的屋子里。在这里以前住着 10 个或 12 个士兵，现在差不多有 35 个妇女睡在里面。整个房间中没有一点家具。我们把随身带来的靠垫直接放在地板上。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竖躺着放，两只垫子上面睡一个人。简陋的桌子由皮箱代替。那些妇女，看起来大多数来自很好的家庭，习惯于舒适，显然她们以前从来没有在地板上睡过觉，而现在却笼罩在这种新环境的荒芜之中。我不能想象她们其中的人不得不遭受的痛苦：为孩子担惊受怕，被失眠、疾病、种种不便和对未来的恐惧所折磨。起初我对这些都无所谓。相反，我对新环境充满了冒险。我的心情和她们的沮丧正好形成鲜明对比，而这却使得我能克服羞怯和获得自信。我帮这

些妇女提行李，在室内搬来搬去。我感到自己强有力，甚至能够安慰别人。她们听我的；有人还夸奖我，听起来几乎是个悖论，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中，我竟获得了关于我自己如此重要的感觉，这几乎令我感到幸福。

大多数妇女令人难以置信地适应了这种新的、压抑的生活环境。很快歌声甚至笑声充满了房间。她们还讲许多故事，我听得十分开心。

在我们到达一个月之后，第一批迁移又开始了。没有人知道去哪儿，但是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向未知的东西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更坏的某种东西。被选走的妇女重新装好箱子，哭泣着，拥抱着每一个至此还留下来的人们。我置身于仍然留在集中营的人们中间。

关于在德国人的集中营及前苏联的囚禁生活已经有过许多记述，我要说的话也只能重复别人所说的。在三年半时间内，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小块水果，从来没有吃过一只鸡蛋，一小块黄油（那时没有人指望能享受一点有限的胆固醇），更别提巧克力或米饭，一只果子面包或一小片胡萝卜。当然，我并不想回忆食品匮乏的折磨或者说这并不是最吸引我的。然而的确食物在囚犯的生活中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在我所能触及的视线之外，他们以各种方式交易或行贿受贿。

我的第一次爱情也和食物联系在一起。我在故事中所写的她（在名为《我的初恋》的集子中）基本上是自传性的。我甚至没有改变名字，她叫米丽姆。差不多在战争结束之前的一年里，他们开始给孩子们提供一

定数量脱了脂的牛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每天 1/16 升）。那时候我 13 岁，牛奶是由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女孩分配的。一天，她不是给我 1/8 升（我的弟弟和我），而是给了至少四倍的量。这样持续了好几天。为了这种令人费解的慷慨，我只想象出一个原因：这个女孩爱上了我。这种使我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强烈的幸福感，使集中营生活的恐惧几乎消失殆尽。我变得迷迷糊糊，这适合于在那个年纪的人的初恋。对我来说，米丽姆比我见到的其他女孩都漂亮，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话，我仅仅在可以向她投去一瞥的地方徘徊。在那年夏天，纳粹几乎将大多数人送往奥斯维辛，泰里茨集中营几乎被抽空。我和我的秘密的恋人都留了下来，而在我们的营房中照料食物分配的我的姑妈，却被打发离开。她刚走，我的那份破例的牛奶立即减缩，我又回到了我实际上应得的一份儿。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有看出来在我姑妈的离开和年轻的送奶姑娘热情的减退之间有什么联系。很多年以后，我从幸存于奥斯维辛的姑妈那里得知，是她吩咐那个姑娘多给我牛奶的。在我的故事中，我试图隐藏这一点，我做得如此精巧以至没有任何批评家或读者看出其中的联系。也许事情本来应该这样：超额分量牛奶对她们来说是个尚未解开的谜，正和若干年内对我来说是个谜一样。

我意识到自由的匮乏远甚于食物的匮乏。从集中营的窗户我只能看到遥远的山，我不能走出集中营的大门，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使我感到压抑。我记得有一次集中营的学校（这个学校仅存在了几个星

期，因为人员不断的迁移而遭解散）让我们写一篇主题是关于我们的选择的作文。我写了布拉格附近喀尔克林地，写了皮特里山的公园；我写树木而不写人，是因为我认识的人很少。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不是像我一样的命运便是消失在被战争吞没的一个世界里。树代表自由。森林和一种仿佛只有在梦中才能幸免的宁谧联系在一起。

我的老师很欣赏我的这篇文章，让我在全班面前大声朗读。也许在这样做时，她帮助我确立了未来的召唤。但事实上当我写这篇作文时，我知道了写作可以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自由解放的力量，写作可以使你进入实际生活难以到达的境地，甚至是被禁止的空间，它可以将你的客人邀请前来，这是最重要的。

当你走向 14 岁的时候，你偶或会去考虑一下在生活中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自己不去想，其他的人也会替你想，因为生活要求你决定某类学校或职业。在集中营里，没有人为你提供这个。像每一个囚犯一样，我无力决定自己的任何事情，只有接受现实。我把自己交付给争取获得一小份可怜的食物，一块劣质肥皂和冬天里的一篮子煤块；这些东西代表了一个人所能期待的全部。关于未来只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是仍然留在这儿，还是被他们带到那种不再会有任何消息的地方？第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和到那时我是否还活着？一个人们在其中受教育、工作、挣钱和用钱来买东西的世界显得那么遥远乃至不真实。

泰里茨的生活不像别的集中营那样严格有序。没有人检查营房是否合乎整洁，也没有人去管那些必须工作的人早晨是否起床，或者他们白天干什么。尽管每个人始终踩着一根存在或不存在的细绳，但同时，日常的例行公事令人厌倦地一成不变。

白天总是在排队：为早饭、午饭和晚饭；为面包、煤或人造黄油；为水、为盥洗室或厕所。其余时间我们孩子玩我们自己的。非常奇怪的是，我们有一只球，我们用它玩常见的游戏，最多是排球和英式足球。也许是因为我显示出球类游戏的某种才能，在大多数游戏中我总是被推选当头，在这种新的角色中我先前的羞怯一扫而光。在这个时期我经历了最初的真正的友谊，正像我后来所明白的那样，实际上它们仅仅是青春期容易产生的冲昏头脑，因而将每次遭遇、每次偶然的对话都转变为一种异常重要的经验。所有这些友谊都以悲剧结束；我的朋友们，那些男孩和女孩，都进了毒气室，惟一剩下来的一个，我真正喜欢的，他叫阿瑞尔，集中营囚犯自我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儿子，12 岁时死在枪口之下。

关于集中营的囚犯如何团结一致，如何将自己的食物分配给那些更需要的人，人们已经谈得很多。这种团结当然是存在的，例如，我回忆不起来在我们共同生存的空间里有任何偷窃行为。但是偷窃在集中营是存在的，并且在所有东西中最重要的是偷窃食物。我在数星期内之所以得到那份超额牛奶，是从别人那里

克扣下来的。我的姑妈，她在面条生产车间劳动，偶尔也偷带一小块擀面团，这就意味着其他囚犯要减少。那些在菜园劳动的妇女有些夹带一些蔬菜，但是在这儿她们是从我们这些被关押者身上偷盗。对所有这些贼的惩罚是让他们转移，然后死去。但是偷窃现象仍然存在。我自己就多次偷一只生土豆或一小块煤。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得以进入一个贮藏室，里面存放着党卫军们从囚犯那里偷来的行李，我拿走整个一只行李箱。这次成功的偷窃是一次如此强烈的经验，以至直到今天，我差不多仍然记得那只箱子里的全部东西，甚至一对睡衣的式样。

这类偷盗当然可以被解释为贫困和饥饿，但是我后来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其原因要比这深刻得多。当一种犯罪的制度破坏了法律规范，当犯罪是得到认可和赞许的，当某些人可以高踞于法律之上，企图剥夺他人的自由和他们的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水准也深受影响。犯罪的制度企图通过散布恐怖，来维持体面的和合乎道德行为举止，没有这些便没有社会，没有可以让这样的政权来统治的社会。但是事实表明，当人们失去了符合道德的行为的刺激之后，散布恐惧也收效甚微。

我偷来了谋害我们的人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东西，我为我的行为而骄傲，一点也不觉得这种骄傲如何有损于我的尊严。

在后来一些年内我逐渐意识到没有比失去忠诚和道德上被削弱更难以恢复的了，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

迄今如此努力地维持这些东西的原因。

每一个建立在欺诈之上的社会，将犯罪视作正常行为的一部分加以忍受的社会，哪怕是在一小部分特权集团之内，当试图剥夺其他团体的名誉甚至生存的权利的时候，不管在何种意义上，都宣告了其自身道德的堕落，并且最终走向死亡。

在全班朗读那篇作文的成功记忆伴随着我。我又写了几首短诗和开始写一部小说，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部小说是关于美国西部的，却没有涉及我在集中营的生活。有一个战前在中学教捷克语的犯人在她空闲时间教我点东西。她竭尽全力教我韵律的规则，但是理论总归是理论，而诗歌或散文在泰里茨集中营完全不可能找到。

除了写作，我试图掌握绘画的才能。在视觉艺术中如同在文学上一样我都没有受过训练，当然，我发明了我自己的透视方法，而事实是我不能捕获住给我如此多满足的我所居住的房间的肖像。

在很长时间内，我都十分痛惜在我该受教育的期间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但是在所有这些年后，当我回过头来比较将今天的青年人淹没的各种影响、信息和文化（及伪文化）经验中时，我要说我极为珍惜我那点有限的经历。我记得木偶剧院来我们营房演出，以及一场根据斯美塔那《被出卖的新嫁娘》改编的音乐会。这出民族歌剧的代表作，我或许小时候在布拉格民族剧院观看过，竟然在我们监狱营房里上演。这儿根本没

有管弦乐队，而指挥斯切契特先生，只有让一架衰老破旧的簧风琴为歌唱家伴奏。那些歌唱家们穿着最好的衣服，站在低矮的平台上演出。我被挤在其他观众中间，听得如痴如醉。我看见许多人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和我一样想要哭泣。这种经验完全令人沉醉。许多年后，当我再次在民族剧院看同样的歌剧演出，按照惯例有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我却不仅对其音乐失望，自己的体验也索然无味。

　　饥饿和在一种严密禁闭的空间中的被拘留，自然使得我的童年不同于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的经历，但是所有这些中最突出的是死亡的不断出现。人们在我居住的房间里死去。他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灵车上面高高地堆着那些额外的、尚未油漆的棺木，人们推着和拖着它们，许多人自己也很快在这样的车子上面告终。每天在大门口，我读着那些不再能活着看到早晨的长长的人的名单。关于迁移的威胁持续悬挂在我们头上，尽管我对毒气室一无所知，但也似乎意识到他们把人们带入一个无底的深渊，任何人到了那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战争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清理波兰和东德的集中营时，将许多人押到泰里茨来。我每天看到车上高高堆放着的可怜的尸体。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僵硬的胳膊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

　　当死亡时刻环绕在你周围，你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必然发展出一种决断。知道你明天可能被杀掉，这会引起一种对生活的强烈渴望；知道正在与之谈话的某人明天会被杀掉，他正是你所喜欢的人，这会导致内在的恐惧。你会在自己内部砌一道墙，你在其背后将自身的脆弱隐藏起来，你最深的感情，你与他人的联系，尤其是那些与你最亲密的人。这是忍受那种经常性的令人绝望和无可避免的分离的唯一途径。

但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建起了这种内在的墙，在其余的岁月中你将花大力气去推倒它，但问题是，你能否将它彻底摧垮？

伴随死亡而来的是恐惧。我知道我处于一种没有人道的力量支配之下，这是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力量；我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转移，被带到一去不复返的地方；我知道随时都会有一个穿灰绿制服、帽子上有一个人头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揍我或杀死我。

一个成年人可能接受恐惧，屈服于它或将自己封闭于其中，而一个孩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一个孩子只有绝望地依恋一个世界，于其中善的力量将最终战胜恶的力量，于其中坏巫婆上当受骗，恶龙被斩首，即一个童话的世界。在有关集中营的上下文中提到童话世界似乎是一个悖论，但不仅是我和我的伙伴逃进这个世界，那些和我们一样无力无助的成年人，实际上也这么做。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一样，被分成善和恶的基本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生命完全是被决定的，它发生在我们之外的某个地方，处

于我们所能影响的范围之外。然而我记得非常清楚，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善将取胜而战争很快会结束。这种信念帮助我们支撑自己，得以在羞辱、忧虑、疾病和饥饿中幸存。

当然，世界并不是童话的世界，在那个时间和那些地方尤其不是，对在我周围的大多数人来说，那种支撑的信念被证明是空洞的。然而我幸存了下来，我活着看到了结局。对我来说，善的力量，主要地体现为苏联的红军，他们实际地取得了胜利，像许多战争的幸存者一样，这使得我花了相当时间才完全明白，通常并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它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

然而，身处集中营，关于一种黑白分明的世界的幻觉被强烈的感情经验所增强。我如此强烈地渴求那种看起来几乎是不能实现的时刻：自由解放的时刻。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受困于一种感情，觉得他们的生活中缺少激动人心的时刻，缺少一种更深刻的幸福，他们试图在毒品或神秘主义中找到自己感到匮乏的东西。很少有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一种同样深刻的被剥夺的经验，一种深刻的幸福经验是不可能的。

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天的每个细节，我站在拆毁了的监狱栅栏旁边——那道我曾经以为我永远不被允许通过的栅栏——看着没完没了的红军战士的纵队、疲惫的马、精疲力竭的人们、肮脏的坦克、汽车和大炮从身边走过，起先我还看到了一张斯大林的肖像，从这个时刻起这个名字很长时间伴随着我，我难以抑制地抽

泣，我知道我已经自由了。正当我观看的时候，一个德国平民被打死，一辆坦克辗过一个犯人的身体，他太急于得到什么人扔在地上的一包烟，但是这些都没能破坏我的心情，或者使我从狂喜的高潮跌落下来。很多年后，当我回想我的童年时代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一种几乎是亵渎的想法钻进我的头脑：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

以一种相似的方式，那种非同寻常的狂喜的时刻是以随后多年的遭罪为代价的，后者不仅决定了个人的生活，并且是整个民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必然的。相反，至高无上的幸福感觉是感情中最短暂的，但是它可以在后来的很长时间内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造成深深的挫折，尽管继而是无可避免的清醒。

我提到我和成年人共同分享的彻底无力的感情。这是我童年最强烈的感情之一：我周围的那些无力的人不得不面对我们被迫前往的可怕的命运。

没有尽头的、被耻辱地打上烙印和遭受厄运的人们的队伍，由少数全副武装的人所看押，是贯穿我童年的一种印象。这些队伍的长度算起来可能有数公里，但是那些人绝望的数目是无法计算的，它们永远留在我的全部生活中和经常决定我的观念及主题的轨道。

当我思索我的生活和工作，有时想到对一个作家来说，任何经验甚至是最严酷的，也是有用的，如果他

能幸存的话。我并不仅仅是对于讲故事来说，那种最可怕的经验比日复一日的生活提供的要多。当我们处于生和死鲜明的分界线上，突然知道得到解救的狂喜时，那种强烈的和极端的经验，通常比生活中多种多样其他的东西更有力地塑造我们。但是极端的经验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力倾斜。从一种脱节的立场、一种边缘的立场去看，这个世界要比我们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有所不同。犯罪和惩罚、自由和压迫、公正和无法无天、爱和恨、报仇和宽恕，这些问题显得非常简单，尤其在一个没有其他生活经验的年轻人眼里。

我记得战后我如何着迷于报仇的思想。每天我紧张屏息地聆听广播中宣布的那时举行的审判，包括审判捷克卖国贼和纳粹首犯。我欣喜地数着在纽伦堡主要审判中被判死刑的人。我认为我和大多数我的同代人没什么两样，但在不久前，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感情实际上根植的土壤，这导致我重新考虑我的那些过于简单的判断。

我所达到的认识和我试图表达的是：在这个世纪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团体成员所经历的非同寻常的经验，可能使得我们迷失得更远。因为想要从我们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我们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本身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我们若是和自身的经验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童年时代发生的事情无疑影响了一个人其余大部分人生。然而，它两者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不是那么直接的。我知道有些当时比我年长的人后来持久地被一种偏执的感情所占据，相信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随时会卷土重来。对我来说，那种经验恰恰产生了与之相反的影响。我认为我所经历的东西再也不可能重复，我幸存下来的这个事实使我充满了一种期望，即使在我的生活中再度遭遇到此类事，我也将有幸免遭其一切伤害，尽管这很难用理性来解释。处于一定的距离之外，我的战时经验还帮助我免受我成年时期所遇到的困扰。

如果战时经验唤醒了某些人的复仇意识，这同时将使得他们对生活变得麻木不仁，使他们倾向于将任何人看作一个敌人，或哪怕是一个潜在的对手。简单地说，成为某种狂热的牺牲品，他们会经常屈从于作为其对立面的另一种狂热。

隔着时日的推移，我慢慢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形式的狂热只是暴力和恐怖的一种心理前提，一种预兆，并且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好得可以将狂热的企图付诸实践并为之辩护的理论。在我们的时代，惟一的拯救世界的希望是容忍的。另一方面，大批那些无助的、绝望的人，不是被赶进由铁丝和枪支所包围的集中营、便是直接送进毒气室或在广场上被烧死的人，警告我们这种容忍有其自身的限制。这是无可争辩的，希特勒和他的同僚们并不隐讳这种破坏性企图，他们要限制整个社团人民的自由，也不隐讳他们要不惜代价实

现其狂热的决心。如果他们不是遇到不可宽恕的、冷淡的、含含糊糊和软弱的人们，他们或许要收敛一些。容忍再不意味着可以容忍那些不能容忍的事情，不意味着可以容忍那些准备限制任何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的权利的人，尽管有人辩护说这是出于最崇高的目标。

我知道这些都是最简单的原则，但是很多年内，我经常得知实际上正是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最难坚持。一次又一次，我们无力地看着众多的人朝向由狂热的新变种所支配的等着他们的一种命运，我们出于一个最自私的理由，准备去忍受，或至少公开宣称我们无力做任何事情。一次又一次，我们失去了可能不放一枪一弹制止暴力的机会。经验告诉我，如果我们不从灾难中汲取教训，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样简单的原则，我们可以为决定人类命运做些事情的时刻将从我们身旁溜走。

我如何开始

我是布拉格人。我出生在“大萧条”的中期和震撼世界的政治危机的前夜。我提到“大萧条”并不是因为它直接影响了我的家庭，而是它影响了我父母那一代的思想。像许多他们的同代人一样，他们已经不再相信民主政体。对他们来说，社会已陷入危机并且需要彻底的改变。我的父亲在他的领域中是高级专家——在电机结构方面，主要是整流器和电焊机。他也会弹钢琴和通晓拉丁语，并懂六种语言。但在生性上他是一个技术专家。他无疑相信在人类理性和技术方面不存在什么限制，社会必须根据精确的蓝图来加以组织和设计。这样，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头脑受那种幻觉的支配，认为一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是可能的。

在我生活的最初几年我是幸福的。我们住在山腰上一幢朴素的别墅里，俯瞰属于 CKD 公司的综合企

业，我父亲在那儿工作。那儿有一道栅栏，另一边是一座房屋，余下的便都是森林空地和树影。在我们住所下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铁轨，我经常喜欢看机车吃力地爬上小山时所冒出的火花和浓浓烟柱。我们的房子里住着好几家。当时，我曾经跟一个女孩在一起玩，她咬住我的手，也许还表达过她的爱情。那儿还有一条猎狗，尽管我很喜欢它，但它从来也不回报我的热情，不管怎么说，它没有咬过我。

“大萧条”结束之后，我父亲买了一辆小汽车，我们叫它“宝贝”。在那些日子里周围并没有多少机动车。停留在栅栏面前的大多数运输工具仍然是马拉的。在我们的下方还有许多冒烟的大烟囱（它们是 CKD 公司之外其他工厂的），那儿附近还有一座飞机场，不断有飞机在头顶嗡嗡轰鸣。

我还太小，完全不能明白正在酝酿的政治危机。我能记得的我身边发生的那个更大的世界中的第一个事件是马塞瑞克[①]的去世。正好恰逢我 6 岁生日。我的母亲给我准备了好吃的，用面粉、糖、蛋黄做成了我们称之为“小花冠”的东西。她把它们端到桌上，却并没有对我笑，她哭了起来。不久我们学校的校长就前来检查我们的彩色铅笔。凡是有“哈茨缪斯”标签的铅笔一概停止使用，据说是因为这种铅笔由德国制造。我正好有这样一套新的，并且不理解（我甚至还没有使用过）为什么这些铅笔不能派上用场。这个禁令伤害

① 马塞瑞克（Masaryk，1886—1948），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第一任总统。

了我。当然比起后来我所受的伤害它简直不算什么，但是记忆却是那样鲜明，因为这是我自己能够触及到的一个范围。

我的父母都是无神论者。尽管他们的父母仍然接受犹太教，他们自己并不犹太化。他们两人都来自贫苦的家庭，在学校时就不得不当家庭教师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未加入过党派，但却都同情共产党。

因为我的父亲对政治感兴趣，他预见到——像后来发生的那样，他是正确的——如果希特勒的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将会有什么结果落到我们头上。他在利物浦的一个电机厂找到了一份工作，除了他的母亲外所有其他的人（此时我的弟弟已经出生）都已得到签证去英国。但是他不想把她一人留下，因此我们最终没有成行。这次流产的旅行惟一的纪念品是我母亲房间里那只大皮箱。

我开始写作是在泰里茨集中营：一首关于自杀的诗和三篇布拉格随笔。我写它们是作为写作练习，在集中营的一个临时学校里，它差不多办了两个多月。在五年战争期间这是我惟一正规教育时期。后来证明，它还是给了我比我的同学更多的好处：他们忘掉了他们所学的东西而我没有。

我的正规学校教育总是这样古怪。在战后，根本没有新的课本，因此费好大的力气，我们才能找到一本战前的旧课本。不到三年，于 1948 年 2月，政权由新人接管，不仅禁止了所有以前的课本，旧的和新的，他

们也摒弃了大多数过去被认为是学问的东西。

1952 年初，我进了查理大学语言系当一名学生。当时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统治了知识界的所有领域。每一个高层次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包括我的著名的学府，其思想上知识上的独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当然，人文学系受影响最深，我学的是文学和被称作文学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更确切地应被称作“文学的伪科学”。我学到了在艺术中惟一被允许的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还学习了“萨特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世界文化阵营腐朽和道德堕落的象征，变成资产阶级伪劣文化陷入困境的一个样板”。我学习了斯坦倍克的蒙昧主义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精神病态的水准，而福克纳的男主人公意味着“在谋杀方面有组织的训练。”“美国色情作家亨利·米勒”也被说成是教唆其读者将自己变成残忍的杀手。对许多我们的讲课人来说，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已经变成圣经。

而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西方文化垃圾的书籍难以搞到：它们从我们的图书馆和书店中消失了。我很快明白了我必须像我的同学所做的那样：忘掉那些教给我们的东西，或者将它当作进行自我教育的入门。最受我们教师谴责的那些作家作品属于世界文学最优秀者行列。

因此，我的学习时光才没有浪费。在大学第二年，我决定完成我研究卡莱尔·恰佩克的一篇论文，我开始从头做起。恰佩克具体地体现了第一共和国的民主精神。他是盎格鲁–美利坚实证主义的倡导者，是马塞

瑞克的一个私人朋友，是捷克国际笔会一位久任的主席，在他的作品中，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这意味着他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主要反对派之一。恰恰是这些令 1948 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恐慌。开始他们禁止恰佩克的作品，后来又仁慈地考虑到他“反法西斯者”的作用。我的论文的题目《卡莱尔·恰佩克反法西斯的斗争》，而实际上涉及了恰佩克的生活、作品和哲学。感谢恰佩克，我可以把时间花在第一共和国的遗产上面。当空洞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仍然围绕在我周围时，我仍然可以阅读那些杂志和报纸，于其中内战时期那些伟大的头脑自由地对我说话。

1953 年他们逮捕了我的父亲。幸运的是恰逢斯大林去世，在度过了一年多寂寞的禁闭生活之后，他被判处 18 个月的刑期而不是猜测中的 10—15 年。然而，这次坐牢的经验使他眼界大开和使我们这个左派思想家庭的每一个人眼界大开。

当我从纳粹集中营出来之后，我从未怀疑过我将来要从事的职业，我要写作。在我的年纪上我有一大堆非同寻常的经验，但是对于文学，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所知甚少。在泰里茨，书籍是被禁止的东西之一。即使这样，我还是设法随身带了一部荷马的改写本，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在很长时间里，我几乎把后两本书默记在心中。但是它们还不能算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所要阅读的丰富源泉。战后我发现了阅读的美妙和愉悦，

但当我读了一些书之后我很快便感到一种奇怪的急躁。对于我来说真正的愉悦来自写作而不是阅读。和许多刚开始写作的人一样，我并没有调动我自己经验的贮存，而是沉迷于我想象中的充满梦幻的世界。我开始写小说。当我还处于羞于与年轻女人说话的时期，我便开始创作一部厚厚的浪漫小说。这是一部我称之为《伟大的心脏》的史诗，而所有这些东西现在遗留下来的——还包括我的第一部小说《千分之一》，三个剧本和许多短篇故事——是在两本中学练习本上，而它们之所以在一次自我批判的狂怒中幸存，是因为在另外一些更旧的纸张上充满地理学的笔记和拉丁文的翻译。其中一页保留了前面提到的浪漫主义史诗的开头。在第一页上，在标题和所有重要的作家名字旁边，我发现这样写道“：第一卷包括第一部分：第 1 页到 74 页，1947 年 12 月；第二部分：第 75 页到 280 页，1948 年 2 月；第三部分：第 281 页到 380 页，2 月到 5 月。”我不能说这里的页数是否代表我实际写下的页数，但日期却与我对班上一位有点跛足的女生最初的整个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发生的时期相吻合。另外还有三首爱情诗，通常别人用来实现他们浪漫野心的时间，我却整个倾注在一部小说中。

我还记得每天从中学放学之后我就坐在那里写作。整天我都在渴望那个时刻，于此间我可以讲我的故事，那个充满华丽激情的崇高的故事，我是它惟一的、不受限制的创造者和大师。在这之前，我还没有从创作中获得这么大的愉快和喜悦。我粗制滥造了一个

叫做吉瑞的学生伟大的爱情故事，吉瑞爱上了成熟、文雅但是有点残废的伦卡。我发明了由于误解引起的许多令人心碎的场景，在他们的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障碍（并总是幸福地得到克服），只有这样我才能描绘美妙的重新结合。当我这样走得很远的时候我感到很幸福。在我的想象中，我写了伟大的爱情故事，通过它，我经历了现实中不曾经历的东西。我被我的主人公所拥有的巨大的感情所充塞。许多年后阅读这些场景，我看到它们毫无当时震撼我的那些有力的情感，所能够有的只是一点感伤和一些借来的文学上的陈词滥调。我懂得了创作的成果并不和写作时刻作家的感受或经历有什么关联。讲故事有它自身的规则和秩序，它们可能是与讲故事的人自身的情感状态相矛盾。强制性的和坏的作家其悲剧在于他们经常将自己拥有的每一件事放入作品，而作品本身的面貌无法呈现。说到底，写作是一件比我原先想象的复杂得多的事情。这是一种幸运。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将拥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作家，而它将被雪崩似的印刷品所淹没。这很可能是世界所期待的结局之一。

文学和记忆

我经常被问及正在写什么，但是至今没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至今没有人问我所有问题中那个最基本的：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和我如何理解这个概念。人们不愿问我写作的原因，恐怕他们想这也许会令我尴尬，而不去问第二个问题即我对文学的理解，因为他们认为这没有意义。

事实是其答案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过去常常把凡写下的东西都认为是文学。李维、塔西佗，同样还有西塞罗和维吉尔，都简单地被认作文学创造者。我们将圣经称作“书中之书”，于其中我们发现和神话故事并列的有仪式规定、历史记事、箴言集锦、法律条文及爱情诗。许多古代和中世纪关于法律、医药、地理、数学等学科的书都是用韵文写成的。在它们当中，幻想的成分超过事实本身，今天我们更宁愿将

其当作文学来读而不是考虑它们在科学上的优点。只有在现在，我们才开始考虑一门技术性的、最特殊的写作，将其从“文学”中分离出来。并且我们怎样把每天淹没读者的洪水般的垃圾进行分类？关于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精确界线在哪里？当然，有着许多种分界线和定义，其中大多涉及到作品形式上或美学上的特点。从形式上定义文学的尝试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定义中达到了一个顶峰。它也许能将科学著作从艺术著作中划分出来，但是忽略了内容因素，而通过内容，将真正的艺术从仅仅是娱乐中划分出来的一系列品质才显露出来。更有甚者，结构主义对作品于社会的冲击毫无兴趣。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引起对一个理论问题的关注，而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愿意尽可能精确地定义我所以从事的活动的原因和意义。

两百年前，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伊曼怒尔·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询问了同样的问题，他试图区分科学和艺术（艺术是在自由状态下的创造）以及艺术和手工艺（在一种杰出的区分中，他将艺术定义为从中受益的）。康德当然意识到一部作品美学品质的必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创作者本人的作用赋予了密切的注意，或者，用他的术语来说，如果没有天才，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将不可能产生。我并不想分析康德关于创造者现象或他的活动的定义，但是，他发现若不考虑到创造者本人的素质，他的思想及动机，便不能真正理解一部艺术（并且因此是文学）的本质，这是非常关键的。

这使我返回到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上来：我为什么写作？尽管这个问题很少被问及，但其答案可以告诉我们许多。这里，仅举希腊作家纳考斯·卡赞察基茨（Nikos Kazantzakis）说什么东西促使他写作为例："在我们内部，有着层层叠叠的黑暗——喧闹的声响，多毛的饥渴的野兽。那么，没有什么东西死去吗？难道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死去？那些原生的饥渴和忧伤，在人类黎明到来之前的那些夜晚和月光，将继续存活；那些饥渴和苦恼将永远伴随着我们。我曾经惊恐地听见我所承载的可怕的负担在我的内脏中开始吼叫。我将永远不能得救吗？……说到底，我是最小的和最受钟爱的孙子，除了我以外，他们（我的祖先）没有指望和庇护。所有他们遗留下来的复仇、享受和受苦，只有通过我们才能继续。如果我消亡了，他们也将跟着我消亡……"这个充满感情的自白以同样充满感情的作家使命的展望而结束："我知道我的真实面貌和我灵魂的责任：尽可能富有耐心、充满爱意及以我所能掌握的技巧，将这个面貌描绘出来。去'描绘'它？那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将这种燃烧的激情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凯尔律（Charon）将发现我什么也没有带。这就是我最大的野心：什么也不让死亡带走——除了一点骨头什么也拿不走。"（纳考斯·卡赞察基茨《希腊报道》,第26页,布鲁诺·卡西勒出版社，牛津，1965年）

当我最初读到这一段时，我惊讶于卡赞察基茨如此接近于我对为什么要写作和在写作中我期待什么的

答案。我记得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我的感受如何：在一个集中营里我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期，几乎在我周围的每一个人——我的同代人和我的父母、祖父母那一代人——都死去时，我却幸存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赋予了一种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他们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抹去的那种死亡的叫喊。几乎正是这种感情促使我去写作，而我当然没有想要去遏制去写作、创造故事和寻找最好的方式向别人转述我想说的东西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

去变成别人的声音的这种令我振奋的感情，在不同的形式和其他机会中，再现于我的生活之中。在不自由的时期，当我们被谎言所轰炸，每一件真实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自身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和被宣布为虚无和遗忘时，你写作是为了战胜这种毁灭。你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种都将现实、人类尊严、受难、挑战和说真话在它手中泯灭。在不自由的条件下，这种感情为大多数写作的作家所拥有，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只活了不长时间。我们写作是为了保留对于一种现实的记忆，它似乎无可挽回地跌入一种欺骗性和强迫的遗忘当中。引用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的一段话说："一个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记忆最初丧失时。他们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接着有人另外写出不同的书，给出不同式样的学问和杜撰一种不同的历史。"在同一本书中昆德拉发明了一个短语并启发了我："遗忘

的总统。”一个在“遗忘的总统”引导下的民族将走向死亡。而适用于一个民族的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失去记忆，我们将失去我们自己。遗忘是死亡的症状之一。没有记忆我们将不再是人类成员。

超越我们自身死亡的斗争是人类的精华。死亡不再是每一件事情结局的情感，是基本的生存情感之一。通过反抗死亡，我们反抗遗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通过反抗遗忘，我们反抗死亡。回到卡赞察基茨充满情感的自白，这种反抗可能采取的形式之一，是创造的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这种确信必然成为创造者当下的头脑状态：因为我创造，所以我反抗死亡。我建立一座比铜还持久的纪念碑。①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忽略为什么写作、为什么创造这种问题的原因，如果我们沉思创造的意义、价值和真实性的话。

战争结束之后，我却并没有从一个幸存者的角度写出关于战争和集中营的经验，实际上关于那些事情我几乎没有动笔。记忆并不仅仅通过对某一种特定经验的如实报道来体现，而毋宁说它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产生于对过去曾经降临又离开的每一件事情延续性的意识，是对于如果我们不想在真空中消失便不能遗忘的那些东西的责任。我们正在经验文明加速度的感觉，包围在我们身边丰富的信息及其喧嚣同时带来危险，即我们将要在它的空洞中走向结局，我们将断绝和

①此句原为拉丁文，贺拉斯（公元前65一公元8)所说。

我们根的联系和陷入取消时间和虚无。同样的危险威胁着文学和所有的艺术。在现代历史的某个时刻，对许多人来说，似乎记忆和传统仅仅是一个必须加以抛弃的负担。在我们这个世纪降临于人类的灾难由这样一种艺术提供帮助，它推崇原创性、变化、无责任感、先锋派，它嘲笑所有的以往的传统和蔑视在画廊和剧院的观众听众，它以一种光滑的愉悦冲击读者而不是提出那些拷问人的问题。出现在这个期间的极权主义制度将先锋派文学视为颓废加以抵制这无关紧要，而基本的事情是它们同样也采取了对待传统和传统价值、对待真正的人类记忆不予考虑的先锋派立场，接着便试图强加给文学一种假冒的记忆和虚假的价值。

每隔几秒钟就有一本新书问世。它们中的大多数将是使得我们失去听觉的那种欺骗的一部分。这种书甚至变成遗忘的工具。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问世是作为其创造者的一种喊叫，是对于笼罩于他本人、同样也笼罩于他的前辈和同代人、他的时代、他所说的语言身上的遗忘的抗议。一部文学作品是激怒死亡的某种东西。

1990 年

布拉格精神

过去的两年里我广泛游历。我访问了许多城市，看到了许多大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公园和宫殿。它们给我留下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混合的印象，一种关于我所看到的东西的模糊的感情。模糊并不是一种记忆力差的结果，而是因为我很少有时间进入和这些城市的联系。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如果我们不去和它建立真正的联系，它仅仅剩下一个名字，一种迅即从我们头脑中消褪的外在形式。要去创造一种联系，我们必须能够观察这座城市，去理解它独特的风貌，它的“自我”，它的个性，在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中形成的它的生活场景。

关于布拉格，人们写下了很多研究文章。已经出版的标有《有魔力的布拉格》或《布拉格——神秘的城市》这样的书名。有趣的是这样的书是由外国人写成

的。我所读过的最好的和最富指导性的关于布拉格的书是由一个意大利人写的，他叫 A.M. 里尔普利侬(A.M. Ripellino)，其他的是由布拉格的德国人或犹太人所写，他们中的大多数，为逃避纳粹，不得不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他们关于布拉格的描写，似乎历来触发着访问我的城市的许多人们的想象。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说德语的布拉格人约翰内斯·乌兹迪尔（Johannes Urzidil)道。对他来说，布拉格的环境有一种童话故事般的美丽，在这儿你可以生活在“超出民族性之外”，因为民族互相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无形的，难以表述的神秘世界，一个被认为既不是捷克人、也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的世界。乌兹迪尔像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描绘了他的布拉格，其街道充满着闲逛的居民，他当然也描绘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布拉格，有着空寂的小巷、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小店铺、小咖啡馆，更主要的还有啤酒厅和小旅店、学生社团和文学沙龙，自然还有妓院以及地下社会五光十色的都市奇人。当然，主宰这幅画像的是他那代人的经验，也是世纪之交生活在这里的一大群杰出人物的经验。只要想到这些人物便是：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作家哈谢克(Hasek)、卡夫卡、里尔克(Rilke)、魏菲尔(Werfel)、布洛德(Brod) 和政治家马塞瑞克。一

代伟大的演员和歌唱家给捷克和德国的剧院带来欢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德国大学举行讲座，捷克查理大学，在一个长时间沉闷的时期之后，足以因为遍布世界各地许多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的伟大学者而自豪。这样一种才华横溢的创造精神的凝聚当然不可能被解释为外部环境，因为这种环境仅仅提供一个地方，于其中卓越的才华能够释放出来，仿佛是那正在临近的灾难的预感，奥地利帝国在它濒临死亡的那些年头，为自由的创造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这种东西渗透了这个城市的生活。

但是对我来说，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世纪之交的布拉格已不再存在，那些记得这个时期的人也不再存在。犹太人被杀害，德国人被流放，许多伟大人物被驱逐后散居在世界各地，小店铺和咖啡馆关闭：这就是布拉格带给新世纪的遗产。

当然，这种盛行于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的精神在世界各地都已不复存在。但是在别的地方，这种转变不那么富有戏剧性和明显。那么，今天这个城市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是什么呢？

布拉格是普热美德王朝选其作为首都的。从那时起它所控制的地域就不算大，但其在中欧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要使它成为许多外国利益冲突的场所。在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不久，就有其他人加入到捷克人中来：开

始是犹太人，13 世纪又有德国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统治者之下，生活在“波希米亚”这个地方。和受 19～20 世纪民族主义影响的后来的解释不同，最初的资料告诉我们，大多数捷克人和德国移民相处得很好，不管是在边远地区还是在首都布拉格。犹太人的生活不太稳定一些，间或有煽动仇恨少数民族者发泄他们的愤怒，有时候用捷克语，有时候用德语。除此而外，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当鼠疫和战乱来临时，都同样可以忍受的这个地方。

很少有欧洲的战争不影响到捷克这个国家。布拉格经常被包围和占领，然而——也许是因为如此——这个城市更宁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这种政策（经常受到批评）使得它得以幸存，尽管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1620 年，捷克贵族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次失败的起义中丧失了他们的独立性，因此这个国家失去了到那时为止所享有的有限自由。布拉格陷入了不仅是占领军同时也是统治它的那些人手中。在鲁道夫二世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艺术收藏品可供收集，虽然在 17世纪初他们有着当时世界上最有价值和最广博的收藏。鲁道夫去世以后，绘画作品被运往维也纳，但很快又由瑞典人（若干征服过布拉格的民族之一）作为战利品带回。而接下来又由后来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再度运往维也纳。

物质上的损失仅仅是降临到这个城市的不幸的一部分。新教牧师流亡外地，大多数中上阶层贵族也离

去。政府、教育、乃至人们灵魂的托管都落到了外国人手中。曾经是国王们的聚集中心和人文学问中心的布拉格，变成了维也纳伯爵的一个度假胜地。这个曾领导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第一个欧洲城市在不得已的暴力下，尽快地天主教化了。

在那些形容布拉格最流行的称呼中有一个是：“有着一百个塔尖的城市”。很少有人意识到许多尖塔和巴洛克大教堂是在天主教化时期建立的，那是一个对许多人来说是和暴力、被迫流亡、失去家园和失去出生宗教相联系的时期。

然而另一方面，也不能说这个城市仅仅经历着摧毁。新的传教士进来建立新的教堂，新的统治者让人们为他们建造新的宫殿，所有这些都帮助布拉格的自由民和普通人们创造一种生活背景。正是在那个期间，大多数享有盛名的宫殿和花园都由欧洲最优秀的巴洛克建筑家设计和建造。

然而同时还有一些事情被弄糟。这种失败持久地影响了这个城市的精神，除了几个短暂的时期外，失败、丧失自由、被外国统治者所征服便没有消失过。经常是在急促的成功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失败和新的沦丧。但是这正是这个城市的神秘性，它甚至能够从如此不祥的命运中引出某种积极的东西。

最显著的布拉格特色之一是它不夸张。弗兰茨·卡夫卡（像许多其他知识分子那样）经常抱怨在布拉格每一件东西都是小而狭窄的。他当然说的是生活环境，但也是这个城市自身的真实情况，它的实际范围。

布拉格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大城市之一，但你不会在市中心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那儿有许多宫殿，尽管里面富丽堂皇，却有着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外表，表面上看上去几乎像军队的营房，比它实际所具的规模要小得多。上个世纪末，布拉格人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它的原件要缩小五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建了许多中学、大学预科学校和医院，却没有造一座宏大的议会厅，像在伦敦、布达佩斯或维也纳有的那样。1955 年，共产主义者树立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纪念碑，七年以后，他们自己又把它推翻了。

本世纪初人们感到的那种微型化或地方风尚，在今天我们看来毋宁说是一种人性的尺度，一种不可思议的保存方式。

一种比例感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来。捷克生活并不追求夸张卖弄、胡诌乱吹、烟花爆竹、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性狂欢、娱乐场或大型军事游行。它更倾向于市场、季节性节日和简朴的舞蹈。最为显耀的盛典是雄鹰社体操比赛，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举行（它建在布拉格郊区因此其巨大并不导致不和谐）。这次大型活动集合了好几万体操运动员同时在 20 万人面前表演固定项目。但即使这样，它也只是一种克制的和有限制的激情而不是要引起世界的惊奇。

一种和平进程的历史似乎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但是一种充满起义、颠覆、占领、解放、出卖和新的占领的历史，便作为一种负担，一种不稳定生活的不断

告诫而进入人们的生活。布拉格没有很多公共的纪念馆、纪念碑，但是有着许多建筑，于其中无辜的人们遭到关押，折磨和被判处死刑，而通常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这也是布拉格有节制的方面，它并不展示这些伤口，仿佛它希望尽可能地忘掉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把象征着最近时期的纪念碑推倒的原因（皇帝纪念碑和第一代、第二代、现在是第四代总统纪念碑都被推倒，纪念碑唤起人们对征服者的忠诚）。街道也频繁地被更名。仅仅是本世纪内有些街道的名字就被更换了五次。外人走在这些街上对此可能不在意，一个了解某一地区的来访者可能被此弄糊涂并以为自己迷了路。采用新名字来标识街道说明了想洗刷那些不能洗刷的某些东西的企图——它自己的过去，它自己的历史，一种似乎成为巨大负担的历史。

对一个承受他自己命运的人和承受它自己历史的民族来说，忍耐和不屈不挠是必须的。一个城市，也必须有这样的素质。在捷克语中，像在许多其他语言中一样，“忍耐”这个词和动词“遭受”有着同样的词根。从表面上看这个城市省却了战争的蹂躏，比起那些直接受交战行动影响的城市不得不忍受得更多。但与外国观光者不一样，他们只是走旅游图中所给出的路线，而我可以进入到古老的建筑中去，进到一些先前的宫殿里，看到那些自我任命的、粗鲁的后继者们怎样允许将天花板拆除、或者在富丽壮观的大厅里横砌上新的围墙，将它们变成私人或官方的公司。我看见在欧洲数得上是最漂亮的带台阶的花园被潮湿吞噬掉，无人

照看的花坛奄奄一息；教堂变成新的货栈，而最终变成不能贮藏任何东西的地方。如果布拉格还仍然存在，还没有失去它的魅力或美，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像它的人民一样，一直坚持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经常犹豫布拉格的什么地方可以被认为是它象征性的中心。那城堡？那老城广场？威塞斯勒斯广场？那城堡，尽管在明信片上它是最常见的景象，也是艺术家们最经常描绘的，但它对于我来说象征着不同的东西。威塞斯勒斯广场，直到 19 世纪，它还是个市场叫卖的地方，与这个城市的命运缺少内在的历史联系。那么老城广场？无疑地，它具体地展现了捷克历史的重负。将近四个世纪，它一直被看作 1621 年那场不名誉的公开处死 21 个贵族的标志。它变成了羞辱、人性的奸诈、布拉格人随机应变的一个象征。无数次，向眼下统治者敬献忠诚的庆典在这里举行，而不管是受爱戴还是相反（后者更常见），足够多的人来到这里表达他们的效忠，不管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还是被恐惧所驱赶。

对我来说，这个城市物质和精神的象征中心是差不多有 700 年历史、贯穿东西的石头大桥。查理大桥是这个城市的位置在欧洲的一个象征，至少从这座桥的地基铺好开始，欧洲的这一半和那一半就一直在互相寻找。东方和西方。同一种文化的两个分支，却代表着不同的传统，欧洲人不同的宗族。

它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罕见的无可伤害，它有能够

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多少年来，它一直抵挡着涌到布拉格的高高的水流，只有一次它受到损害，在两个世纪之前，有两个桥拱坍塌，它们随同那上面的行人被洪水吞没。但这座桥很快便被修复，今天的布拉格人已不再知道任何关于当代编年史家将其视作自古以来这个城市所遭受的最大灾难之一。

布拉格说的语言也是不虚饰的。它充满了本地方言，不像俄语那样含有那样多华丽激情的东西。今天的一个捷克作家将不愿意将他的城市写成“有魔力的”或“神秘的”；他甚至不愿这么去想。

瓦茨拉夫·哈韦尔在他的剧本《观众》中，试图给不得不在啤酒厂工作的一个遭禁止的作家处境一个称呼,他反复用这样的句子“: 它们是那个悖谬,嗯 ?”“悖谬”这个词适用于这个城市的精神，布拉格充满了悖谬。它布满了教堂，而实际上基督徒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它为自己拥有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及拥有相当数量有文化的人而自豪，但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这里轻视学问的。

另一个悖谬是统治这座城市的建筑物：那个城堡。它是中欧最大的堡垒之一（它的大体方案完成于一系列主要的失败之前），最后一次整修却是在统治者几乎不住在里面的时候。后来它是总统所在地。他们的命运也反映了被他们统治的这个城市的命运。九个前任总统，有四个坐了三年以上的牢；第五个在牢里度过了不长时间，而另外一个（也许更容易遗忘，因为大部分

他在任的时间和纳粹占领期相重合）死在狱中；后来三位免遭牢狱和行刑之苦，仅仅是因为他们逃到国外。在监狱和王室城堡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奇特和悖谬！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如此多的悖谬，在相隔几个星期之内，诞生了两个有着巨大差异但同样杰出的作家。一位是犹太人但却用德语写作，是个素食主义者，是绝对戒酒和自我专注的苦行僧，他如此着迷于关于他自己的责任、使命和自身缺陷，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不敢出版自己的大多数作品。而另外一位则是一个醉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个美食家，是嘲笑他自己的职业和责任的外向性格的人，他在小酒馆里写作并为了一点啤酒在那个地方把自己的作品卖掉。弗兰茨·卡夫卡和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好兵帅克》的作者），两人在相隔不到几条街的地方度过了他们短暂的一生，他们去世的时间也相距不到一年。他们从同一个时期汲取营养创造天才作品，但他们作品似乎不仅在年代上拉开距离，地点也不一样。从那以后，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和以幽默来面对暴力及整个儿是消极的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

过去时代的布拉格已经结束。没有人能够使那些被杀害的人重返生活，大多数那些被驱逐的人也很少有可能返回这个城市。然而布拉格仍然存活重又体验自由。它的精神也完好无损。1989年在打开通往自由道路上的革命中这个城市生机勃勃地展现了它自

己。革命通常标志着震天响的标语和旗帜、血流成河或至少是玻璃碎裂和石头乱飞。而赢得“天鹅绒”称号的“十一月革命”，不同于其他的革命不仅在于其和平方式，也在于斗争中主要使用的武器。布拉格几乎所有那些用得上的地方——建筑物的墙、地铁车站、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窗玻璃、商店橱窗、路灯杆，甚至雕塑和纪念碑上，在一段期间内，被难以置信的巨大数量的标语标志所覆盖。尽管它们有一个目标——推翻极权制度——它们的口气却是轻快的，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但是在这个别致的、不动声色的斗争的核心，仍然居住着激越的感情。这是时至今日这个卓越的城市生活中可以说是最杰出的悖谬。

重返布拉格

菲里普·罗斯：这么多年来，在你们国家以桑米兹德版本出版的东西是怎么回事？一般地来说，以很少的数量秘密出版的严肃文学作品必须找到比广泛的捷克读者更有觉悟、更有思想和富有敏锐的感受能力的读者群。桑米兹德出版物在作家和读者之间造成了一种默契一致的团结，这也许是令人振奋的。但是，因为桑米兹德是对审查制度灾难有限的和人为的反应，它实际上不能满足每个人。请和我谈谈由桑米兹德出版物在这里所引起的文学文化。

伊凡·克里玛：你观察到桑米兹德文学养育了一群特殊的读者似乎是对的。捷克桑米兹德产生在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势之下。由外国军队所扶持的当局恐惧批评，他们由占领者所任命，并且意识到他们只能在占领军

的意志下存在。他们也意识到所有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形式最终都导向自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毫不犹豫地实行禁止所有的捷克文化的原因，使得作家不可能写作，画家不可能展出，科学家——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不能从事独立的研究；他们毁坏了大学，教授中的大多数是由那些驯服的办事员担任。整个民族被这场灾难绊住，只能被动地接受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眼看着那些现在才得到尊敬和表现出希望的人们一个接一个消失。

桑米兹德是慢慢地形成的。在 70 年代初被禁止出版作品的我的朋友们和下面这些作家经常隔一个月在我家中聚会一次。他们包括捷克文学最有影响的创作者：瓦茨拉夫·哈韦尔、吉里·格鲁沙、路德维克·瓦苏里克、帕维尔·科霍特、亚里山大·克莱门特、扬·特里伏卡、米兰·乌德和其他十来个人。在这些聚会中，我们轮流朗读我们的新作。同时，像布鲁缪·哈瑞伯和雅里斯拉夫·塞尔弗特，虽然不自己来，但是也将他们的作品送给我们念。警察对这种聚会很感兴趣，在他们的指令下，联网电视播出一个短片，隐秘地暗示在我的套间中正在举行危险的搞阴谋的秘密会议。我被告知禁止这种聚会，而我们又都同意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手稿打印出来，并以打印的价格把它们卖出去。这笔“生意”由捷克最好的作家之一路德维克·瓦苏里克来承担。这就是我们的开始：一个打字员和一部普通的打字机。

这种作品每份复印 10—20 份，其花费差不多三倍

于一本正式出版的书。很快我们的劳动成果便传播开来。人们开始寻觅这些书，一个新的“创作室”出现了，并且经常复印未经许可的东西。同时，设计规格的水平也提高了。通过某种迂回的方式，我们能用国家的装订机器来制作这些书，并且配上那些也遭到禁止的画家的作品。于是许多这样的书将成为或已经是藏书者的骄傲。随着时间的流逝，复印本的数量、篇目、读者都在增长。几乎每个幸运拥有一本桑米兹德的人周围都有一个有兴趣买它的小圈子。作家队伍迅速地发展为有其他的人加入：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违反规则的天主教徒，也有爵士、波普、乡村音乐的支持者，和拒绝在官方发表作品的年轻作家，即使他们是被允许出版的。若干翻译的书也以这种方式出现，政治书籍、宗教书籍，经常还有抒情诗和沉思的散文，全集也有出版的并且有着出色技艺——例如附有注释的，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卡的全集。

起初警察试图阻止桑米兹德，他们在房屋搜查中没收个人的复印本。一段时间内他们逮捕了复印的打字员，有些人甚至被“自由”法庭判刑，遭到囚禁，桑米兹德开始变得像民间传说中的多头龙，像一种瘟疫蔓延——桑米兹德是不可征服的。

然而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据我所知，差不多出了两百期桑米兹德期刊和几千本书。当然，当我们提到几千本书目时，我们不能总是指望它们有很高的质量，但是有一个东西使得桑米兹德和其他捷克文化彻底区分开来：它独立于市场和审查制度两者之外。这种独立

的捷克文化强烈地影响了年轻一代，其中部分地是因为那种遭禁止的气氛。我们估计有些书有上万读者，而不包括其中有些又在国外的捷克文出版社出版，然后以一种最迂回的方式重新返回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不该忘记由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播出的被称为“未经审查的文学”的巨大作用。自由欧洲电台以连载的形式播出了桑米兹德最重要的书，它有着成千上万的听众。（我从这个电台最后听到的书是哈韦尔杰出的《远距离的问答》，英文出版时题为《去捣捣乱》，不仅是关于他自己的生活，也是关于他的政治观点的描述。）我相信“地下文化”对1989年秋天的革命事件起了重要的影响。

菲利普·罗斯：我经常遇到来自西方的关于铁幕背后“审查制度的灵感”，随便的和浪漫的谈论。我敢说有些西方作家甚至嫉妒你们于其中写作的可怕压力和由此艰难培育出来的明确的使命：在你们的社会你们实际是真实的唯一的提醒者。在一种审查制度的文化中，每个人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谎言和真实——文学变成一种生活的捍卫者，人们所坚持的真实的残留形式。我想这和我所处的文化也是相似的，在那里没有任何审查制度，但大众媒介以关于世间所发生的事情最空洞的伪造淹没我们，而严肃文学仍然是生活的捍卫者，尽管社会对此不以为然。

当我于70年代早期第一次访问布拉格回国之后，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的处境和我们美国作家的

处境，“在那儿什么也行不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这儿每件事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但是你们这样写作是以什么样的代价？你怎样估价这种压制所付出的沉重后果，它给予文学这么一种高度重视，让作家来承受你所知道的那些东西？

伊凡·克里玛：你将捷克作家的处境和处于一个自由国家的作家相比较，这是我也经常重复的。我无从评估你的悖论的第二部分，但是第一部分很好地抓住了我们处境中的悖谬。由于禁止和迫害，作家不得不为承担这种重要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出版方面的禁止不仅和对所有社会活动的压制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禁止作家做任何他们胜任的工作。几乎所有我的被禁止的同行都不得不以体力劳动维持他们的生活。擦窗户工人，像我们从昆德拉的小说中得知的那样，那不仅仅代表医生，许多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都以这种方式维持生计。其他比如当起重机驾驶员，或者在地质研究场所从事挖掘工作。当然现在这样的工作对一个作家也许会提供一种有趣的经验。而如果这种工作仅仅延续一个有限的时间，并且存在能从这种笨重的和消耗性的苦役中逃脱的某些前景，那么是可以忍受的。但如果像这样工作 15 年甚至 20 年,如此被排斥在外，便会影响一个人整个人格。残酷和不公正彻底摧垮了那些屈服于它们的人，而另外一些人则如此精疲力竭，以至他们完全不能从事任何创造性的工作。如果他们以某种方式坚持下来，那么也因此

而牺牲了其他的一切：任何休息的权利和经常是改变个人生活的任何机会。

菲利普 · 罗斯 我发现,米兰 · 昆德拉，在这里和我交谈的作家和记者中间是一个令人困窘的话题。对被称之为他的“ 国际主义 ” 的东西存在着一种争议。有些人对我暗示他在国外写的两部作品，《笑忘录》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在‘ 为 ’法国人、‘ 为 ’美国人而写,而且这已经构成了某种文化上的不端行为甚至叛国。对我来说，他似乎更宁愿是一个作家，他一旦发现自己生活在国外，便非常现实地决定不去伪装成他仍然生活在国内，这是最好的，并且他必须为自己发明一种文学策略，不是和他过去的生活保持一致而是和他所处的新的复杂性保持一致。撇开作品质量的问题不谈，在他于捷克斯洛伐克写成的书，如《玩笑》和《可笑的爱情》，与在法国写成的书之间明显的不同，对我来说并不代表着一种正直的丧失，更谈不上他的经验的虚假性，而是对一种无可逃脱的挑战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回应。你是否可以解释对那些对昆德拉在国外的写作感到如此困扰的捷克知识分子来说，昆德拉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伊凡 · 克里玛：他们和昆德拉的联系实际上是复杂的，并且我要首先强调，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只有少数捷克人才会对昆德拉的写作有什么看法：他的书已经多年不在捷克出版。关于责备他为外国人写作而不是

为捷克人而写，仅仅是有关他的许多责备之一，是更重要的关于他的非难之一——他已经失去了和他的本民族的联系。我们的确可以撇开他作品的质量问题不谈，因为对他的反感并不是由这些引起，而是别的某些东西。

昆德拉的捍卫者——这儿有许多——解释在捷克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对于我们最著名的捷克同胞的敌意是如此常见的那种：嫉妒。但是我认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可以提出许多著名的同胞，甚至就在作家之中（国内的如哈韦尔，国外的如斯可沃伦斯基），他们在这儿的知识分子中都非常受欢迎和受爱戴。

我一直用反感这个词。许多刺激造成了这种反感，并且难以找出那些最主要的。依我看，它部分地是由于昆德拉用来表达他的捷克经验的那种简化和展览式的方式引起的。更进一步，他所表达的经验，人们也许会说，和他1968年前身为前制度的一名十分投入和受到嘉奖的追随者的身分很不协调。

像昆德拉承认的那样，极权主义制度对人们是可怕的难以对付的，但是生活的艰难有着比我们在他的表达中找到的更为复杂得多的形式。昆德拉的描绘，他的批评能告诉你的，是你可以从在我们国家住上一段时间的有些能力的外国记者那儿得到的。这么一种图景很容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因为这证实了他的期待，它强化了童话中关于善和恶的观念，那是一个好男孩一遍又一遍听到的。但是对捷克读者来说，我们的现实不是童话。他们期待一种更有穿透力的更复杂的

图景，一种从昆德拉那种地位的作家对我们现实更深刻的洞察。当然昆德拉对他的写作有另外的抱负，而不仅仅是提供一种捷克现实的图景，但是他作品的这些品质对一个捷克读者来说是那么的不中肯。

反感的另一个原因也许在于某些捷克读者的故作正经。尽管他们个人的生活并不是表现得清教徒式的，但是他们对一个作家的道德却如此苛责。

最后，但不是最微不足道的，是文学以外的原因，然而，却是对他的责备的最主要的一点。当昆德拉获得他最深最广泛的世界声誉的时候，捷克文化正在处于困苦斗争之中。他们经历了全部艰难：他们牺牲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他们教授的职务，他们的时间和舒适的生活,例如,约瑟夫·斯可沃伦斯基和他的妻子兹德娜·萨利瓦诺娃，对许多人来说，在国外完全放弃了他们个人的生活而为遭到压抑的捷克文学而工作。昆德拉身处所有这些努力之外。的确这是他的权利——为什么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变成战士？——说昆德拉因为他的写作本身已经为捷克做得很多，这也是可以争论的。就这些，我试图坦率地解释为什么昆德拉在他自己的国家比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那么容易被接受。

在有关他的辩护中，请允许我说，这儿还存在着一种由于过去半个世纪遭罪而形成的对外国人的憎恨。现在的捷克人如此憎恨他们的遭罪，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映。但是依我看它造成了对昆德拉的一种不公正的贬低。无疑，他是这个世纪

伟大的捷克作家之一。

菲利普·罗斯：官方作家，或官方化的作家，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谜。他们都是坏作家吗？有没有任何有些意思的机会主义作家？我称为机会主义作家而不是有信仰的作家，是因为在第一个十年或战争刚结束时，作家当中有许多有信仰者，而后十年中，我推测官方作家都是机会主义作家而没有其他。当然，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并且告诉我，接受官方的权威和尺度，是否继续成为一个好作家？或者说通过这种接受，作品是否自动衰退和妥协？

伊凡·克里玛：的确在 50 年代支持现行制度的作家和在 1968 年占领之后支持它的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别。在战前，被称为左翼文学的东西起着一个相对来说重要的作用。苏联军队解放了共和国大部分地区的事实，以及慕尼黑事件西方强权背弃捷克斯洛伐克的记忆都强化了这种左派倾向。年轻一代尤其臣服于他们的党，认为将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的社会。当然也正是这一代人看破了这种制度和主要是通过布拉格之春运动祛除了斯大林专制制度的魅力。

1968 年以后，除了那些少数迷狂的盲信者外，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再有任何理由分享这些战后的幻觉。在这个民族的眼中，苏联军队已经由一支解放的军队变成占领军，支持这种侵占行为的制度已经变成一群通敌者。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注意到这些改变，那么他

的盲目将剥夺他把自己算做创造性灵魂的行列之中的权利；如果他注意到了但是伪装成什么也不知道，他也许非常恰当地被称之一个机会主义者——它也许是最好的描述。

当然问题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制度不是延续一个月或几年，而又是两个十年。这意味着除了那些少数于70年代末被迫流亡国外的人之外——实际上是一代持异议者，当局苛刻地迫害这些人，其余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接受或甚至支持它。电视和广播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运转，出版社不得不将纸张拿去印刷。十分正派的人们也在想：如果我不去从事这项工作，那么另外的人将做得更坏。如果我不去写——我至少希望将部分真实偷运给读者——那么只剩下那些虔诚或毫无批判地服务于现制度的人了。

我不想说在过去20年中出版任何东西的人必然是个坏作家。的确，当局也逐渐试图将一些重要的捷克作家变成为他们的，于是开始出版他们的某些作品。以这种方式，至少出版了布鲁缪·哈瑞伯和米罗斯拉夫·霍拉布（这两人都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的一些著作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尔弗特的诗歌，后者也在“七七宪章”上签了名，但是可以明白地说，这种出版的努力，它试图越过所有由审查制度所设的陷阱，对许多得到出版的作品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害。在我的脑海中哈瑞伯是仍然活着的伟大的欧洲散文作家之一，也以桑米兹德的形式出版和在国外发表他的作品，我曾经仔细比较过他的著作，在捷克官方出版的东西中

就有这种情况。显然是由审查制度创造的强迫性的转变，给他作品中语言的真实含义上带来了畸变。但是更坏的是这样的事实，有些作家事先用审查制度考虑问题，因而损坏了他们的作品，当然也损坏了他们本人。

仅仅到80年代才出现“愤怒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作者、从事戏剧和抗议歌曲的作者。他们直接地说出他们要什么，甘冒他们的作品不被发表之风险，甚至使得他们的生活处于威胁之中的风险。他们为我们今天拥有自由的文学做出了贡献——并且不仅仅是文学。

菲利普·罗斯：自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一个数目相当可观的当代捷克作家在美国出版的作品：其中有在国外生活的昆德拉、帕维尔·科霍特、斯可沃伦斯基、吉里·格鲁沙和阿诺斯特·鲁斯汀；还有仍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你，瓦苏里克、哈瑞伯、霍拉布和哈韦尔。从一个小小的欧洲国家中，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表现——我不能想象自1968年以来有十个挪威或十个荷兰作家在美国得到出版。当然，产生卡夫卡的地方有着特殊的含义，但是，你我都不会相信在西方对你们民族文学的这种重视是顺其自然的。你知道过许多外国作家，他们对你们的文学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恭敬。你曾经得到特殊关注，你的生活和作品深深吸引着他们的思想。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将来你也许会继续说话，但不是对着我们说这么多，而是互相对话？

伊凡·克里玛：当然，民族苦涩的命运提出了许多不得已的主题。一个作家经常为环境所迫，拥有那种举世无双的经验，而当他去写它们时，呈现在读者面前也几乎是特殊奇异的。并且这也是事实，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许多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作家。即使我想在捷克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对精英崇拜的厌恶，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一切也将要成为过去。捷克作家总是和普通人民日常生活打交道。这既适合于过去的伟大作家，也适合于当代作家：卡夫卡从来没有不去作一个办事员，恰佩克是一个记者，哈谢克和哈瑞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烟雾迷漫的小酒馆里。霍拉伯从来没有离开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而瓦苏里克执着地避免将他从最普通的市民生活中拽出来的每一件事情。当然，因为社会生活的改变，作品的主题也将改变。但我不敢肯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文学将必然地对局外人变得兴趣寡然。我相信我们的文学已经打开了通向欧洲的大门。它甚至对世界文学也是一个冲击，不仅因为它的主题，而是因为它的质量。

菲利普·罗斯：那么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人们呢？我知道现在人们正在饥渴地寻找书籍，但是在革命的热情减退之后，同时团结斗争的感觉消散之后，你是否意识到，比你那时为维护一种不同于官方报纸、讲话和官方所批准出版的书籍的语言而斗争时，这儿的读者将更为减少？

伊凡·克里玛：我同意我们的文学将失去一些文学之外的吁求。但是许多人认为这种第二性的吁求本应由记者、社会学家和政治分析家来回答。那些问题分散了作家和读者的注意力。让我们回到前制度所提供的阴谋陷阱中去：愚蠢的胜利，骄傲自大的强权，对待无辜者的暴力，警察的暴行，渗透生活的冷酷以及劳改营和监狱，对人的羞辱，生活在谎言和虚伪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故事将失去他们的时事性，哪怕作家们将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重新考虑它们。但是新的处境必将带来新的主题——首先是40年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虚空，填补这种虚空将充满了困难、压力、挫折和悲剧。

的确，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种对书籍的感情有着深厚的传统，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虽然现在电视到处都是，但你很难发现一个家庭没有一个拥有若干藏书的图书室。即使我不想预言，我相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现在的变革不会使文学转向一种在聚会中避免无聊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主题。

菲利普·罗斯：新近的波兰作家塔德兹·鲍罗威斯基（Tedeusz Borowski）说关于大屠杀的写作唯一的途径是作为有罪者，作为同谋和参与者：这就是他在他的第一人称自传体小说《通向毒气之路，女士们和先生们》中所做的。在那里，鲍罗威斯基鲜明地把自己放在比奥斯威辛的一个囚犯所处的更加麻木冷漠的道德水准之下，准确地揭示集中营的恐怖，而这是其他无辜的牺

牲者不可能做到的。我想在苏联，一些最有创造性的东欧作家（我用英文所读到的）也把自己放到同样的位置上，如塔德兹(Tadeusz），考威克(Konwicki）,戴尼娄·柯斯(Danilo Kis）和昆德拉(kundera)等，也就是说，这里的三个“K”，他们都曾经从卡夫卡的甲虫中爬出来，告诉我们，当检视制度如何毒害你我的时候，尽管存在着讽刺性和细微差别，但这儿没有不受污染的天使，内在的邪恶如同外在的邪恶一样。但是这种自我鞭打，仍然不能摆脱良心谴责，摆脱植根于制度的邪恶道德习惯。你总是站在真实这一边，承担着所有变成正当的、虔诚的、说教的、反宣传等风险。你不习惯生活在没有被充分了解、可以认识的和客观形式的邪恶之中。我感到困惑，当去除了这种制度，没有它们，只有你和我，这对你的写作、对根植其中的道德习惯将产生什么影响？

伊凡·克里玛：这个问题使得我回过头检视直到现在我都在说的每一件事情。我发现我总是在描绘一种冲突，于其中我在防御一个侵略性的世界，它是制度的具体化。但是我曾经写过的关于在我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被推断成世界比我自己更坏。我必须说这种两分法——我站在一方而世界站在另一方——不仅是作家，而且是我们所有人观察事物存在的诱惑。

不管这个世界或制度或个人或运气或法律是好是坏，这都不是问题所在。我们两人都可以举出若干在自由社会中所创造的作品，于其中主人公不时地受到

一个敌意的误解的社会所嘲弄，并且我们都相信，不仅是世界上我们这个地方的作家才会屈服于这样的诱惑，以二元论看待他们自身内部或他们主人公身上的这种冲突，并且将他们周围的世界也看作是善恶的两分法。

我可以想象现在那些习惯于用两分法看待世界的人，理所当然地能够发现这个世界外部邪恶的某些另外的形式。另外一方面，改变了的处境会帮助其他人走出仅仅是反对制度的残酷和愚蠢的循环，引导他们重新反思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至于我自己的写作现在怎样，已经过去的三个月中，我被这么多的责任所压倒，以至于某日我将在完全安安静静中写的一个故事的想法变得如此不符合现实。但是回答这个问题——至于我自己的写作，我相信我不再必须为一个不幸的社会制度所困扰。

菲利普·罗斯：去年 11 月，在导致新的捷克斯洛伐克诞生的游行中，被遗弃的前囚犯哈韦尔在布拉格发表讲演时，我正在纽约的一所大学中开一个卡夫卡的讲座。我的学生们在阅读《城堡》，其中的“K”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正在为了获得强大而难以接近的控制城堡的官员克莱姆先生的认可而进行冗长乏味和无望的斗争。《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显示了哈韦尔正通过议会的桌子和旧制度的总理握手，我把这张照片带到了课堂上。“现在”我说：“K 终于会见了克拉姆，”而当哈韦尔决定竞选总统时，学生们感到很开

心——这将使得 K 作为后继者进入了城堡，至少成为克拉姆的老板。

卡夫卡的有先见之明的讽刺也许不是他的作品中最杰出的特征，但是想到它总是令人振聋发聩的，他根本不是一个幻想家，创造一个梦境或梦魇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抗。他的小说坚持认为看上去是不可想象的幻觉和没有希望的悖论恰恰构成了一个人的现实。在诸如《变形记》、《审判》和《城堡》这样的作品中,他记述了一个人所受的全部教育——对不幸的约瑟夫·K来说，稍微迟了一点——那些看起来稀奇古怪、荒唐可笑和难以置信，有失你的尊严和不值得关心的东西，最后全部落到你的头上；有损于你的尊严的事情最终变成你的命运。

“它不是梦，”在格里高列·萨姆醒来发现，他不再是一个赡养他的家庭的好儿子，而是一只令人讨厌的甲虫时，卡夫卡写道。在卡夫卡看来，梦是世界本身的可能性、均衡、稳定和有秩序的一部分，是它的原因和结果，一个有尊严和正义的可靠世界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思议的。由那些愤慨的做梦者每天对我们说：“我来这儿并不是被侮辱”，这将令卡夫卡感到多么有趣。在卡夫卡的世界中——并且不仅仅在卡夫卡的世界中——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为什么我们来这儿时，生活才开始具有意义。

我想知道在你的那些来这儿是为了接受侮辱的时期，卡夫卡在你的想象力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当然，在他自己的城市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中，卡夫卡是被

权威们从书架上、图书馆和大学中被禁止的。为什么？什么东西令他们害怕？什么东西激怒了他们？对你们熟悉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创造性感到强烈共鸣的人来说，他意味着什么？

伊凡·克里玛：像你一样，我也曾研究过卡夫卡，但是我在表达他作品中梦想的现实和实际的现实之冲突时略微有些不同。你说，“在卡夫卡看来，梦是世界本身的可能性、均衡、稳定和有秩序的部分，是它的原因和结果，一个有尊严和正义的可靠的世界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我要将“不可思议”这个词更换为“不可企及”的。你称之为梦幻的世界的东西，对卡夫卡来说是真实的世界——于其中秩序在起支配作用，人们能互相产生喜爱、做爱、建立家庭，有秩序地承担全部他们的责任——但是对于拥有执着的真诚的他，这个世界是不可企及的。他的主人公受苦，并非因为他们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强大到能够进入真实的世界，去完成他们的责任。

卡夫卡在那种制度下遭到禁止的原因可以由我的小说《爱情与垃圾》中的主人公的一个简短的句子来说明：“卡夫卡的人格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诚实。”一个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制度，要求人们虚伪，要求外在的一致，而不在乎是否出于内在的深信；一种害怕任何人询问有关自己行为的意义的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人向人们说话时达到如此迷人的甚至可怕的彻底的真诚。

如果你询问卡夫卡对于我的意义，我们可以用某

种兜圈子的方式回到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上去。总的来看，卡夫卡是个非政治性的作家。我愿意摘出他 1914 年 8 月 2 日日记中的条目：“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这儿，历史性的、震撼世界的层面和个人性层面处于相同的水平上。我相信卡夫卡写作仅仅来自他坦露自己个人危机这个最内在的要求，并且这样去解决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对他来说似乎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其次，是他和妇女的关系，在和她们的交往中他不能越过一定的界限。例如，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中那部杀死囚犯的机器是处于结婚和订婚状态的一个出色的、动情和绝望的意象。在写完这个故事几年之后他向密伦娜·雅申斯卡吐露当想到他们生活在一起时的感情：

> 你知道，当我试图写下某些东西（关于我们的婚约），那些在我周边对准我的刀剑便开始慢慢地逼近我的身体，这是最彻底的折磨；当它们盯着我看时，这是如此可怕，以至在第一声叫喊中，我背叛了你，我自己，每件事情。

卡夫卡的隐喻是这样有力，乃至于它们远远超出他最初的意图。我知道《审判》还有《在流放地》被解释成战争期间落在犹太民族头上可怕命运的有独创性的预言，那是发生在卡夫卡逝世以后 15 年。但是它并不是天才的预言，这些作品仅仅证明了一个创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地和真实地表现他最个人的经验，同时也

触及了超越个人的和社会的范围。再回到关于文学中的政治内容问题上去。文学并不是必须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者为更换来更换去的制度担忧，它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仍然去回答由制度在人们中间引起的问题。这就是我从卡夫卡中引出的最重要的教导。

菲利普·罗斯：你出身于犹太人，并且因为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的部分童年是在集中营中度过的。你有没有感到从你的作品中可以辨认出这个背景——或者在前制度之下，作为一个作家它是否改变了你的困境——这方面能否值得谈一谈。在战前的十年中，中欧如果没有犹太人作为有说服力的文化上的出现，没有犹太读者或犹太作家，犹太记者、犹太剧作家、出版家、批评家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欧洲这个地区的文学生活在精神氛围方面差不多又回到了战前的日子，我想不出来——甚至在最初——犹太人的缺席将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捷克文学中，战前犹太人文化是否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或者说在布拉格曾经如此强大的犹太人的精神、感受力，是否给捷克文学带来好处？

伊万·克里玛：任何作为一个孩子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他曾经彻底由一种外在权力所支配，这种权力可以在任何时候闯进来和殴打或杀害他和他周围的人——其贯穿一生的生活恐怕和省却这样一种教育的人略微不同。那种像一小截绳子那样可以折断的生活，是我作为孩子时每日的功课。至于对我的写作的影

响，是一种对于正义问题的执着，对被判刑和遭驱逐、孤独无助的人们的关心。因为我的国家的命运，这些主题从来没有失去过它们的时效性。至于对我的生活的影响——在我的朋友们当中，我总是被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如果一个人从反复被判死刑的处境中幸存，那么他可能终身受制于一种偏执或者说建立了一种并非由理性来证明的确信，相信每一件事最终将幸存下去，并且得到圆满的结果。

至于犹太文化对我们当代文化的影响，如果我们回头看，我们将很容易将某种文化现实理想化，正如以同样的方式，把我们自己的童年理想化。如果回头看我出生的布拉格，说起这个世纪之初的景象，我将为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出色的融合感到惊讶，为这个城市这么多伟大的人物感到惊讶：卡夫卡、里尔克、哈谢克、魏菲尔、爱因斯坦、德沃夏克、马克斯·布洛德……但是，当然，布拉格的过去并不仅仅由那些伟大天才人物的数目所构成，也不仅仅由文化上的浪潮所构成；那也是仇恨、偏执和经常是流血的冲突的一个时期。

如果要说到犹太文化的出色的涌现，在这方面，布拉格比在几乎其它任何地方都亲眼目睹得多，我们必须也承认，这儿几乎不存在一个持久的没有反犹太人的爆发时期。对大多数人来说，犹太人代表了一种外来因素，那是他们无论如何要加以隔离的。无疑地，犹太文化以其无可辩驳的事实丰富了捷克文化，像德国文化一样，后者也在波希米亚有着重要地位（在波希米亚的犹太文化大多用德语写成），它变成发展中的捷克

文化通向西欧的桥梁，其发展过程同时也被压制了两百年。

现在还有什么东西遗留下来？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确实，现在的人渴望用耐性来克服虚无主义的过去，渴望回到未被污染的源泉中去，这是对几乎被忘却的死者——实际上是被杀害者——所发出的警告之声的一种回答。

菲利普·罗斯：哈韦尔这么一个复杂的人，有着恶作剧般的讽刺和完整的心智，一个文人，一个哲学学生，一个有着强烈精神倾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准确而直接地用他的本民族语言说话的幽默思想家，充满逻辑和细微差别的思考，兴致勃勃地大笑，陶醉于戏剧性之中，非常熟悉和理解他本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样一个人在美国比杰西·杰克逊或杰拉尔丁·费瑞罗更没有可能当选为总统。

今天早晨我去了总统府，去参加他举行的关于他的美国和苏联之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听着很愉快，并且有些惊讶——一个总统现场即兴创造这些生气勃勃、流畅和丰富的句子，用富有人性的观察而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方式，这是自林肯遇刺以来白宫所没有过的。

当一个德国记者询问哈韦尔在达赖喇嘛、乔治·布什或米·谢·戈尔巴乔夫这三个他刚刚遇到的人中间，他更喜欢和谁做朋友时，他说：“噢，在同情、同感方面造成一个谁高谁低的等级制度恐怕不是聪明的。”当问及如何描述戈尔巴乔夫，他说他最吸引人的品质之一

是“他是一个当他感到困惑时，从不犹豫地坦率承认的人”。当他宣布他计划在5月15日访问西德时——同一天正是希特勒1939年侵犯布拉格的日子——一个记者注意到哈韦尔喜欢周年纪念，于是哈韦尔立刻纠正他。“不，”他对他说“我并没有说我喜欢周年纪念，我提到的是在政治中戏剧结构般的象征、隐喻和含义。”

在这儿，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为什么这些会让哈韦尔遇上？他或许是第一个被认可的，但是他并不是你们当中惟一顽强的和在讲话能力方面胜过别人的，并且也不是惟一因其思想而坐牢的。我想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他作为这个民族新观念的体现而冒出来？而当他给他的前任胡萨克总统写那封长信时，似乎是一个充满了那种愚蠢的、高调的、完全不懂真实生活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堂·吉诃德式的。是否有许多人认为他不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便是一个傻瓜？对成千上万从来没有对共产主义制度真正地提出反对的人来说，他们并不崇拜哈韦尔，而是拿他当一个方便的工具，仅仅在一夜之间，抛弃你称作和虚无主义的过去的同谋关系。

伊凡·克里玛：在我试图解释被称作“哈韦尔”的突出的现象之前，我要试图表述我认为的叫做哈韦尔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我希望我没有在破坏规则，它仍然在发挥作用，即对于总统的批评实际上仍被禁止。）我同意你对他性格的描绘，作为在过去25年中遇见他无数次

的人，我愿意加以补充。哈韦尔主要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戏剧家而出名的，接着作为一个有意思的随笔作者，最终作为一个持异议者，一个如此坚持原则的现制度的反对派，为了他的深信准备从事任何事情，包括坐牢。但是在这张关于哈韦尔的手艺或职业的图表上遗漏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作为一个戏剧家，哈韦尔被批评家们放在荒诞戏剧的潮流中。但是当哈韦尔的戏剧在我们的剧院中允许上演时，捷克观众最初是从政治剧来理解它们的。我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哈韦尔成为一个戏剧家仅仅因为在当时，戏剧是惟一能表达政治观点的场所。在最初，当我认识他时，对我来说，哈韦尔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第二是一个天才随笔作家，最后才是一个戏剧家，我并不是根据他的成功来确定其价值，而毋宁说是根据他的兴趣、个人倾向和激情的重心所在。

在捷克政治舞台上，民主制度先前的代表不是流亡，便是被关押起来，或从政治屏幕上消失，哈韦尔是托马斯·马塞瑞克所代表的彻底的民主捷克政治惟一的现行代表。今天马塞瑞克更像是一个偶像或作为缔造第一共和国所依据的原则的作者留在民族意识之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善于妥协和采取令人惊讶的政治行为的人，一个善于从事冒险和为道德动机所推动的人。（其中之一是他为出生于一个富有家庭却贫穷、闲逛的年轻犹太人列波德·霍斯纳富有激情的辩护，此人因为谋杀一个年轻裁缝而被指控和判刑。马塞瑞克的这个行为激怒了捷克民

族主义者，在一段时间之内，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被看作犯下了政治上自杀性的错误——他对他的同代人来说似乎才被称作“一个讨厌的东西或一个傻瓜”。）哈韦尔以其道德行为出色地继承了马塞瑞克的“自杀”路线，当然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是在比旧奥匈帝国更难对付的环境下。他1975年写给胡萨克的信是由道德动机所推动的但在表达上是政治的，甚至是自杀性的，就像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起签名运动并因此总是遭受迫害一样。

像马塞瑞克一样，哈韦尔也非常善于进行调解和撮合，他从来不会失去那个最基本的目标：搬掉极权主义制度和用一种新的多元化的民主制度来取代它。为了达到他既定的目标，1977年他联合了所有反对极权主义的力量，不管他们是改革的共产党员——他们很长时间以来全部被开除出党，还是地下艺术成员或专职基督教徒。“七七宪章”最伟大的意义正是在于这个联合行为，我毫不怀疑哈韦尔是这个概念的作者，并且只有他具有这种能力，将如此绝对不同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的人格力量。

哈韦尔作为总统候选人和他后来的选举，首先是这个国家充满事件的革命过程的一个顺其自然的表达。11月底的某一天，我从“公民论坛”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上回来，我的朋友和我谈起我们为官方总统提名候选人的时刻来到了。我们都同意考虑的惟一候选人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但是一段日子之后，显然革命已走到这一步，任何过去和旧政权有牵连的人，都不能

被年轻一代捷克人所接受。在这种时刻惟一合适的候选人出现了——瓦茨拉夫·哈韦尔。而且这是哈韦尔政治直觉的一个例子——杜布切克自然成了斯洛伐克惟一合适的候选人。哈韦尔把他的候选人身分同这样的情况联系起来，杜布切克必须放在这个国家第二重要的位置上。

对相当部分的捷克公众来说，哈韦尔实际上或多或少并不为人所知，或仅仅作为一个富有的资本家的儿子，甚至是一个囚犯，但是抓住民族的革命氛围带来了一种态度的转变。在一种特定气氛中，在人群中间，尽管是彬彬有礼和受约束的，一个人突然把自己等同于普遍盛行的情绪和想法，他从而赢得了人们的热忱。不错，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分享了前制度的所作所为，但是这也是确实的，大多数人恨这个前制度，因为它以可怕的方式使得他们与之共谋，没有人仍然认同那个如此经常羞辱、欺骗愚弄他们的制度。在一段时间内，哈韦尔成为革命转变的象征，是那个引导社会走出危机的人，至于支持他的动机是否主要是形而上的东西，这种支持是否持续或它最终是否建立在更加理性和实际利益的基础之上，时间将会说明一切。

菲利普·罗斯：刚才我们谈到未来。我可以谈谈我自己的预测吗？我所说的可能使你感到惊讶，在你听来是傲慢自大的——自由的富人在告诫自由的穷人，有关变得富起来的危险。多少年你为之而奋斗的某种东西，你像空气一样需要的东西，而我要说的这种空气已

经有些遭到污染。我向你保证我并不是一个拒绝世俗准备做牺牲的艺术家，我也不是一个可怜的富人小男孩在哀诉他的奢侈。我不是在抱怨。我仅仅是在给研究院写一份报告。

因为自从 40 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这儿仍然存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种对社会的粉饰，卫星国们冻结在一种时间偏离当中，其结果是，例如麦克卢恩（Mcluhanite）革命很少触及你们的生活。布拉格仍然是那个布拉格，而不是地球村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你们重新加入的欧洲是一个迅速地变得均匀、均衡的欧洲，一个完全不同于那些正处于完全转变的边缘状态的民族。你生活在一个对种族问题知之不多的社会中，完全不知道巨大的后种族迁徙——你的社会，在我的眼里是令人惊讶地清白。接下来这儿将由市场经济的金钱和金钱的文化所接管。

你对于金钱将采取什么态度？你的写作，刚刚从作家协会的津贴、受资助的出版业的翅翼下解脱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免受市场竞争和出有益的书，现在将会怎样？你们的新政府正在谈论的市场经济，从现在开始 5 年或 10 年以后，你将如何对付由此导致的商业化文化？

当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消费社会时，你们作家将发现自己正被一系列新的对手所困扰，非常奇怪的是，在这一点上，压抑的、贫瘠的极权主义给你们提供了一种庇护。尤其是动荡不定将是一

个敌手，它是文学、文化和语言的无处不在的首要敌人。我可以担保，将再没有抗议的人群在威塞勒斯广场集会反对这个暴君，不再会有任何写作剧本的知识分子被义愤的人群提升到从愚昧中拯救民族灵魂的位置上，这种愚昧将取消所有富有人性的演讲。商业电视播放每一件无聊琐碎的事情——不是那种由愚昧的国家书报检查官所控制的有限而枯燥的谁也不想看的陈词滥调，而是因其娱乐性而绝大多数人任何时间都在观看的那种陈词滥调。你和你同行终于打破了极权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囚笼。欢迎来到完全的娱乐世界。你不知道你们正在失去的东西，或者你已经意识到？

伊凡·克里玛：作为一个说起来也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一个20年只在西方出版作品的人，我意识到一个自由社会，尤其是一种市场渠道给文化带来的这种“危险”。当然，我知道大多数人实际上宁愿选择任何这种媚俗而不是科塔扎（Cortazar）或哈瑞伯。我知道在我们国家诗集能出版到上万本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我想到稍纵即逝的文学或电视垃圾将充斥我们的市场，我们几乎不可能阻止它。并不只我一人意识到这点，在新赢得的自由中，文化将不仅能获得某种重要的东西，而是也将失去某种东西。在10月初，我们有个最好的捷克导演在电视上露面，他提醒反对文化的商业化。当他说到审查制度使我们失去了和我们自己最好作品和外国文化的联系，但也避免了大众文化中最坏的部分时，他激怒了许多人，但是我理解他。一份

关于电视位置的条文最近出现并宣称：电视因其影响广泛的原因，能够直接为最大范围的道德复兴作出贡献。当然，建立一个新的结构的设想，不仅是在一种组织化形式的意义上，也是在作为整体的机构及其成员的道德和创造责任心的意义上，尤其是其领导成员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我们正在经历给我们的电视一个独一无二机会的时期，正在试图做在这个世界上别的地方没有出现过的某些事情……

这份条文当然不是要求引进审查制度，而是呼吁一个超党派的艺术联合会，一个有着最高精神和道德水平的独立的权威的小组。我作为捷克国际笔会的会长在上面签了字，尽管是以个人身分，我甚至想到以这种方式去要求组建自由社会的电视，是如此的不切实际。这份文件的语言令我震惊，那是一种在革命的欣快症中冒出来的非现实和说教的语言。

我提到过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关于这个国家如何将两种制度的优点融合到一起的乌托邦的思想开始出现——来自国家控制的制度中的某些东西，和来自新的市场制度下的某些东西。这些思想几乎是文化领域中最突出的。未来将说明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纯粹的乌托邦。难道在我们国家的电视不是商业电视吗？或者我们继续仅仅是津贴制的、中央命令的广播节目，如果后者仍然保持，它是否能从事抵制大众趣味的要求？我们只有在时间中去了解。

我已经跟你说过在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总是不仅享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得到尊重。在这个不足 1200 万

居民的国家中，有成千上万的捷克文和翻译书籍出版。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国家制度的改变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有关生态的意识惊人地抬头（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在净化环境的同时去污染我们的文化对我们肯定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为了维持一定的水准而去影响大众媒介和教育这个民族，并不真的是如此不切实际的。如果这种理想至少做到部分实现，它像那份文件的作者所说，将自然是大众传播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而且事实上，一种属于精神上的动力，时时来自中欧我们这个小国家。

1990 年



语言的贫困

一个星期天我乘坐公共汽车，我身后一个 50 多岁的男人大声讲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如果有人直接对你讲你也难以弄懂这类故事。尽管我并不关心他说的什么，而我还是感到一阵突然的恶心。并不是他所说的东西令我反感，而是他那说话的声音——他的声调和发音。

捷克语正在衰落，每一个方面都在衰败。她的词汇量正在缩减，除了一些使用了很长时间人们已经不再感到它们是隐喻的东西以外，这种语言已经失去了她的生气。捷克口语越来越变成退化的新闻语言，因为它充满着现成的词汇和短语。

在所有的时间里，人们滔滔不绝地开口，用着那些可怕的、僵化的词语，是因为潜意识中（并且正是）他们感到听者将以任何一种方式领会他们所说的，并且这

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并不真正说出任何东西。

无疑地，我们可以找到口语衰落的许多原因。社会组织和我们知识结构的越来越复杂化，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工作，同时这意味着语言也变成机械的和自动化的。

新成长的许多人在他们的工作中，正变得和现实缩减了的碎片打交道；像他们的世界缩小了一样，他们的语言也萎缩了。像我们的生活变得官僚化一样，我们的语言也变得官僚化。更有甚者，我们被包围在使人丧失听觉的非个人化的大众媒介的喧嚣中，其中流行着衰竭的陈词滥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用来交流的语言怎么可能不受损伤？

然而，语言衰落的这些重要原因比起此时此刻发生的另外一些更奇特的现象来，它们便显得是可以忽略的。我们生活和活动在一个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我并不是指这样一些事实——图书馆已经变成惟一的废物，杂志遭到禁止，历史学家正在从事体力劳动，民族艺术家不被允许出版和表演他们的作品，哲学家失业，而敌视艺术的人正在担任剧院和出版社的艺术领导。我考虑的是最广义的文化的概念，文化作为传统、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概要说明，它包括政治，也包括个人想要生活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以及当受到伤害时能自卫的能力。我所说的文化意味着共同体精神的习俗，意味着这样一些权力：尊重长者和那些聪明智慧的人，把他们放在领导位置上；为死者举行葬礼，并不去亵渎一个人祖先的坟墓和有关他们的记

忆。我心目中的文化的样子是能唤起对于世界变动不居和神秘性的意识；是激发起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习惯。

这样我们便处于文化和语言的普遍源泉当中，处于使世界变得人性化的源泉当中。人们提出问题。他向上帝发问，向统治他的人、他的同伴以及他自身发问。例如，他也许会问：这件石头工具能否杀死一条狼？

在发问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以不同的回答而成长成熟。他甚至也许认为这样一种答案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将杀死那条狼，那么是因为 5 年前的秋分，你曾向要落山的太阳鞠躬致意。而也许有这样的答案：它试图使这个人相信他的工具并非石头做的，或者那根本不是一个工具，或者他们将狼砸死是因为他曾向落山的太阳鞠躬而不是正在升起的太阳？

在发问中人们如果得到不完整的或错误的答案并不会令人泄气。而如果答案是答非所问，是误导、混乱、混淆和毫无意义及威胁性的，那么他们将停止发问。而一个人停止发问便停止思想，因为说到底思想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并且如果一个人停止思想他也停止说话，他仅仅是发出的声音而已。

在文化还没有死亡的任何地方都保持着人与人互相联系的广泛领域。人们向上帝发问或责问自由或法律秩序是否存在。他们审视他们自己和他们政府的行为。这些问题经常引起分歧，但是它们又将人们结合在一个更大的人类社会之内，于其中需要语言作为保

持接触和持续性的手段。在文化沉默的地方，人类社会将消亡，语言也将死去。在任何意义上，这是我们自身历史的教训，因为在这个时期中有着如此多的文化压制，总有一天这个民族的社会和它的语言将变得奄奄待毙。

1977 年

盐——比金子更重要

像春天里的一种流行性感冒爆发一样，人们蜂拥而至，去商店买胡椒等调料，甚至盐。同样，他们以前也抢购过可可粉。

我们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爆发。每当有关于货币改革、物价上涨或谣传战争威胁，人们便开始贮藏。贮藏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的含义。和有组织的步调一致的游行及现政权所要求的热忱信念不一样，此时此刻，公民们体现出一种自发性和缺少信心。在这种恐慌的情形中，他也表现出在这种分配制度下形成的多年经验。这种经验告诉他，他必须买他所能买的一切，而不是眼下他正需要的那些。

另一方面，一个可怜的得到消息的公民至少也懂得，盐的短缺是不大可能的。毕竟，他们冬天把它撒在路上，在斯洛伐克，盐的贮存量可以维持几百年。至于

胡椒粉，我们似乎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其中胡椒粉本身的短缺也不太现实，更成问题的是撒胡椒粉的食品的不足。因此公民们如此贮存并不是担心物资匮乏，而是担心物价上涨。调料的价格无疑地会提高（像其他每一件东西一样）。但是经验也告诉他，作为一种规则，新的价格不会是原来的两倍，关于将要出台的调料和盐的价格，我们谈论的也许只是一克朗的几分之几：更进一步，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盐会变得潮湿，接着变硬，调料会失掉它们的滋味，人们用了一部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把剩余的倒掉。即使他们保存了足够用两三年的，最多一年也就省下 20—30 克朗。

在整个这种形势中，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那些拥有自己的房子、小汽车，更甭提电视、洗衣机和其他当代富裕生活的象征的人，在盐和胡椒粉的抢购狂潮面前，却表现得没有自己的尊严。显然，他们并不认为为买到一小包调料和盐，从一个商店跑到另外一个商店是一有失体面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显示了追逐物质的狂热所支配的生存的不幸。

我意识到今天，尊严并不是最有价值和被追求的，相反，人们更宁愿拥有一种简单的活法，生活逼迫人们去做许多有失尊严的事情，从他在工作中必须填写的各种令人羞辱的调查表，到强迫性地参加同样荒诞的伪选举或游行。与此同时，他投入这样一个世界，那儿的口号是：“攫取你可以攫取的一切，并尽可能多地抓住它们！”这种东西越来越成为时尚。这是一个越来越由联网通讯、腐败和非法特权所统治的世界。他还被

排斥在某些活动之外，通过它们，他可以提高他作为公民和人类成员的自尊。他也被拒绝在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思想及有个性的创造活动之外。我理解所有这些，但是当目击这种盐和调料的风波，我惊讶和悲哀地感到，那样多沉陷于利益至上和令人羞辱的逻辑中的人，甚至不能将自己的尊严放在一张 20 克朗的钞票之上。

一个自然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由于放弃了尊严，这些人在名副其实的危机或一场真正的物质短缺中会有怎样的表现？也许那些自以为对社会变动负有责任的人业已向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开始理解这样的风波提出的不是供应的问题，说到底，是价值问题。

1977 年 9 月

希　　望

许多年前，维科的小说《大自然中的野兽》迷住了我，作者试图精确地指出人区别于动物的品质。他提供的答案是人能够创造仪式、制造护身符，以此作为一个活着的生命出于其自身命运的恐惧，而相信他能够对一种力量施加影响。

但是人如果对这种更高的力量是否也看重他本人并不抱有希望，那么相信比自己更强大的东西又有什么好处？

“因此拥有信仰、希望、仁慈”，像使徒保罗所指出的，“在这三者当中仁慈是最伟大的”。

当然仁慈或爱，信仰和自由经常遭到否定，人们对这些东西一再作出妥协、让步，但是，一旦当人拒绝希望，他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

甚至一个被判死罪的人走向刑场的时候，他或许

还带着一线希望，在最后一分钟他被缓刑或出现奇迹。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走向绞架的力量。

希望总是和未来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人想象一种不同于他所发现的自己实际上所处情形的能力。因此，还有什么比希望更富有人性？

死亡也和未来联系在一起。还有什么比死亡更能和希望相对立？从这个角度看，希望可以被看作人们用来躲避意识到的结局的徒劳尝试，看作反抗无时间性的短暂努力，看作压过宇宙的沉默的绝望企图。

因为死亡显得是人类生活中惟一的绝对，因此，所有希望都只是相对的，都是帮助人们走向绞架的一种幻觉。

从绝对的立场看过去，真正的希望是惟一能够用希望给最终必然性披上外衣的人所提供的，是由能引导人们穿过死荫幽谷的人所提供的。

据我所知，基督教的上帝——或更准确地说，我曾提到的使徒，是以他的名义来说话的，是惟一完成这件事的人。从来没有人能够确凿地判断他所提供的希望是建立在错误之上还是灵感之上，但是无疑地，这是人们可能被赋予的惟一真正的希望。

从那时起，通往永恒希望的道路就展现在人们面前，每一个想要抹杀上帝的人，都感到有责任给人们提供一种代用品。但是因为这样的希望很难和人类灵魂发生联系，因而它通常和包围着人们的世界上的事物相联系。

这个世界的希望变成了人的希望，一种内在的希

望变成了外在的希望。人类创造了世界，同时产生他灵魂声音的地狱，这种声音在痛苦中呻吟，被淹没。

所有和外部世界、和世界中的事物相联系的希望，在它们自身之内都携带着其本身的毫无希望。当人看穿它们的时刻，他便转身走开。但是，因为如果没有希望，生活便几乎是难以忍受的，他于是又寻求新的希望。

像一望便知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仅仅充满机器和其产品的世界上，那也是一个充满虚幻希望的世界。它们创造了将人们带入其致命绝望的循环。

我们越是热烈地迷恋这些虚幻希望，我们便越是和被判死刑而等待一个奇迹出现的人相似，而同时却走向它们本身的毁灭。

1982 年

我们时代的英雄

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有 10 亿人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实际上的人数也许比这更多或更少，但毫无疑问：有关数目肯定是相当可观的。一个难以想象的数目的人们坐在彩色或黑白电视机前，盯着屏幕上 25 个人有点滑稽的来回奔跑的身影。在同一个时间，他们凝视着，体验着——但是，事实上他们体验了什么？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世界杯女子网球联赛，但是在波希米亚，似乎人人都看。每一个人都想看看他们最著名的本地出生的女儿马蒂娜·纳芙拉蒂诺娃。她打得很出色，赢得了每一个人，甚至那些试图假装她并不存在和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正像他们也假装其他上千人没有存在过一样。但是她又回来了，露一下脸并赢了，而且当这一切结束时，她说她希望在下一个 11 年过去之前再来布拉格。当她说这些时，那些有地

位的人面无表情，但是人民高兴。他们甚至原谅纳芙拉蒂诺娃在这里几乎不被原谅的某些事情：他们原谅她变得富有，并且越来越富有，事实上超出这里的人们所能想象的。像她本人所说的那样，在她的车库里她有 7 辆小汽车，其中包括一部皇冠和一部银色的奔驰。

当超级明星马拉多纳那年用他的手攻入一个球，因而把他的球队引向令人觊觎的积分时，一些道德家对这种行为非常气愤。但是我的一个熟人，他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是位职业球员，却向我担保马拉多纳事实上不能再做别的什么。如果他承认他是用手进了那个球，他的队友可能会杀了他。难道我知道具体有多少上千万的美元正处于危机之中？

我的熟人是对的。尽管我们对自己并不承认，实际上我们是在观看百万和数百万的富翁消磨他们生命中的时光。

在古代，一队贫困的演员到了艾尔西诺，以全部的谦卑，为宫廷演出一场戏。丹麦王子对波涅斯提起他们时说：“如果照每一个人应得的名分对待他，那么谁逃得了一顿鞭子？照你自己的名分地位对待他们吧；他们越是不配受这样的待遇，越可以显示出你的宽宏大量。”

今天的演员鞭打我们可怜的观众，按照他们的名分和地位来对待我们。

如果我说到数百万富翁消磨他们生命中的时光，我只是在给某种眼下的状态一个名称而已。在过去，演员给他们的主人逗乐。而今天，演员（或选手）他们

是主人。然而，不管是马拉多纳还是纳芙拉蒂诺娃都不是天生的主人。事实上两个人都来自如此一般的背景，如果说他们在短短的几年内登上了更高的阶梯，那是他们的才能、艰苦的工作和决心的一个说明，同时也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说明：我们的期待娱乐之深。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偶像和英雄。

人们崇敬预言家和烈士的时代早已过去。观众们被歌德或易卜生这样一些名字迷住的时代也已逝去。我们不再尊敬诗人或科学家或著名的发明家。我们也不再于临终的床上念叨那些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名字。甚至似乎伟大的电影明星和流行歌手的时代也正在结束。只有贝利有着和马拉多纳相媲美的追慕者。

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数亿人观看精彩的进攻、传球、声东击西，数亿人如此清楚地看见了马拉多纳用手攻进了那个球而裁判员却没有看见，并因此，马拉多纳的球队坚持到最后并变成世界上最棒的球队。大多数在观看的人可能都吃了一惊，在瞬间感到极度痛苦的困惑，一种孩童式的反应，在童话中总是真实得到胜利，谎言摘下面具，欺骗遭到惩罚。但是，有一个亿的人也知道这种结局仅仅发生在童话中，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马拉多纳受到尊敬。我们当中那些更执着的书生得出结论，最终导致胜利的东西便证明是有道理的。

和在战争中的胜利一样，运动场上的胜利总是算数的。任何人若是不懂得这一点将不会取得成功。而成功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渴求的。

马拉多纳用手攻进一个球，纳芙拉蒂诺娃有 7 部车，这是多么恰如其分。他们都是我们时代的英雄，每个时代的英雄都受到了应有的奖赏。

1986 年 9 月

幸福的处方

大多数人知道这种匿名信。它每隔一段时间在波希米亚流传，也许其他国家也有。最近我所收到的一封信其内容如下：

中国运气：

根据原件将这封信复印 5 份，并把它寄给你认为需要好运的人。在 9 天之内，你将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寄给别人之前加上你自己的签名。〔引者注：我最后收到的一封信包含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129 个人的重复签名；最后一位签名者，显然是我的好运的发起人，在上面有三次签名 –JKM〕原件用西班牙文写成。它已环绕世界 88 次。在 9 天之内接到这封信，你将有 9 倍的好运气。但是只有当你把它寄给你认为需要好运的

人。不要在其中夹寄钱。

下面是实际发生的一些事例：

①蒙特利·瑞宾根收到了信并将其寄出，9天之内他赢得了两千美元

②斯万·罗米塔接到了这封信，把它扔了，9天之内他被淹死。

③J.维克特接到这封信，忘了把它寄出，9天之内死于一场车祸。

④1985年在英国，某人收到了这封信，他不仅把它扔了，而且还嘲讽它。9天之内他的妻子死了，其儿子也患了绝症。他重新找回这信并把它寄出。9天之内他的儿子又恢复了健康。

等着吧，几天之内你将获得一个惊喜，即使你现在也许并不相信。

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人们传递这封信，但是我可以说，他们中只有部分人是受那个愚蠢的原件作者的利他主义动机所推动，而其余大部分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感到了它的威胁。我不能推测有多少人真的相信以这种居然是“中国运气”的方式给人带来好运。（为什么中国运气又要以美元来表达？）他们也许说，它不可能有任何害处，毕竟只是一个游戏。此外，你永远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如果它是对的，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实际上我们周围仍然存在着大量迷信的人们。而那些参加这个连锁信件游戏的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它并不像最初一瞥看上去的那样简单无害。

这封信的内容不仅仅是容易办到，它还是一个威胁。那些不顾尊严在上面签名的人以死亡来威胁我、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如果我不遵从他们的指令的话。它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气焰。当这个匿名作者说有个叫蒙特利·瑞宾根的人赢得了一笔钱，我必须得相信他所说的吗？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如果他要求我的签名，为什么不把事情说得更精确些？诸如蒙特利·瑞宾根生活在什么城市、什么街道和哪座房子？这样我就可以去核实那位匿名作者告诉我的是否真实。另外那位英国人到底怎么了？他是否真的嘲笑了这封信？他的妻子是否因此而遭到惩罚而他们却不去惩罚在英国的系列杀手？我真的要相信这种东西吗？如果我这样做，那么我可以相信任何东西。但是我还不只是被要求相信这种不知羞耻的胡言乱语，为了我所爱的人的缘故，我还被要求传递这种东西。

这封信发出了一个警告：我们失去了和基本的人类尊严、基本的道德准则之间的联系。至少，它意味着这样的人们已不能正当评价要求他们签署的这封信的意义，这也意味着他们已不能正当评价自己行为的意义和责任。

现在放在我桌上的这封信有着 129 个笔迹，他们无疑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人类身分，他们是自愿地加入这个匿名信作者的行列，去散播一种威胁性的信息。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一件更坏和更危险的事：他们赞成这种丑陋的信仰，认为你只要出于良好的意愿，便可以在上面签字（尽管仅仅是签

名而已）并且把任何东西寄给任何要他相信的人，而省却了核实这种要求的麻烦。

今年我已经收到了三封这样的信，除了这封留下来用作写文章的以外，其余都扔进了废纸篓。当我扔第一封时，我遇到了一个有趣的人，和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进一步说，我对没有任何人受到恐吓和威胁感觉良好。当我扔第二封时，在经历了好几天沉闷、严寒的天气之后，太阳终于露出了脸。我同时得到了另外一个回报——大洋彼岸的一个批评家写文章说我的好话。也许我的这些宣称还不够有说服力，因此我正在给手上的这封信签字。我将加上一句：自从我扔掉第一封信至今已经九九八十一天过去了，因此没有人阻止我继续去死。

关于垃圾的简短沉思

在我去往市内有轨电车的路上，有一块小小的闲置无主之地，那儿曾经是一座花园，但是花园主人的房子已经不在了，在树和灌木之间很好地踩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许多年来，它是我散步的最好去处。后来有人往草地上扔一只塑料杯，有人掷一个罐头盒，另外有人倒上一篮子垃圾。没过多久，我意识到自己已下意识地绕道而行，为了避开现在已成为废料和垃圾的墓地的这一小块地。

垃圾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个问题吸引着我，作为一个问题和作为一个隐喻。为了研究一部小说，我曾经作为一个扫马路工短期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所生活的城市和垃圾有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大多数用作垃圾场的地方都已饱和，腾不出一点点多余的空间。一座垃圾焚化炉正在建成，但是它位于一个人口稠密地

区的中部，住在那里的人们抗议（如果我住在那里我也会同样做）他们已经遭受污染的地区，还将充满由于焚烧城市其他地方来的垃圾而产生的烟雾和灰尘。焚化炉仅仅对付已经造成的垃圾，而问题本身仍然存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量生产的年代。当某种东西被大量制造的时刻，它正变成潜在的垃圾。这种情况可以说自古以来就这样。区别仅仅在于所制造东西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一个石头做的揉面槽可以延用好几个世纪，一个木头的手摇曲柄钻为好几代人服务。一个人有一双劳作时穿的鞋，如果不是赤贫的话，他还有一双星期天去教堂的鞋。一直到把鞋穿旧了，鞋也可以延用许多年。当鞋底穿出洞来时，鞋匠就换上一个新的。最终这鞋不能再穿了，那就到了它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我们铺张浪费和屈服于一种崇拜新奇的宗教。在某些东西远远没有破损之前我们就把它们扔掉。甚至我们还没有对它们产生厌倦，却知道它们已不如刚买下的那几个月里那样时髦。我生活在一个远远谈不上被过剩所淹没的国家，这里的人们一直受制于匮乏短缺，主要是缺少自由。我注意到有许多允诺人们将会富裕的前景描绘。这里将会有更充足的物资和更多的垃圾，但是将会有更多的幸福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当我试图去想在我们没有被垃圾埋葬之前，什么东西能够拯救我们时，我想到的是能够令人们满足的或许是能够结束对它们的贪求，将它们豁免的某种东西，是有能力拒绝时髦的专制和拒绝耀眼的式样、颜色的诱

惑，是重新追求质量，而当这样做时，便开始适度或甚至是节制的生活历程。

对表面上的和可见的事物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同样也适合于精神和灵魂方面。信息和观念的过量生产和物品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以数量取代质量。

我们的前人只有圣经和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但他们不仅会去读，而且会背。电视从未听说过。他们读的报纸只有几页。人们得到的信息很少，但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将事情仔细考虑和观察周围的人们和自然。由此出发，许多人能够形成一种他们能够抓住的生活观。但是今天的情况呢？

我们生活在一种信息和观念的泛滥之中，它们当中的大部分在被创造出来时，便已成为垃圾。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们不仅渴望新的物品，也渴望增加新的信息。在半个世纪的匮乏之后，某种供应突然爆发至一个难以想象的水平。左派和右派的概念正待出售，同时伴随着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反犹太人主义和某些改头换面的内部敌人的理论。人们过度地认购它们又将它们丢弃，说到底，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他们所买的那些东西看上去有吸引力和耐用，但经常是它们无非和旧的东西一路货色，只是换了一个包装而已。我惊讶地注意到不久前那些穿过花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垃圾而不是花朵中间行走。

我观察到人们如何参加社会或政治运动，几个月后他们就将其放弃，又去参加看上去更有吸引力但实

际上同样空洞的新的那些。有时人们排队经过我的窗下，大声赞美着那些煽动者，完全墨守着他们曾被劝说接受将会拯救他们的早已死去和过去的观念。

物质垃圾的泛滥是我们不易对付的某种东西。它糟塌乡村、田野，并能污染水和空气。但是就污染头脑来说，精神上的垃圾更危险。头脑被污染的人们会做出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事情来。

1991 年 6 月

论和记者的谈话

自从天鹅绒革命以来，我不断接受来自各国和各种报纸记者的采访。它们通常以下列方式发生：电话铃声响起，我听到那一头彬彬有礼的声音，自称为某某的人说自己昨天刚下飞机，明天又要离开，如果我能腾出一点时间给她那是再好不过了。我说好吧，但是谈话只涉及文学，不要游离到政治或其他我不懂的事情上去。我被告知情况会是这样。

一个小时以后（或两小时），那位记者出现在我门前的台阶上。她问我是否在意她打开录音机。我说没事，然后我们开始。第一个问题必须是关于民族主义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她不在乎，她感兴趣的是我的观点，好吧，我尽可能就我所知道的实事求是地回答。第二个问题又必须是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她也不在乎，她感兴

趣的仍然是我的观点。我重复了昨天晚上我刚从电视的公开辩论中听到的看法。第三个问题却是关于生态学。我同样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她感兴趣的是我的观点。为什么是我的观点？她并不回答，却仅仅报以鼓励性的微笑。我拿出上个星期天我从一份报纸的生态学增刊上读到的观点。谈话以这种方式进行，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但是那位记者感到满意。她仍然想知道谁可以赢得下次选举和某某党派是否真的垮台。

一度我还以为我被问及这些问题是因为提问者期待我提供聪明的答案。相反，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知道在上述领域里我仅仅是个业余身份。如今的社会有的是在个别领域中具备高级资格但在所有其他问题上是个外行的专家，因而政治，或任何其他的一知半解，看上去便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共同语言。因此听到电影明星谈论生活方式，足球运动员就公共事务在发议论，和歌手煞有介事地论及战争与和平，便是不足为奇的。

我对记者解释说，选举的结果难以预料，但我不希望某某党派赢。她感到满意，但是又疑心我不是真的这样想。她觉得她该问我某些有关我工作方面的事情了。但是她该怎么提问呢？她从来没有读过我写下的任何一个字，她担心她也许会得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太过本质的看法，谁将会对此感兴趣呢？于是她有了一个主意：“你现在正在写什么？”她问道。

别误会！她并不是因为想知道我的工作而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所有我被问及的问题

中最普通的那个问题。

“你说‘现在’是什么意思？”

她稍微吃了一惊。“哦。我是说现在你们已经没有人要反对的了。”

我一直如此经常地解释写作是怎么回事，而我已经厌倦了再重复一遍，于是我说：“我不是一个战士。”

她不明白。

“战士战斗。作家写作。他们只分好的和坏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好。”

“是的，”她说，看上去她明白了。“但是你的生活环境彻底改变了，因此你不再能继续写你以前经常所写的。”

“为什么不能?”

她惊愕地看着我。毕竟，她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极权主义已经过去了。”

“那么我该开始写什么？电话？或者长颈鹿？”

她被弄糊涂了。直到刚才，我都像一个服从的小学生那样回答问题，而突然，我变得反抗起来。我当然知道她说的什么意思。迄今为止，我们都在与极权主义作斗争。我们写了迫害和那些折磨人的秘密警察。所有这些现在都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好写了，正如她的国家的作家们那样。

“你真的以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写？”我并不想继续让她难堪。她仅仅是犯了一个有关世界上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学和生活的通常的错误。她相信在不自由的统治时期，文学的惟一使命是和压制作斗争，描绘暴行

和揭露作恶者是它仅仅能够做的事。当然文学作为一个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所以它注定反对所有形式的暴力和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

那么生活的情况怎样？人们彼此爱和恨，他们工作，盼望假期，生病，又恢复了，然后死去。他们哭，笑，自得其乐，又厌烦；他们互相欺骗，或者有着深厚的友情，挨饿，喝醉了，说谎和寻求别人的信任。在伦敦、布拉格、柏林或符拉迪沃斯托克都一样。他们生活的外部环境有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作品的情节，甚至也许构成某个情节的基础，但并不构成文学的真正的精髓。此外，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期——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的时期，也给我们提供了比先前的时代多得多的外部情节素材，原先既令人不舒服，又是僵化静止的。实际上，那些习惯于沿着熟悉的小路穿过凋敝的农村因此而大为感动的人，如今已经踏入了一个充满了允诺但却是未知数的新景色。在某种程度上，欣快症已被焦虑和无助感所取代，甚至被对坏的旧时代的怀旧病所取代。难以想象的腐败的范围如今已经显然拆散了社会的道德秩序，大量的财产正在易手，而它们落到了一小部分决定谁可以拥有它们的官员手中。被原先的制度所迫害的人是最穷的，而那些迫害他们的人，那些当权者，是富人，市场制度偏袒这些富人。为过去的错误寻找一个正当解决的希望逐渐破灭。对一个作家来说，一个充满如此矛盾的时代不正是最令人兴奋和充满魅力的吗？

但是使得好的文学产生的东西既不是压迫，也不

是自由，甚至不是最富有魅力的社会环境。文学中的伟大取决于创造者本人的才能。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生活在不自由的环境中，福克纳和格林生活在自由的环境中。马尔克斯处于两者之间……

这位记者起身并为这次会面而表示感谢。她也想访问一些其他的作家。我没问她为什么，尽管我想我知道。她想问问他们，“那么现在你写些什么？”

1991 年

论　诚　实

很多年内我不能离开我的国家去别的地方，很多年内我目睹不诚实的现象在我周围蔓延。在某种程度上，我将它们和我生活于其中的制度联系起来。在这个国家，人人都感到自己受到欺骗。以此为自己欺骗他人的做法找出理由。我甚至注意到一套几近逻辑的演示过程。当一个小偷根据这种规则行事，他就不会被人看做一个贼。如一个人盗窃了公共财产，或者在一个小范围内，他偷了顾客的东西，然而这里存在的区分在于，他偷的是认识的顾客还是不认识的顾客，而不认识的顾客还分为本地人和外国人。大多数外国顾客都被敲诈，因为如果他来自西方，那么他有钱（拿富人的东西给穷人是正当的），而如果他来自东方，他便被看做一个敌人，因此所发生的是一场合理的游戏。每一个坐出租车来访问我的外国人通常要付 3 倍于本地

乘客的价格。这让我感到难为情，我正打算写一写出租车司机，但就在这时候，革命发生了，出租车司机们对外国人的要价上涨为 5 倍，我也开始出国旅行。

在墨西哥城一个豪华旅馆里，他们在我的账单上加进房间里小酒吧服务的项目。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差不多 20 美元。当我立刻反对，声明我没有从酒吧中拿任何东西时，他们嘲讽地看了我一眼，但还是把这个数目从我的账单上去掉了，如此等等。我知道他们收过另外一笔使用网球场的费用，尽管实际上这个人毕生没有碰过一次网球拍。他们还让一个压根儿没在他们车库停车的人交费。如果有人提出抗议，他们便很快地勾掉这笔虚构的费用，如此等等。在解释这件事时，我提醒自己，墨西哥是个发展中国家，和我以前所生活的那个环境差不多。

一段时间以后，爱丁堡的一家旅馆在我的账单上加进了一顿午饭和一顿晚饭。当我提出我从来没有在那儿吃过午饭和晚饭时，他们删去了这笔钱（它比墨西哥贵多了，苏格兰并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如此等等。同样在这座城市的一家商店里，我给了店主一张 50 英镑的钞票，她却试图把它换成 20 块钱。我指出这其中似乎有错，她努力劝说我（一个无知的外国人）那是对的，后来才迟疑地递给我剩下的 30 块钱，如此等等。我开始明白了，一位绅士不要去检查他的账单。他递上他的信用卡，只管在收据上签字。如果他发现有什么不符合，他也不该去为多付的 20 或 30 英镑争辩。

几个星期以前，在塞尔维亚，我用一张10000比塞塔的钞票为一顿饭付款，结果被当作了1000比塞塔。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发现，而此时为时已晚，多出来的并不在钱柜里。女招待私自吞下了9000比塞塔，如此等等，这令我感到不舒服，我甚至想到写一封信给饭店的老板，告诉他有一个雇员不诚实。但是我的朋友劝阻了我。他们说这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而且无论如何也找不回那钱，他们还会认为我不是一个绅士。

我知道自古以来一直有人在行窃。所有古代的刑法都提供了对于贼的惩罚。在大多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中，我们都能发现得到许可的强盗——罗宾汉劫富济贫。但是，在那些较早的时代，富人比较少而穷人比较多，自然贼的数量是有限的。今天，富人在增加同时小偷变得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给穷人任何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是穷人，因此偷得问心无愧。

在过去，金子几乎可以为你买到任何东西，但是其他价值也在考虑之中：可靠和诚实，一个好的名声和正派体面，对人们来说，是任何物质财富所不能换取的。在今天对于金钱的狂热追逐中，人们似乎越来越失去限制和约束。所有我们的有关诚实和道德原则的标准都已动摇。今天的公民仍然根据少数特权阶层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当然他们已不再是家庭城堡中的王子，而是那些20来岁的百万富翁，他们擅长踢足球、弹吉他、唱风格质朴的歌、打网球或赛车。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协作努力和艰苦工作之后获得收入的，但是，一个旅馆女招待（至少在她自己眼中）不也是艰苦努力地

工作吗？当她拿自己和那些巨星们相比较时她会做什么呢？我相信当那个女招待看出我并没有注意到她如何骗了我 9000 比塞塔时，她不会感到一点愧疚；相反，她会感觉良好，因为这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少了一点委屈而多了一点公平。

我为诚实和不诚实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而感到真正的忧虑，为忠诚无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感到忧虑。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变成不受良心制约的微型小偷而感到忧虑。一个罗宾汉是可以忍受的，在民间传说中甚至有着永恒的价值。但是在每一个收款台或自动收款机旁随时都铭记着一个罗宾汉，由这样的人为我们提供服务，把我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接待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一位绅士的举止和对此不予理睬。但问题是——那样会有任何绅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来吗？

1991 年 9 月




III



有权者和无权者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经历了一种社会状态，于其中那些无权者完全处于有权者的任意摆布之下。得到广泛接受的是，有些人可以被剥夺任何一种权力：自由搬迁的权力，生活的权力，乃至一个有尊严的葬礼的权力。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具备有关社会正义或毋宁说是非正义状态的某些个人经验。正像我们的父辈被社会问题所吸引一样，我这一代人被正义的问题所吸引，更准确地说，被处理那些有犯罪嫌疑的有权者这个问题所吸引。30 年代初期，呈现在我们乐观主义父辈们面前的是无助的个人面对财产、失业和饥饿的压力。而纽伦堡法令、莫斯科审判、奥斯威辛和沃尔库特（Vorkuta）打开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睛，让我们感到个人在面对集权国家可耻或凶恶的暴政时绝望的无助感。上一代人关于经济的

无限发展的没有根据的信仰破灭了。同样，我们这一代人关于按照乌托邦的设计重新组建社会的朴素信仰也破灭了。每一代人都喜欢将其自身经验当作惟一的，将其自身的成功和灾难当作划时代的和前所未有的，这就妨碍了去估计其真正获得的成功及其失败的范围和意义。

违反人性的种种现代罪行并不是这个世纪的发明——装模作样的审判，预先安排好的裁决，将无辜的人们判处死刑，奴隶劳动，大规模枪决，对整个民族的杀戮，等等。我们可以在所能考察的任何历史时期都发现同样的事情。审判苏格拉底、扬·胡斯、布拉格的哲罗姆、吉奥达诺·布鲁诺、卡米拉·德穆兰、玛丽亚·安托万内特、德雷福斯的法庭，同样还有追逼异教徒、持异议者或其他“叛徒”和改革者的法庭，都不是受追求真理的动机所推动。它们并不想弄懂、更不用说判断那些指控的真正详情。它们仅仅企图支持和服务于现存权力结构，同时惩罚任何被挑选出来作为指控的人。它们残酷地惩罚他们，作为一种警告，将恐怖灌输到每一个有他自己不合时宜思想的人身上。在它们了解争端的实质（某些事情它们甚至不能承认，置之不理）之前，在看到有关文件或被告者的面孔之前，它们就已经作好了裁决的结果。

不需要我详细叙述奴隶劳动，毕竟，直到两个世纪之前（对俄国人，对西半球的黑人，仅仅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奴隶是对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所熟悉的事

情。

那么，对整个团体乃至民族的杀戮呢？历史提供了足够的有关种族灭绝的例子。《圣经》中充满了整个王国和公国的人民被屠杀的故事，包括妇女、儿童和家畜。在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数千名无辜的公民被处死。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全体土著民族遭受失败——在一个于那个时代，根据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中。

我们永远不该忘记人类种族的历史是残酷的。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称之为文化、文明、人道主义或合法化的东西不过是覆盖在一种血腥本质之上的薄薄的外壳。因为我们（至少是部分地）确立了这些东西或以它们来命名，便相信决定人类行为的力量已经被驯化制服，这是天真的想法。但是近好几代人却都屈服于这样的幻觉，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一个物质和精神同样丰富的纪元，一个诸如博爱、兄弟情谊、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基本的公民自由这样的概念，它们至少已经流行了几十年（如果不是几个世纪的话），并终于进入我们的生活，并不再有人公然反对它们的时期。

纵观人类历史，始终贯穿着有权者和无权者、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斗争。有权者是埃及的法老，无权者是小小以色列民族；有权者是罗马人，无权者是勇敢而受困的迦太基人；有权者是封建领主，无权者是为数众多但散漫无章的农奴。天主教堂是有权的，那些徒劳地呼唤用《圣经》的力量反对刀剑的分散的追求真理者是

无权的；康斯坦斯的宗教会议是有权的，扬·胡斯是无权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是有权的，用弓箭、过时了的枪支和绝望的决心抵抗加农炮和一支有组织军队的印第安人是无权的；盖世太保是有权的，犹太人和被征服国家是无权的；每一个现代国家是有权的，尤其是不仅拥有所有武器（真正具有威胁性的权力），同时，也拥有控制经济和精神所有手段的极权主义国家，而仅仅具备一种投票权和如何管理国家理论上的发言权的人是无权的。

有权者的实力①从来（或几乎从来）不是来自某种更高的授权，或来自精神上的价值，或由于他们在真理或智慧方面拥有一席之地，尽管有权者总是试图自称是这样。这种实力仅仅来自力量方面的优势。它通常建立在被统治的无数灵魂之上，建立在他们的武器和组织能力之上。

有时候有权者的胜利也恰恰预告了他们的失败，就像无权者的失败和死亡预告了他们的政党、地位和信仰的胜利一样。罗马帝国衰亡了，但至少基督徒的后嗣幸存下来并保存了他们已牺牲的先辈的某些东西。扬·胡斯也被列为圣徒。在历史上有许多次先前的封建领主因害怕他们的农奴而簌簌发抖，正像先前的资本家害怕他们的工人一样。

然而即使他们令人可喜的后代为他们树立了金色的纪念碑，即使在他们的身后被宣称为神或圣徒或民

①我仅仅从实力的立场来探讨。显然，有权者，那些当政者，也做了大量必要的和有用的好事。

族英雄，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他们都被杀害了，他们惟一的、不可取代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并且在其全盛时期被切断 苏格拉底、基督、扬·胡斯、吉奥达诺·布鲁诺、卡米拉·德穆兰、伊萨克·巴别尔、奥西普·曼杰斯塔姆、鲍瑞斯·普林纳克、科尔比神父、约瑟夫·恰佩克、弗拉蒂斯拉夫·范库拉、卡莱尔·波拉切克。还有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其他若干人，他们往往是那个时代最正直、最忠诚和可靠的灵魂。他们死在占领者的十字架上，宗教法庭的火焰中，死在第一次革命的断头台上，于第二次革命为前者举行葬礼的鸣枪之前，或者死在第十次革命的阵营中。从那个粗暴残忍的权力的立场看过去，他们都是无权者。他们的王国不是那样一种权力的世界。于其中，其他的价值和关系起支配作用。因为他们过早地被迫沉默，我们充其量只有问一问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大多数法典中，都有着将凶手和误杀者区别开来的条文。于后一种情况，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杀死是出于自卫、失误、愤怒或者他的头脑突然失去平稳。乃至在犯下这种可怕的行为之后，他或许还能回到人性之路。而故意杀人的凶手，则出于憎恨、狂热或贪婪。他为了一个预谋的目标而行凶。一个故意离开了人格之路的凶手，他返回他意欲放弃的那条路也许将非常困难。

我们在有权者反对无权者最残忍的行为中也能找出相同的或类似的区别。强壮的民族颠覆弱小的民

族，并且羞辱奴役和屠杀他们。有组织的罗马军队、狂妄自傲的德国民族、野蛮的阿瓦尔（Avars）驰骋欧洲。他们因为领土、牧群、庄稼、黄金和俘虏而战。他们掠夺和抢劫，有时候杀死所有的活物，一般来说还是让失败者活着，奴役他们。他们在失败者面前散布恐惧并让后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他们的行为和宗教裁判所的行为之间还是有一个区分。一个宗教法庭根据精密的筹划选出它的牺牲品，为了摧垮他们的良知折磨他们，使用酷刑摧残他们的身体，以残忍的方式杀死所有那些反抗者。在北美的殖民主义者的血腥行为和纳粹警察机器之间也有所不同，前者不断地袭击装备简陋和基本上是无助的土著民族，而后者则以一种有预谋的和冷血的方式杀害好几百万欧洲犹太人。

也许有人反对：对那些牺牲者来说，他是被谋害的或仅仅是被杀死的区别有什么不同呢？确实，这个区别仅仅对那些活着的人是重要的，对他们重返人性之路是重要的。一种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故意决定处死杀人凶手的权力仍然是犯罪的和应受谴责的，即使它最终改变了它的道德面貌，是试图为了忘掉过去和抛弃过去。一个可耻的、犯罪的权力过去是、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对所有人类社会的威胁。

恐惧总是权力的最可靠的同盟之一。有谁能够想象，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居民们所感到的恐怖？当敌军爬上围墙时妇女们所感到的惊吓？宗教裁判官来到一座中世纪的城市时，恐惧蛰伏在一千张难眠的床上。同样，谁又能够想象，当那些可怕的种族法令产生

效果时，犹太人的家庭会有着怎样的焦虑？当三K党点起大火时，那些黑人会是怎样的害怕？而于黎明之前，到处都是专制权力雇用的杀手和虐待狂式的执行者们在沉默地搜寻时，那是一种怎样的透不过气来的恐惧：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纳粹德国，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斯大林的苏联，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在乌拉圭、阿根廷、乌干达、智利、伊朗、越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秘鲁、古巴、阿富汗和柬埔寨。有多少国家，那儿的人民从来不知道死一般的黎明时分严寒的滋味，从来没有必要屏息静气地去观望，而死亡的使者恰好在他们的窗户底下起劲地跳舞。

进攻者总是在他未到达之前便先知道这种恐惧。他太知道真实的恐惧会暗中瓦解人的士气，造成惊慌和无能的抵抗。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利用这种恐惧的原因。他发动突然袭击，戴上恐怖的面具，他大喊、尖叫，挥动燃烧的木头，发出威胁，擂鼓，敲打锅盖，把他们的士兵编成看起来庞大得多的行列，将骷髅头的徽章别在帽子上，在他们的机翼下面弄出警报声。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一种权力不是依赖某些形式的恐惧。人们不仅恐惧外来侵略者狂暴的铁蹄，说到底他还生活在对神灵们、上帝及他们的代理人的恐惧之中。他恐惧官方权威和他自己主人的代理人，恐惧失去为了生存所必需的家园、食物、土地和工作。

解放人的每项努力都是将他们从恐惧之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创造一种情境，于其中他不再感到他的从属是一种威胁。权力越凶恶越绝对，它便越剥夺人的自

由和造成恐惧。

如果权力变得如此绝对，它可以采取任何专断的行为，可以无中生有地指控任何人，将他逮捕，以想象的罪名去审问他和给他判刑，没收他的财产、工作，取消他的自由，并且最重要的是公开侮辱他，使他蒙受耻辱。那么，恐惧也将变得如此绝对：为了将它维持下去实际上无须做任何事情。当权者只要偶或表明他们想做什么便能够随心所欲。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其中的有权者借以统治的手段不同于以往人类曾经知道的。他们可以控制和消灭个人和全体人民。当这些手段存在时，我们的世界将仍然是一个恐惧的世界。

蛰伏在无权者床上的恐惧给他们的梦想和行动一种强大的动力。无权者个人渴望逃脱他的焦虑通常只有两种途径：远离具有敌意的权力之外，或者将自身变得有权。恐惧导致权力之梦。

毕竟，权力完全和人联系在一起。它存在于人们身上，存在于他们的行为和社会地位之中。一个皇帝、一个国王、一位第一书记或一位总理，都属于人类成员，但他们却尽可能地使我们相信他们具有神的血统，或至少，他们享有在职权方面特殊的保护。但是有一天，他们却被拉下马来面对割下他们头颅的行刑队员，而如果他们已经死去，便能从坟墓中拖出来以证明他们是肉身世俗之人。凡属人的事情大致都是可以做到的。某人只要发现将权力移位到他本人的途径，他便可以把它从天上降到地上，从现在拥有它的人手中将

其窃得。对无权者来说，获得权力的幻觉允诺其将会从恐惧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它同时也允诺自由和世俗的种种好处。

我们已经说过权力依赖实力，实力依赖人数、组织和有效的武器。正是以这种方式，那些曾经被扔给狮子、受折磨和遭谋害的无权者基督徒，那些谈论此处不被认可的某种价值秩序于其中发挥作用的另一个王国的人们，后来在人数上壮大和组织起来，终于有一天他们不仅控制了修道院和牧师，而且也控制了城堡和武装的十字军，在他们的胸前佩戴着最狂热的权力的象征——神圣宗教法庭。

同样，那些无助的无产阶级，超越了上个世纪悲哀失望的那些有觉悟的人们，越来越有效地把自己组织起来，直到最终有一天，至少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他们的党推翻了国王的政府，砍下他的头颅，自己把政府接管在手中，去创造（或至少宣称创造）一种摆脱贫困和焦虑的生活。但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开始是他们的敌人，接着是他们的党员，最终是他们的领导人，于寂静的黎明时分陷入令人发抖的恐惧之中，然后是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被判处死刑或死在遍布全国各地监管营的冻僵了的荒野之中。

无权者当中那些运用自己的法则，梦想拯救世界和将世界（及他们自己）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的人是在自我欺骗，人类从来没有从原先的无权者行使权力中得到救赎，因为一旦他们变得有权，他们将不再清白无辜。当他们开始恐惧丧失自己尚未巩固的权力，丧失

自己尚未实现的梦想和计划时，他们将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将会在自己的周围散布恐怖，当然也将从中得到报应。他们不可能摆脱恐惧，他们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因为这些人尽管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身仍然为恐惧所驱赶。

这个世纪的中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欧美地区的人们再次拥有这种愚蠢的幻觉（这次是真诚的），他们正在进入一个被允诺的王国。这种幻觉建立在空洞的假设之上，认为他们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如何给人们提供一种体面的生活、给他们实现尘世梦想的机会而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充分享受生活的馈赠：吃、喝、旅游和生命的全部需要。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这些方面获得任何成功：为一代或两代人所获得的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从人类的角度看，其好处少得可怜，但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是对整个这只星球的大肆劫掠和贮存了数百万年能量的滥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我们为这个幻觉付出的教训。我并不仅仅指在生态方面所干下的坏事，那是我们孙子的孙子将要全力与之搏斗的（如果他们还幸存的话），也包括其他一些更坏的事情。

在这种把最广泛的力量组织起来“战胜自然”、“扼制它的危害”、促进“进一步发展”或“保卫已取得的成

果”的努力中，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为巨大的行政、军事和警察的结构。这些机构用来服务于社会，而公民和每一个个人，正是由他们所委托的权力的来源。开始，人们无疑这样认同。但是接着，这些机构的行为表现得恰恰相反：它们开始为了自身而篡夺攫取，开始损害它们原先来源于其中的人们。当然，也有一些社会，我们所说的这些机构服从某种形式的控制，但在大多数国家中情况不是这样。它们不再是被支配的，而是由它们来支配。不同于早期权力篡夺者的是，这些权力机构没有面孔，没有个性。在面对沸沸众怨时它刀枪不入。也许这些权力显得更加隐蔽，更较少公开宣称，但是它却无处不在和不断地增强，那些代表它的人不管是出现在公开场合还是隐匿于其背景之中，重要的是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是可以被更换和取代的：指挥一个火箭师的将领们、多国公司的首脑们、自我委任的党的第一书记或秘密警察的头目。

一次次地看他们在电视屏幕里向我们挥手，觉得和他们所行使的权力相比，过去神赐的法老和皇帝不过是一场无聊的游戏。然而我们让自己相信，现在权力只能是这样，他们体现了我们所要去的方向；他们保卫我们的利益，服务于我们的需求，维护我们的安全、进步、富裕，或者任何那些因我们自己的愚蠢所给出的虚假或华而不实的标签。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不再以我们的名义而行动。我们不可能摆脱他们。他们既不认同在其之上神性的力量也不认同在其之下人民的存在。他们仅仅认同他们自己，他们的机构，他们的组

织和他们自己的运作法则，他们破坏性的扩张。他们控制着一项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改变地球的面貌，为他们提供统治地球的手段，以及毁灭地球的武器。

像我们目睹的那样，前两种可能性已经变为现实，而为了第三项内容，力量正在集聚。我们却继续相信他们永远也不会那样做，因为那将是反对他们自身的行为。

但是每一种弄权的权力结构，每一个决心放弃其人性的凶恶的权威，出于徒劳地渴望绝对的尺度和绝对的不受限制，渴望神一般的登峰造极，当他们继续其增长、繁荣和膨胀时，总是在玩火自焚。

罗马皇帝、拿破仑和希特勒，从维护他们权力的立场看，其所有行为都是自杀性的。那些继续他们工作的人如果不受人类一臂之力或命运之手的限制，几乎不能指望他们能自我遏制。对那些已经将他们本身超出我们所能影响的范围、超出我们的语言、抗辩和威胁的人，我们这些压根儿无权的人能做出什么限制？我们这些除了支配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灵魂的人能做什么？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生活也被控制在他们手中。

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并且它来自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丧失灵魂的基础上和从中汲取的力量。灵魂的阙失维持着和恐惧的联系。那些放弃他们灵魂的人仅仅拥有一个肉体，正是这肉体使他们感到有所害怕。他们担心失去尚存的动物性满足：平静和安宁，物质上的东西，方便舒适和奢华。那些没有放弃灵魂的人能够克服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说到底恐惧来自内部而不

是外部。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焦虑来取代自己灵魂的人永远不可能赶走他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

当然，代表着没有灵魂的权力不可能理解看起来不可思议地走出队列的人的动机。他们猜想后者有着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的目标，他们把这样的行为解释为一个看不见的恶魔的指点，一个撒旦的门徒在其耳边的挑唆，目的是追逐权力。此时只有一件事情他们能够明白：那些孤立的反抗者扰乱了被威胁的人们的服从一致。因此，有权者便动用他们全部的威力和所有他们占有的手段，试图使反抗者回到他们认为反抗者应属的位置上：由恐惧所支配的虚无空洞。

当胡斯站在康斯坦斯的宗教会议面前，他们并不试图劝说他，也不和他辩论，他们只是一次一次要求他放弃信仰。当胡斯在火刑柱上奄奄一息，他们满足了他最后一个要求。那些拒绝讨论问题或听到任何真理的证据的人，满足这个要求，是因为他们考虑到解救一个无名的神学家的生命吗？完全不是。他们仅仅知道一个放弃了信仰、向恐惧屈服的胡斯，一个重新回到卑微的权力王国的胡斯，将不再对他们有着任何威胁。而一个不这样做的胡斯，不管是活着，还是被烧死，却

是对他们的世界、对他们凶恶的统治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所发生的实情，它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个人出于其内心要求，坚强地面对有权者，甘冒一切风险，拥有一个真诚的、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者，权力来自何方，什么是它的发源地和什么是他们的责任，他也许将使他们多一些人性。但是对那些当权者来说，对那些屈服于当权者的人来说，这样一个目标看上去非常愚蠢。

然而，对于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正是隐藏在这些愚蠢的行为当中。

1980 年 1 月

文化及其他

在整个 50 年内，除了两个短暂的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一直生活在极权主义权力支配之下。在残忍的纳粹暴政之后——其间有三年间隙——是斯大林的独裁制度。接着，在 60 年代后期一个短暂的更自由的时期之后，这个国家由苏联占领，在一个卖国政府的帮助下，重建了极权主义制度。在半个世纪的每个十年中，尽管残酷和残暴的程度、方式有所不同，但持续不变的是对文化的限制。只有那些不追求自由，不追求一个更高更好生活的文化，才是被允许的。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文化。那么真正的文化，或更确切地说，文化精英们在这种情形下能做什么呢？

在表面上，极权主义权力试图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事实上，它也宣布自己是救星，要引导人类（他们总是对现状不满）走向更好的未来。

因此，极权主义权力扮演了文化代理人的角色，宣称给文化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它允诺让科学家们安静地研究，给艺术家新的主题以激发他们的灵感，给广大的社会群众以社会稳定和物质保障，它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起初，文化精英们不是像捍卫他们须臾不能离开的某种东西那样去捍卫自由，而是帮助去摧毁它。许多人以为他们仍然是诗人和阿基米德的后代，试图继续他们的工作。但是极权主义终于泄露了其真正的本质，它不仅缺乏文化，而且敌视真正的文化，于是，真正的诗人和阿基米德的后代们为了适应他们内在需要，开始从那些保持一致的人们中分离出来。

1968 年 8 月对我的国家的入侵是现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行为。一个外国武装干涉其邻国的和平事务被说成是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当然，这种入侵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损害。数千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其中许多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同时，入侵的可耻本质无可洗刷地使得所有那些想重新恢复古老的极权主义权力的人威信扫地。我曾经说过，看起来文化和文明在捷克土地上显得特别重要，数个世纪民族和文化的压制使得文化、尤其是文学得到普遍的和极高的尊敬。这样的权力需要诗人给他们的意图和行为加上韵脚。他们甚至也需要阿基米德，在他的循环论证中他们可以网捕人们。但是他们需要的人是顺从的，降格的。他们需要一种文化，用瓦茨拉夫·哈韦尔的话说，它永远不会超出“一种基本上是谎言的社会意识，对这种意识的散播者和接受者来说，原本是一种有关世界的真实

经验，却仅仅被关于这种经验的表象所代替”。这种权力通常动用允诺、收买、让步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手段争取部分知识精英。但是一种无可洗刷的耻辱的权力怎么可能争取到他们？这不可能。它感到自身的隔绝并因此决定动用强制性手段。70年代早期对这种权力和捷克文化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这个制度决定制服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代表文化的那些人，甚至不惜以毁灭全部文化为代价。对他们来说，知识精英决心宁愿遭到毁灭也不愿意为这个无可洗刷的耻辱的权力做任何事。

在现代极权主义历史中，还很难发现这样一种僵硬的和一致的对民族文化的迫害，也很难发现由精英们所表现出来的宁愿接受任何命运也不和这种权力狼狈为奸的坚定决心。在整个一年中，，实际上所有大学的艺术系全军覆没，科学和学术机构化为乌有，所有涉及艺术和文化的杂志和期刊遭禁止。大部分捷克记者、作家和学者发现他们自己都在那张名单上。他们的作品不能发表，他们现有的书被从书架上和图书馆里拿走。他们的名字不能在公开场合中被提起，除非作为羞辱的对象。他们自愿变成工人——当保管员、窗户清洁工、扫大街的、装料工和夜间看门人。那些有权的人心想他们将永远摆脱这些或许能暴露其真实本质，并对他们及整个社会真实地揭露的人。尽管他们有权力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却没有力量摧垮这些人的精神，他们也不敢将这些人杀害——国际舆论不允许这么做。这种权力相信，到时候他们将用他们自己顺

从及奴性的伪文化来取代真正的文化。他们相信像过去那样，他们将争取年轻的一代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任何人都远远没有吸引力。在他们的夸大其词中，他们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可靠的人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甚至没有想到在现存状况中，在他们自身——现在是无可洗刷的耻辱——和他们所否定的价值之间、在他们所代表的被压制的文化和真正的文化之间，那种致命选择的时刻不可能重复。只有一种真正的文化可以引导民族走出危机，使之恢复本来面貌和获得自由。这种权力把自己束缚在没有逃路的符咒般的怪圈中，束缚在一种表面的因而是强制性的稳定之中。但是，用捷克哲学家厄拉兹姆·克拉克的话来说，"今天强制性的稳定必然导致明天的不稳定。"

起初，打击捷克文化使全社会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和压抑，社会在表面上陷入冷漠。然而，那些被认为是遭毁灭和摧垮的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不是没有希望的。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屈辱地乞求保护。而成百个遭到禁止的作家中只有三个通过公开的自我批评换得发表的特权。真正的文化——那些受到羞辱、压制和遭禁止的——并没有以权力所想象的那种方式从世界上消失，而是逐渐地，尽管是十分艰难地，找到了一种继续存在的方式和继续发挥影响。

渐渐地，那些试图摆脱表面上无所不在的权力所设置的陷阱的人在增加。一些小团体开始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教堂、体育俱乐部和私人的家中。经常是这些团体并不知道他人的存在，但是他们都有着一个

相似的目标：给权力试图减缩成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幸存的生活以一种意义和超越个人。

这些被赶到地下的小团体必须克服许多不便。它们受到干扰、迫害、被瓦解、不能运用现代通讯技术和不可能通过知识的劳动养活自己。但是他们有着胜过权力的某些优越性。在他们中间，有好几位卓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这些人具有道德上的权威，向往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真实的生活，他们逐渐成为希望的化身。并且，尤其对年轻一代，他们对被禁止的和甚至遭迫害的事物所做的努力有着很大的影响。

1975 年，有两批出色的文章为进一步的行动提供了依据，它们的复印件迅速地流传。其一是瓦茨拉夫·哈韦尔致胡萨克的信，另一是由捷克重要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Jan Patocka）的被称作《持异议者文集》研究文章，后者是七七宪章的首席发言人。

哈韦尔给胡萨克的信是对现存制度出色的分析，和对其反人性、反文化的姿态造成崩溃的一个预言。扬·帕托切克的文章提出了斗争的范围，指出文化和知识阶层自由活动的可能性。帕托切克形象地将之形容为“不受保护者的团结一致”，他说：“这可能和必须造成一种精神上的权威，和凭其自身力量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它可以促使冲突的世界接受一定的限制和将某些行为标准宣布为不合法。不受保护者的团结一致将在受迫害和随时被剥夺生命的人中间建成。人类并不通过放弃或屈服于平庸的标准及其允诺而达到一种和平的状态，任何对这种团结一致丧失信心的人必须

意识到：他是在助长战争，他是一只靠吸别人的血为生的寄生虫。”

文化上的反对派了解自身的可能性和限制。像在每次有代表性文化运动中那样，它主要依赖个人。极权主义权力猜忌地防范它所认为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即有权去组织他们——这个事实，使得反对派非常强调个人在历史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文化上的反对派也了解永远不要进入武力和暴力的范围。它认识到它的希望之一是把斗争限制在权力不可能夺回的范围之内，即思想和精神领域。这赋予这种抵抗以非暴力的性格，它预示了 15 年以后的“天鹅绒革命”。

极权主义当然感到了这种文化抵抗的威胁，但是这种权力的本质排除了任何调停或妥协的可能性。它继续它的反对文化的战争。它突然搜查私人住宅和扣押那些聚集在那儿听讲座、读剧本或读抒情诗的人。它没收诗人、散文作家和哲学家的手稿，不管是国内的还是翻译过来的，对七七宪章的文件它也这么做。一次又一次，它举行审判，判处那些复印文章或组织其他文化活动的人有罪。因为这些人甚至根据他们的法律也显然是无辜的，所以这些审判的结果和当权者期待的正好相反。他们想要恫吓，但是恰恰摘下了自己的面具，暴露了它自身是一种毫无原则、抱有偏见和无知的力量。这只有激发人们的抵抗。早期桑米兹德出版物只出了数十份复印本；到 80 年代，这种书在许多车间重新再版，并且技术也很现代化，其篇目的数量层出

不穷（桑米兹德文学佩德洛克版便出版了三百种书）。在 70 年代，实际上并不存在桑米兹德文化期刊，而在 80 年代，有着超出一百种的非官方杂志（与此同时，只有 5 种官方杂志涉及文化）。

桑米兹德文学是被压制的文化表现自身的途径之一。在不同的人文学科领域里还有哲学的讨论会和系列讲座等。年轻人急切地试图完全摆脱由当权者提供给他们的伪文化。他们寻找小剧场，从 70 年代开始，他们和现有制度的联系最真实的表达是抗议主义的歌曲。歌手们在年龄上最接近他们并容易成为他们的偶像。当权者预感到了这一点并采取措施，一代抗议歌手基本上被赶到国外，但是像通常的那样，其结果与预期的恰恰相反。

80 年代后期，国际环境无疑地产生了影响。代表权力的人和代表文化的人分成两个鲜明的阵营。几起事件强化了当权者和那些试图将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当权者屡次运用警察暴力来驱散国家独立纪念日的聚会和企图消除人们对一个以自焚来抗议苏联入侵的大学生扬·帕拉克的记忆。对采取最激烈的方式表达个人反抗可能性的一个人的尊敬，变成了特殊部队暴力进攻的对象，他们不惜运用警棍、水龙头和催泪瓦斯。和平的纪念活动持续了五天，其中四次警察运用暴力驱散人群。好几个人被捕，瓦茨拉夫·哈韦尔也在他们中间。在这些激发起整个国家的事件中，权力的残酷真相从一开始就公开地暴露着。在这个关键点上，政府竟不可能找到一个有足够

权威的人在全民族面前发言。没有人想要公开地支持这个制度，许多人可能被发现正在反对警察暴力，反对关押无辜者。在这些反抗者中有这样一些演员、电影制作人、作家，在此之前，制度还一直相信他们站在自己这一边。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当权者——很难说他们是出于愚蠢还是绝望或虚荣，或是意识到他们真的无可洗刷的耻辱，拒绝和所有有文化上的反对派参加的对话。在极权主义权力和所有“不受保护者”之间深深的裂痕变得无可弥补。显然任何进一步的错误、任何进一步虚荣的行为，都将是致命的。

1989 年 11 月发生的事情已经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目击者和参与者，我想强调的是这个革命实际上是文化和权力之间冲突的结果，是能够想象的最非暴力的革命。在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没有一个人受伤，没有一扇窗户被打破，没有一部汽车被袭击。无数小册子遍布布拉格和其他城镇，要求人们采取和平的、克制的行动；没有人呼吁暴力。对那些仍然相信文化的力量，词语和善与爱的力量，相信它们能够在和暴力的斗争中取胜的人来说，或者对那些既不相信诗人也不相信阿基米德，在他们开始反对穿制服的人的斗争之前就神情沮丧的人来说，布拉格革命将始终是一个激励。

1990 年

一种选择

当 1989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导致重建民主制度的事件发生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与 1948 年导致极权主义制度建立的政变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在两种情况中都没有流血冲突。国家的命运在首都的公共广场上被决定，在那里，1948 年的巨大游行是要求结束民主，而 40 年后，则要求结束极权主义。在两种情况中，天地翻转的决定性时刻是媒介的作用。1948 年，排字工人拒绝为民主报纸排字（电视在那时还不存在），结果是，只有某些人能够在关键时刻影响公众意见。1989 年，当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宣布，如果他们不被允许真实地报道事件的过程，他们将停止播音，这是一个转折点，日报的排字工人甚至以罢工相威胁，如果他们的报纸不是真正地报道正在进行的事件真相的话。在两种情况下，现存政府都在不久之内垮台。

左派和右派的极权主义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的让位，也许使我们得出错误的和乐观的结论，这些制度在什么地方和人们行为及思想的真正本性相违背，它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历史的某些失误。而实际上，许多人无意识地向往那种他们所允诺的有秩序的和有力控制的政府。我回忆得出我的国家 40 年前极权主义制度建立时的群情激昂，我也记得德国向希特勒上台致敬的野蛮的兴奋。这个世纪前 50 年表明，极权主义制度吸引了整个社会，全体民族。他们通过将乌托邦的景象和煽动性的允诺结合起来，并诉诸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秩序和一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理想，而成功地得到广泛欢迎。对于沉陷在灰色的日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观念，同样还提供了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他将人们从必须自己作出决定、承担责任和风险的重负中解救出来，把他们引向一个目标和赋予生活一种意义。早期极权主义制度的许多方面是感人的：它的果断坚决，它的明确的纲领，它对付问题的能力。而如果是一种民主制度，出于自身本性，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新政权阻止让普通市民陷入混乱，采取令他们感动的措施。在其权力上升时期，这种制度还分配给每人一份没收或偷来的财产；它恐吓、关押或杀害那些和它不一致的人，这样它创造了表面的统一。早先，这仿佛有着几乎是神奇的魔力，它用豪华和炫耀的庆祝活动、游行、检阅来强化这种印象。在最初，极权主义制度看上去的确是强大的，因为至少像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它是统一的并得到群众的支持。

在一代或两代人过去之后，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种制度的崩溃？为什么这种制度的孩子和孙子们希望回到他们的前辈如此有理由和兴高采烈地放弃的老的民主制度？

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必须不停地重建统一体，从根本上说，这是它的本质。在意识形态和公民意识双重意义上，其领袖人物——缔造者、奠基者、统一者——则成了这种统一体的象征。他不仅具体地代表了极权主义理想，而且还代表了将理想带入生活的立场。在第一阶段上，因为这位领袖和他的伙伴们（正是他们可以影响公民，接着有信心地，通常是怀着巨大的决心将一种社会秩序贯彻到全民族中去）的个人魅力，极权主义制度显得很有活力，它已经颠覆了旧秩序、旧的法律、习俗和传统。但是极权主义特殊的原则是要求每个人都服从，每个人都在其理想、领袖、中央权力的名义下统一起来。

于是每种极权主义制度其目标在于同时排除个性（除了领导人的个性，他是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或团体的化身）和提倡无个性，即对人们来说，不管他们是多么勤勉、勤奋和认真负责，都要故意将自己个性和原创性的萌芽压抑下去。这样，一种最初看起来是富有活力的制度，变成了高压的、笨拙的和停滞的。极权主义制度为了偏袒和宣传某个独一无二的人，不惜以排斥所有其他人为代价，因此它必然会和许多个人的要求之间发生冲突，也和整体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现代社会中，最杰出的个人或最优秀的权力中心都不

可能阻止问题的出现和堆积。在最初取得成功的欢腾之后，每个极权主义社会都进入一个危机的时期，它几乎影响了生活的每个方面。这首先反映在精神领域，极权主义权力不允许不同的观点，因此不允许争论或甚至有意义的对话。精神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每个个人，不管他内心如何，都必须仿效官方的样板。他个性的发展受到限制，人类头脑和精神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想要阻止事实这样进行下去的人在增加，他们提出反对和要求改变。极权主义制度仅仅知道作出一种反应。它运用暴力反对那些不满者。这就是极权主义国家为什么非得需要政治警察、屈从的法庭、非法审判、集中营和判处死刑、以及通常有着残酷的却又乔装打扮的刽子手的缘故。尽管在其开端许多人被这些行为所吓住，他们被劝告这些方法无论如何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在其最终的演变中，极权主义制度以其遍布社会可以调遣的服从的奴隶而著称。然而，他们不同于早期那些支持者，因为他们服务于制度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不再为欢欣鼓舞所驱动，而是为恐惧所驱赶。

但是，其行为被持续的恐惧所驱逐的人失去了文化得以发展的一种品质：他失去了创造性，失去了观察力。他的行为只能类似于处在围困中的一个城市里的居民。他灵魂的要求是能幸存下来。

当根据政权的爱好，以压倒多数的选举结果出来时，这些表面上忠诚、服从却缺乏创造性的奴隶们，也

走到了尽头。充满悖论地，接着政权本身也开始崩坍。因为它反应迟钝，这种危机很快从思想精神领域遍及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它涉及到经济、人们之间的关系和道德，最终反映在水和空气的污染这些事情上面，没有人真正负责任。极权主义权力通常否认这是一种危机并试图把它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意味着它把每一件事情转变为一种特权，迄今为止是一项正常的人性需要的东西，由于极权主义，变成一个希罕珍奇之物。它们被用来贿赂人民：享有一间屋顶的权利变成一项特权，同样还有享受未被污染的食物的权利、医疗保健的权利，了解未受审查的消息的权利、被允许旅游、教育、取暖的权利，最终是生活本身的权利，统统变成特权的范围。

因为政权将每个东西转变成一项特权，每件东西也就成了腐蚀人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权摧垮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他们的自信。根据危机的深度和社会腐败的进度，那些特权阶层，即享有额外特权的人们，是广泛和普遍的。特权阶层的成员处于批评之外和法律之上。他们可以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甚至犯罪。这个特权阶级迅速变成道德败坏的，成为这个制度一个腐败的、饱食终日和不能胜任的阶层。但是因为政权给他们提供权力，给他们委以最重要的官位职务，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了为深化社会危机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甚至显然不能为极权主义政权做任何事情。

很有代表性的，从特权阶层中无法产生出另外一个杰出的或具有魅力的个人。如果在其领袖或第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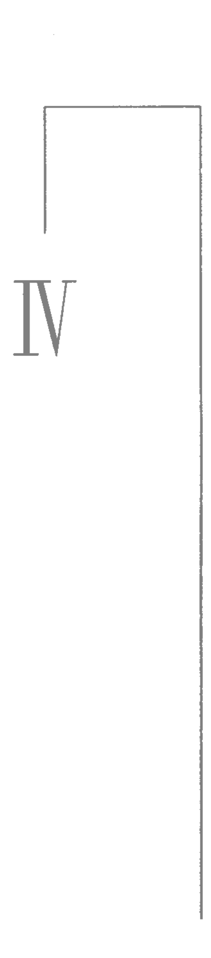
领导人死后这个政权仍然存在的话，那么政府将落到毫无起色的人手中，他会迅速引导社会走向深深的衰落。我们看到在几乎全部东欧和中欧的国家中相同的现象：它们都由如此枯燥乏味的人所统治，这些人既不能拯救他们在其中拥有一切的制度，也不能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提供任何东西，因此除了纯粹的权力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影响。

极权主义制度通过允诺改善社会和人民生活来实现其权力统治。由于破坏了组织社会的途径，它失去了活力，因而也恶化了大多数人们的生活。极权主义政权的结束——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有时候是流血的，有时候令人惊讶地迅速和平静。有时候它们被愤怒的人群扫地出门，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们的终结是改革派工作的结果，这些人在政权显然失去了维持社会的能力甚至是一个基本水准的全部手段时，他们出现在体制内部。没有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其真正的生活根据不是靠惩罚它的公民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比民主社会严酷得多。通过让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他经常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是错乱的）来掌握的一个没有限制和无可动摇的政府，极权主义不仅对它所统治的人们，而且对全人类也都是一个灾难。在不远的过去，尤其在危机时刻，极权主义政府代表了似乎对许多社会层面来说具有意义的一种选择。当今天的悲观无望的经验被忘却一半时，或当社会发现它自己正处于深深的危机当中时，它们将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作为一个危险的富有吸引力的抉择。

1990 年





论世俗信仰的文学

自从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便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人们来来往往，活着又离去，而这个世界、生活和时间仍然存在。在文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人们是怎样和无可避免的生活的悖论打交道以及和造成悖论的那个问题打交道——人类生活的意义。

不管东西方文化在关于上帝的概念和人类行为的意义方面有多么不同，我们看到在最初他们都必得询问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怎样最好地度过分配给我们的时间？我们怎样和我们自身的必死性达成协议？我们如何超越这种必死性？由于和自然面对面，在那里所有的事物不停地出现和消逝，于是人们希望发现持久的事物，发现能够蔑视死亡的事物，发现他能够与之联系的某种东西或某个人，于其中他可以发现有关永恒的某些信念。

人们越是将自身和自然相分离，便越是不同于其他必死的生物，他便越意识到在尘世之上赋予他以一种特别惠顾的那个人。人是被选择的，是根据他的形象被创造的。但是那个给予人们如此恩惠的人，为什么同时又将他遗弃，如同其他生灵一样，在时间的海洋中没有给他多出一小块领地？人们意识到至少神性的伟大和不朽已经部分地扎根于他之内，在他身上得到部分反映。他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并不随着肉体屈服于死亡。灵魂是不朽的，或起码，它寻求获得一个高度，在那里他将再次和放射光源的上帝结成同盟。

但是这个希望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因此他最终接受了所有信息中最令人安慰的：上帝的儿子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征服了死亡。今天的基督徒们仍然在表达这样的信条：我相信肉体的复活。人们进入永恒不仅携带着他的灵魂，同时也有他的肉体。如果耶稣的门徒所许诺的就是这些，他们仍然将发现众多的支持者，因为人们希望为这个新的信念活着和死去。

但是即使具备生命最终战胜死亡的安慰性福音，仍然存在着死去的世界和活着的世界、天国和尘世、人和上帝之间令人沮丧的分裂。对彼岸的存在我们说不出什么来。而那个提出发问的理性，开始寻求这种分离的逻辑并开始怀疑。但是它引出的回音是：如果你不想死，那么请相信！你的信仰会拯救你。只有通过信仰，人们才能从虚无的王国获得解放。

人通过意识到他自身、他的理性、他能够发问和描

述自然界的规则、关系而区别于其他生命。然而，在信仰的问题上，他进入了一个王国，于其中他必须提醒自己不要再发问，只是去信仰，因为他恐惧死亡。理性越是揭示物质世界的秘密，理性和信仰的二重性便越是加深和强化。

关于自古以来理性和信仰之间的争论我不想妄加评论，但是我想我可以说，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现教堂和教义不能接受的人数在增加。这些人是在理性主义的氛围中被培养起来的，是技术和原子时代的产物。当他们听说末日肉体复活的古老教义时，是倾向于退缩的。即使是那些倾向于信仰的人，也不能像他们的先人一样有着同样强烈的程度；取代那种安慰性信仰的，他们经历着对虚无的恐惧。一个半世纪以前，诗人马哈（Karel Hynek Macha）出色地表达了人面对没有上帝的宇宙时的感情：

> 一颗星星从天国的高度骤然降落
> 一只死了的星星，一道碧蓝的光线。
> 它沉落到一个没有结局的王国
> 在永恒地存在中它永远地下降。
> 从所有坟墓中正发出哀泣的共鸣，
> 一种可怕的叫喊，一种恐怖的呜咽
> “当我的存在结束时将有什么来临？”
> 从来没有——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目标。

但是人能生活在对虚无的恐惧中吗？说到底，他必须在他的行为中发现一些意义，在他的生活中找到一个目标，尽管他拒绝在他祖先已经发现若干个世纪的地方寻找。现在的时代喜欢新信仰和预言家。人群听从和跟随他们。渴望信仰和拯救仍然存在；仅是改变了崇拜的方向和对象。信仰从天上降到了地上，从死后的生活降到了现在这个世界，在这里，不是上帝，而是人自己成了受崇拜的对象。日益增长地，人作为那个伟大的引导者的一种象征和具体化。

现代的作家往往同样不想或不能接受使他的前人得到拯救的那种信仰。然而，他也许同样经常地重复他所要的：我要完成一个比青铜更持久的瞬间。但是他不能解决他自己存在和不存在的基本悖论。那么他有什么希望提供给人们？

同时，许多作家喜欢做当今的预言家。他们期望拥有预言家般急切和富有戏剧效果的感觉，像预言家所做的那样，他们试图去提出警告和指出更高级的道路。但是，原先派遣预言家的那个人消失了。

上个世纪释放了大批预言家的文学。像狄更斯、左拉和雨果都用一种相似的方法看待这个世界。人类社会是不公正的，这个世纪从总体上说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作家最感兴趣的是社会舞台剧，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悲剧上演的地方，在那里或者是由社会不公正所造成的贫困和受罪，或者是由玩世不恭的人、被金钱所腐败的权力所统治。这种凌驾于人类不幸遭遇之上的预

言式的愤慨至今有其文学上的支持者，但是总是缺少某些东西：预言家可以立足其上发言的一块柱石。他实际上是以谁的名义进行宣讲？并且他所宣讲的是什么？他提供了什么？他知道贫困是可怕的，他宣称富有败坏了人们。但是假如一个人及其生活不承认那更高的权力，只能在这两者之间摇摆。

对听众——我想这是一个描绘他们的适合的词——来说，这些现世的预言家提供了一个解放的信息。这个信息怎么可能被断然漠视？每一件事都为了接受那提供拯救的任何信箱而准备。于是伟大的意识形态的时代开始了。

所有于 20 世纪上半叶对许多重大事件产生影响的意识形态都深深根植于 19 世纪。对一种拯救学说的激增的渴求，并把它们变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外观，弄成看起来甚至比人类生活还要重要的某种东西，这不过是一种普遍的需要。其中对人类命运产生最大冲击的一种学说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一次成功的革命之后由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

在新的革命之后的社会中，将不再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技术将造福于人类，将消除单调乏味的苦役般的劳动。社会财富将根据贡献大小来进行分配，不劳而获的收入将和劳动人民的贫困一同消失。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每个人将根据其需要得到报酬。最终，国家、货币和私人财产将全部消亡；将不再存在人和他的工作及和他本人关系的异化。天堂将在地上建立起

来。

最终，所有那些想成为当今预言家的人拥有一个他们可以用的词，像他们的前人所做的那样，在群众面前考虑只发一个音：社会主义！

接受了新的教条的作家给文学带来了新的主题和背景，一个非传统的主人公——一个来自低微出身（通常是工人阶级）的充满自信和坚定的角色（这种文学的样板可以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作品，尤其在他的《母亲》中找到）。社会主义同时指出了大部分人生活的残酷处境，预言现存社会秩序的毁灭和一个新的、更人道和秩序的出现。对于社会主义作家来说，他掌握着或相信他掌握着一种物质武器，由此他可以创造他的天国，他自己的关于拯救的神话。

奇怪的是，这种新的信仰保存了老的信仰的许多方面。它有自己的选民和一块被允许的土地，将由领导人把他们带到那里。它甚至还有自己较次要的神，它的金犊，它的异教徒，后者必须被揭发和铲除。但是因为这种神话是人世间的，因为这种文学，用阿尔伯特·加缪的话来说，是以“现实的目标取代理想的目标，以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来寻找人类生活的意义”，在这自身之内便包含着一种危险：它所要求的信仰比它试图取代的信仰更加不受限制和滥用。

人们实际生活的地方和理想的领域总是存在某种分离，不管它被称做天堂还是天上的王国。然而，这种分离，并不梦想颠覆人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但是，现在社会主义却预先假定这种理想的世界要在这个地

球上现实地创造出来，它将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升起来。不同于以前曾经有过的自发演变成的社会，新的社会是由社会主义的“设计师”规划的结果。但是在这个革命的理想社会梦想的核心，隐藏着对人类若干世纪演变而来的价值、社会结构和经验的背离、否认或至少是不信任。

关于选民的古老的概念在一种民粹派的想象力中也得到复苏，头脑简单的人具有真理和智慧的正当来源，在道德上也不受污染。这种概念转变成由工人阶级承担历史使命的神话。

在文学中每一次这种概念化都是致命的——于其中真理和善被理解成进步，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来源于他的出身，或者是他的种族、民族以及阶级。不远的将来会告诉我们这种东西对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最终，受惠于一次毫无意义的世界大战，无产阶级革命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地方获得了成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实现了数不清的社会主义预言家的梦想。一种拯救的希望再度降临到人们中间。

于是，古老的理性和信仰这对命题，在我们身上重新出现，不过是以截然不同于传统的方式。新的崇拜对象是和被丢弃的信仰相适应的理性的结果，也就是说，相信某个人站在世界之上。理性崇拜它自己的创造物，它自己最理性的作品，并把它作为一种新希望的源泉提供给了人们。这样，在有限和无限、人性和神性、永久的无和不朽、灵魂和肉体之间的距离消失了。希望失去了它的形而上的尺度。希望成了组织得更好

的世界。但是当失去形而上的尺度时，人间的事情真的能更好地组织起来吗？

当这个词转向其肉身化的展开时，社会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文学呈现出新的尺度。预言家和他们听众的梦幻开始成为现实，成为可以检测的结果。

对我们而言，因为隔着许多年的缘故，这场革命所产生的贡献或破坏的许多方面已不同于它当年对同代人所呈现的那样。但这是无可争议的，每次革命都给它的拥护者带来一种令人陶醉的满足，一种他们不是历史的玩物而是它的创造者和改良者的情感，在伟大、纯粹的理想的名义之下，他们允诺将人类永远带出苦海。革命领袖们的感情也许可以和拯救的使徒的感情相媲美。用马尔罗的话来说，“在革命者的生涯中，革命起着和不朽的生活同样的作用。它给发起革命的人带来拯救。”

更进一步，作家被赋予了这样的希望，即社会主义革命将取消革命前束缚他的所有规则和惯例，从此将进入一个不受限制的自由王国。他也相信社会将更多地注意到他，因为像理论上所表明的那样，革命将给文化、因而也给文学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它们将不再是仅仅少数人的一种边缘兴趣，而将属于所有人民，为所有人民所需要。在托洛茨基昏迷的幻象中，社会主义最终是：“平常的人可以变成一个亚里士多德，一个歌德,一个马克思。”

许多作家相信命运使他们加入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感情反映在首批

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中，如果轻视它们或许是不公正的。马雅可夫斯基，巴别尔，约翰·里德（John Reed），或肖洛霍夫，后者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无疑为他们自己的感情和制造革命的那些人作出了证实。

但是要求领导革命和给群众以许诺的人必须以行动说明自己的时刻来到了，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便发现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他们仅仅鼓励人民保持耐心，坚定信仰，并把那些拒绝服从的人开除出去。

然而伟大拯救希望的诱惑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说，革命试图在受到围攻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信仰。这样一个宏伟的理想必须更多的得到释放。大多数那些发现社会主义革命表达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希望和全体人民希望的作家，走到了忠诚的预言家行列中。在他们中有被认可的艺术家，如巴比塞（Barbusse）、布莱希特、罗曼·罗兰、拉克斯内斯（Laxness）、尼克索（NexΦ）。他们什么也不看——只是信仰。并且他们也不希望任何人独立地观察，他们仅仅希望每个人分享他们的信仰。《在明天和昨天之间的土地》是本关于苏联报道的被称之令人作呕的集子。这位虔诚的预言家兴奋地喷吐出关于新的社会公正的许多标语口号，对新的拖拉机厂、同志式关系的心醉神迷。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块由梦想转变为现实的土地上。但是关于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被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事实，他一无所知。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甚至走得更远。官方邀请他到索洛韦茨基群岛的一个集中营视

察。他接受了，并写了一篇关于他的访问的令人鼓舞的素描。通过他的眼睛，集中营变成了一个再教育的机构，在那儿他们“在最自由的情况下运用富有教育意义的劳动手段”。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像一座监狱。这是一个人们自我教育和在一种文明的方式中学习生活的地方，人们演戏，饲养黑貂、狐狸、母牛和猪。“一开始，我就看到如此整洁的马厩和牛棚，通常在这种地方有刺鼻的臭味，但在这儿根本不可能发现。”另一方面，他带着厌恶地发现，这些人中有一些政治犯，“情绪极端的反革命，君主主义者，在革命之前这些人被称作‘黑色百人团’。这儿还有恐怖主义者，经济特务，所有由正义的历史之手在大地上连根拔起的那些杂草。”

他也如此为这里美丽的周围景色所感动。“这些小岛上原初的激情，并没有唤起它的居民的一点共鸣，去使他们多少有些想要更快地工作和富有激情地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而对新的现实来说，正像每一个忠诚于他的信仰的预言家所知道的那样，将不再需要监狱，甚至不再需要这些美妙的、自由的再教育的改造营。“在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中，得到承认的是，犯罪是阶级社会的一个产物，犯罪是一种社会疫病，滋生在私有制腐败土壤之中，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产生这些疫病的环境，即那种古老的阶级社会的腐败的经济基础，最终会把它们铲除……”

根据后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个声明，在高尔基访问期间，一个14岁的男孩向他谈了改造营生活的可怖，“高尔基离开了营房并且抽泣……而当他的汽

船离开后，他们枪毙了那个男孩。”如果这种遭遇发生的话，那么这位预言家也只有保持沉默。说到底，他不能毒化他的关于天堂的预言家的景象。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变成如何描写社会主义现实的一个模范。他描绘了社会主义作家将如何看待展示给他的生活，更准确地说，应该独特地去看展现给他的生活，仅仅按照提供给他的那种方式去看。

我们必须仔细琢磨加缪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描绘：在革命的国家中，社会主义文学从人们如何实现占支配性政治力量的目标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在自身行为和立场如何帮助这种权力巩固它的统治中寻找意义。

不仅是来自革命的土地上的作家要这样做和为此作贡献，那些来自国外的作家也要这样做。被要求接受革命的土地上现存权力目标的作家必须尽可能快地首先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继续实现它的全部原始的理想——建成共产主义。换句话来说，最终每个人将获得自由和物质福利。但问题是，当权者遇到了来自国际上和自己国内反对派的猛烈抵制，因此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当然，这种措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于是不需要对它们加以注意。出于外部环境我们被迫采取它们，而当这环境结束时它们也将消失。与此同时，唤起在群众中的创造性力量，他们的激情，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需要的。人们越是受暴力重轭的支配，便越期待预言家们去歌颂他们。

“我们文学的主要的主人公是建设一种新生活的

人民，那些工人，合作社的居民，男人和女人，党员，经济专家，工程师，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我们的文学洋溢着焕发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它从根本上是乐观主义的，因为它是一个正在上升的阶级——无产阶级这个进步的和先锋阶级——的文学……苏联文学必须能表现我们的英雄和展望我们的明天。这并非一个乌托邦，因为我们的未来是通过今天正确的政治工作，在一种有计划的方式中制定出来的。”这是 A. A. 日丹诺夫在 1934 年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上发表的讲演。在同样的会议上，高尔基提出一个不容置疑的法则：

“富于创造性的文学，富于创造性的真实，首先将在人民的英雄身上发现，在古往今来的那些不朽的劳动人民英雄身上发现，诸如普罗米修斯、斯瓦雅托加、伊夫诺夫斯基、彼得鲁什卡，最终是列宁”。

这个挑战出现在这样一个时刻：那些预言家宣传家们的眼睛不再通过天堂的大门观望，而更经常地通过监狱的大门观望，但在那里，他们不能不听见无辜者的大声喊叫。这就是事情的所以然。绝望的，受拷打的囚犯交待难以置信的罪行，在这块不久前还被称作欧洲“粮仓”的版图上饥饿正在盛行，那些有名的和无名的，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的，革命家和他们的对立面，正在从他们的家中消失，许多人再也没有出现。死人的尸体堆积起来，关于这些事情的书籍在国外出现；有足够的目击者愿意提供证明。但是，那些直到不久前还对每个无法无天的行为报有反感的人，那些代表所有受苦人而呼吁援助的人，突然对这些事情变得毫

无所知。

自然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加剧了，能够吸引许多赞同者的持不同看法的人和批评家出现了。信仰必须坚定地捍卫自己，和冷酷地反对那些人，以适应惟一科学的关于社会的真理。

1930年，一个新的预言家——纪德，从这块革命土地上回来之后，出版了一本叫做《从苏联归来》的报告文学，于其中他承认自己的失望和表达了第二种思想。这本书伤害了虔诚的信仰者。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一个叫S.K.纽曼的人，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诗人，作为应答写了一本书叫做《驳纪德》，他给这位法国作家写了大量侮辱和奚落。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创造了一个概括社会主义信仰教条的教义回答手册。将纽曼所表明的信仰和早些时候的乌托邦景象作比较是有趣的。显然最大的裂痕是在他所运用的非常特别的语言上：怜悯被替换成阵发性情感，关于未来的展望让路给关于现状的谎言和愤怒的长篇演说，用来反对那些敌对者、没落分子、基督徒、民主主义者、托派、修正主义者、知识分子、知识界成员、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颓废派和吸血鬼，所有这些淹没了其余那些积极的信息。一个不可动摇的希望是：“苏联是今天的世界上惟一的保障。”

曾经吸引了许多伟大人物的革命是因为它允诺解放人们。现在，其遗产的所谓辩护人宣称社会主义自由的概念是与军事营房或监狱相谋和分享的东西，而不是和新未来景象有什么共通之处。

“社会主义不是允许任何人说出他头脑中出现的东西。它不允许任何随意抨击一个党或一个组织。社会主义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方案和秩序。社会主义不是自由竞争……它不可能支持生产中的个人主义，也不可能怂恿上层建筑中的任何个人主义因素。社会主义仅仅认可这种个性，它使每个人坚持这种方案，理解它的意义和必然性，并实际上这样去做。社会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随意行为；它需要有纪律的个性。社会主义不是资产阶级自由，社会主义不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是纪律。”

写下这些句子的作家是作为一个颓废派诗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开始他的事业的，当弗兰茨·卡夫卡还没有出名时，他便用捷克文在他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作品，但是现在，他以有过之无不及的坚定决心和激情，诅咒颓废派知识分子和捍卫残酷地对待“知识界”的现存权力，这个“知识界”被官方自身和它的忠诚的预言家视为人民的敌人。谁在苏联感到不自由？尽管他从来没有在那儿呆上一分钟，但他的回答却像是一个了解底细的人：“吸血鬼、寄生虫们可怜的废墟。让他们见鬼去吧！事实证明没有他们事情将做得好上一千倍。那些在理论上进行挑剔，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人，以他们的空虚和仇恨，不能承认这些成就。让他们见鬼去吧！颓废的诗人和艺术家，让他们见鬼去！……十个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抵不上一个忠诚的工人的生命，他们将死于他们破坏性的行为之中……”

难道还有比这样的东西更具深度地证明，这些预

言家是受他们盲目的世俗信仰的引导？证明那些被宣称为服务于人民、正义和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的崇高利益的文学，是如何转变成为有计划地奴役和为谋杀辩护的东西的呢？

预言家们总是倾向于提出质疑。那些将自己看作神的话语的使者的人喜欢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有关上帝及其意志的领悟和别人的这些相比较。世俗信仰的预言家们蔑视整个经验世界的现实。当这些经验越远离理想的概念和就近的承诺，预言家们便越不得不用漂亮词句来覆盖自己，用它们来扭曲和修饰自己。他们曾经是充满激情的，尽管有某种盲目性，将生活当作加以奋斗的希望，不管这有多么遥远和不切实际；而现在他们只是描述这种幻觉，把它们当作充满希望的生活本身。

由于采取这种立场看待他们的工作和使命，艺术必然要停滞。艺术家仅仅变成指令和决定的执行者和普及者。对他来说，对这些决定提出疑问和修改是不合适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着忠诚的信仰的作品便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它们不再从最初的想象力中汲取灵感，而仅仅从功利主义的、教条的和由权力定位的想象力中去汲取。作为张贴的一幅画对它所涉及的生活或所运用的艺术风格无能为力，因为当权者已经对此加以过问。这样一幅张贴画将难以对任何人说话，而仅仅是对他们进行灌输和劝导。

甚至在那些由政治权力所代理，或至少是进行鼓励的国家中，这样说教的作品，这种创作也逐渐地消失

了。艺术家开始要求写他们所看到的基本权利，去进行和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相适应的创造，尽管这将带来遭到迫害、被禁止和坐牢。也正是在这些国家中我们更难有机会发现任何真正的世俗信仰的预言家。老的预言家已经死了，同时并没有留下继承人。

社会主义文学，像大多数典型的表达中所说的，是从教条中汲取灵感（开始是给生活注入意义，后来很快站在准上帝和生活之间）因而已属于过去。然而，像每一个思想（或伪思想）倾向那样，在总的思想方式方面，它留下了其自身的轨迹，或至少是空洞的空间。

不断重申历史朝向一个明确的世俗目标（一个更高的社会秩序，更充足富裕，人类社会一种更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人们有权甚至有责任去运用任何可能的手段达到这个目标，这些东西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了普遍的模式。时到今日，在一般人的头脑中，仍然存在着一个含糊的但实际上是不可动摇的深信，相信历史真的是朝向一个更高的世俗目标。它也许被歪曲地解释、不太可能实现及错误地命名，但是它仍然在那儿。不承认这一点，不为此而工作，便是否定进步，（说到底，它的存在，不正由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提供证明?）当这种深信存在时，便存在着新的乌托邦梦想的危险，新的意识形态的危险，将会在充满膨胀的允诺下，再次将人类引向那种新的目标，而不管其代价如何。

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这种教条、预告、规则和预言与现实遭遇时将难以幸存。但是通过预言家的作品描绘这种信仰和带来普遍觉醒的“语言”被证明有着强大

得多的免疫力。“这种语言并没有死，死的是语言本身”（杰里·格鲁沙〔Jiri Grusa〕），它首先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禁忌的词汇表或有魔力的关联，其惟一的目标在于修正或简化现实，因而其世俗信仰的立场能被老调重弹。

想想在这个世纪，对这些概念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普遍理解中所发生的转折。想想深深留在这些概念上的烙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保守”或“右翼”或围绕在“进步”、“左派”、“人民”这些概念周围神圣的气味。（谁敢反对人民的利益，或那怕是大声说出这样的事实，我们这个世纪大多数滔天罪行都是在所有这些最含混的概念的名义下发生的。）还有关于“革命的”或者甚至“革命”这样的词？娜杰日塔·曼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回忆它的神奇的冲击：

> 赢得知识界的决定性的影响不在于施行恐怖和收买（上帝知道这两者就已足够），而在于“革命”这个词本身，没有人想反对它。整个民族都屈服这个词。它是如此有力乃至使人想到我们的统治者还需要什么样的监狱和死刑？

词语取代了证据。经常是词语便足以代表预言家唯一要求或判定的既成事实。捷克哲学家贝洛赫拉斯基（Belohradsky）曾经称之为“瓦解经验的语言”，他指出任何试图听从经验主义支配的语言的人都将被指责为主观主义或其他罪状（自然，是“反动的”）。然而，如

果语言要想重新获得意义，词语则必须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必须抛弃世俗信仰和其偶像对它们的奴役，在使用语言和接受语言双方的头脑中，消除超出语言真实含义的情感的重负。

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和其作家的命运，对任何思考它们的人来说，经常感觉到那像一部悲剧历史。许多作家写他们所写的，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是因为他们期望一个更好更公正的社会。他们的信仰令他们盲目和使他们的作品、他们试图想保卫的理想拥有悲剧结局，更经常的是使他们自己拥有一个悲剧结局。当他们看到他们道路上的失误时，一些人试图在作品中加以弥补，另一些人却过早走到了他们生命的尽头。

不管怎么说，因为我们要求一个作家的真实和诚实，我们将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一种道德失败而不是一个悲剧。他们的命运揭示了世俗信仰如何耗费了一个作家的特殊禀赋，最终是他整个性格。它令他盲目，使他远离现实。世俗预言家没有意识到上帝并不能由任何世俗的偶像来取代，正像在这个世界上组织得再好的社会也不能买来你的不朽。尽管其主观愿望是好的，最终他们的幻想连同其创造者必然陷入一种真空。从这种真空的深处，他们不再能观察到这个世界的真实轮廓，其中的事件；不再能到达最初他们想要出现在其面前的人民。

接受了这种关于世界的歪曲观念，允许其语言远离他的现实的作家（尤其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否定了所有创作前提：以他的良心才可以担保的他的独一

无二的真实。它也引发了对这样一个创作的基本假设的怀疑，即从根本上说，作家试图以他自己的探索和发现，去扩展人类意识、知识和人类经验的总和。难以想象这么一个伟大的概念却能够原宥一个作家所能犯下的最大的背信弃义、反对他自身、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

1988 年

我们的传统和发展的限制

当战争结束之时，我从差不多度过 4 年童年时光的集中营里回来，我不仅对德国的每一件事情怀有积怨，而且还被德国这个题目纠缠住。我贪婪地阅读文学中作者们所描述的他们在集中营所遭受痛苦和监狱看守的残酷。我的目光追随所有大的战争罪行审判，及所有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一切能够发生，一种在近代对文化作出如此众多贡献的民族，却如此突然地走上一条残酷的下坡路。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遇到一些完全不同于我在战争期间所遇到的德国人。他们许多人努力地想帮助我正在经历的困难，即我自己的国家滑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残酷形式。

这些环境和我的经验，使我相信这种野蛮化——作家卡莱尔·恰佩克称之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

化崩溃之一”，不可能归罪于某一个民族或国家，或任何可定义的人类团体。说到底，类似的衰落以前也发生过，而且我担心它们可能在这个星球的任何时间、地点再度发生。

发现这点还远远不能使我满足：我想要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一个人类天才们已经取得如此成功的世纪中，却有着两次劫掠性的世界大战、大规模的灭绝和死亡营？为什么人们如此疯狂地毁坏他们刚刚还如此尊敬的具有文化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引导这样多受过教育的人们不存戒心，甚至兴高采烈地接受那种公然违抗欧洲文化人道主义传统的行为？

有效的消息和目击者的报道越来越确凿地表明，本世纪上半叶在这些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俄国、墨西哥、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稍晚些时候还有智利和柬埔寨，它们也许有着不同的起点，但是在文化结果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是否不论环境如何，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一触即发的原因，使得总的文化方向发生突然的和生硬的改变；是否存在着——再次用卡莱尔·恰佩克的话来说——“一种由知识分子造成的巨大的出卖”，它导致“每个人的野蛮化”。

当然这种崩坍还有一些原因根深于社会和经济领域，不仅仅在于文化，但是由知识分子导致的几乎是莫名其妙的对文化上的背叛却是非常醒目的。它是否真的表明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背叛，对我们从中学习的传统的背离，或者充满悖论地是这种学习的后果？

在黑格尔哲学史的序言中，他写道：“每一时代所

积累起来的遗产——一种神圣的庙宇，在这里面，人类的各民族带着感谢的心情，很乐意地把曾经增进他们生活的东西，和他们在自然和心灵深处所赢得的东西保存起来。接受这份遗产，同时就是掌握这份遗产。”掌握这份遗产，他解释这意味着保存和发扬在知识领域中，人们从更早的年代所继承下来的每一件东西。“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同样也是每一个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对于已有的科学加以把握，使它成为我们自己所有，然后进一步予以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①

在这里黑格关于科学所说的也可以运用到所有文化领域。强调连续性和发展把文化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是一种有机动力论的表达，是关于递进能力的表达，而对我们所熟悉的其他主要文化来说，都没有获得这种程度的成功。从这个有机动力论出发，早先欧洲人的发明和创造层出不穷：日益增长的个人自由的重要性，相信行动，相信个人可以为共同的改造作出努力，并支持刺激这些努力的竞争。

这种有机动力论和对我们前辈精神和知识遗产的责任感是好几个世纪的产物。欧洲是逐渐变得文明起来的。三个世纪以前，妇女还因为是巫婆和魔鬼的妻子在柴堆上被烧死，同样被烧死的还有坚持一种不同的信仰体系的异教徒。然而，在 18 世纪末，欧洲的气氛开始改变，残酷的、远古时代的习惯明显衰亡了，到

①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 卷第 9 页。

19 世纪，在各个领域中的人类努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人权和公民权的提高，证实了人道主义传统最终将得到胜利的我们的信仰。甚至从此以后的战争也将“人道地”进行：最早的是 1864 年在《日内瓦公约》中提出的一系列规定。即使普遍的贫困仍在持续和社会不公正仍在产生压力，而假如人说在欧洲任何地方重建过去那种专制主义的或暴君的政府，抑或有人提出控制一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像不久前教会所做的那样，都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时代产生了尽善尽美这个概念，即关于人类可能不存在任何限制，同时产生了许多幻觉、毫无理由的希望和不切实际的梦想。

接着在本世纪前 30 年，这些革命事件和崩溃接踵而至。如果有人想从根本上找出这种向着野蛮化的现代倾斜和欧洲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便可能假定这种传统已经遭践踏、被破坏，或至少深深误解了。但与此相反的结论是不是也存在？在下述这些最内在、最富有激发性、最有价值的东西中，难道不是恰好包含了对这种崩溃的谴责：欧洲的有机发展论，它的竞争精神，其进步的概念，及人有责任抓住当前并将其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样的原则。

我们内部的每种东西都起来反对接受这样一个结论。说到底，我们在本世纪所经历的灾难性的经验都告诫我们，任何放弃传统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王国，一个更好的秩序，便打开了通往真空的大门，最终都将导致崩溃。

尽管抛弃传统的做法显然是轻率的，但我们还必

须经常检查和纠正其中错误的设想。关于无休止的进步和改进观念，我们的机遇、源泉、目标将不会也不必受限制的概念。这样的假设同时涉及精神和物质领域。当我们现在承认在物质领域中这是一个错误时，我们仍然相信在精神方面和知识方面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发展而没有障碍。但这种情况实际上怎样呢？

1898 年，墨西哥作家维多里亚 · 萨拉多 · 奥瓦瑞兹（Victoriano Salado Alvarez ）写下了这段关于欧洲文明和文化出色的预见：“在欧洲，所有这些——大城市和个人舒适的好处，廉价的多样化的娱乐，理论上的冲突和自相矛盾，多得令人惊讶的书籍、铁路、电报线路，对已经用过的每样东西的厌倦及渴望那全新的东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厌腻、堕落和精神病，无数类型的歇斯底里和若干种愚蠢，包括音乐和文学的愚蠢。”

如果我们想想现代绘画、音乐、文学、哲学、法律或任何其它人文学科（包括医学，现在它可以将濒临死亡的痛苦或无意识延长好几个月，如果不是好几年的话），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是否这些规则已经达到了它们潜力的限度？它们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它们能够走出的那么远？抽象画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顶点，艺术家只须用同样的颜色在画布上再盖上一层，或一根简单的线条或根本什么也没有。在这样的行为之后，不管有人如何称赞它的原创性和革命，剩下来的只是什么也没做。在这样一种行为中我们仅仅能看到视觉艺术死亡的一个预兆。作家们正在寻找新的故事，于梦境中汲取灵感，与大城市地下世界或发狂的谋杀凶手们

为伴。其余的人则试图打破传统的叙事，瓦解或中止真实的时间。但是，当乔伊斯或贝克特最极端的作品创下晦涩难懂的极限之后，文学的探索已经走得不能再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断层则开始显露。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哲学家身上。在他们的探求和语言中，他们已经过分远离不专门从事哲学的人同样感兴趣和能够理解的问题，还有什么俗人对哲学感兴趣，能理解胡塞尔或卡尔纳普的沉思冥想？

在所有创造和研究领域中，大量的努力用来轻蔑地抛弃前人已经建立的限制。同时，因为继续和发展的需要，便必然的糟蹋和遮掩已经获得的成就，或给过去的发现安上一个新名称而已。甚至对有创造力的人来说，高高在上的限制也像一堵墙。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呢？

对海德格尔进行解释全部努力的最终结果，你可能不是发现上帝，便是发现真空。

教育和环境都引导知识分子看到在对前人遗产的发展和扩充中他本人的作用。然而，如果他发现已经无事可做，他就不可避免屈服于挫败和失望的情感。他是如何解决在他所向往的东西（以及别人期待他的）和他事实上能够建树的东西之间的冲突呢？

他可能花费巨大的努力仅仅是去克服这些界限，或者他可能放弃。他也可能试图逃离：进入一个理想化的过去或理想化的未来，从一个理性王国到一个由信仰（它不知道那些限制）所支配的地方。

在他从事延续欧洲知识和精神传统的模糊印象

中，知识分子发明了与拯救有关的民粹派的前景，这种前景企图使得创造性作品重新取得意义。“它将是一种自由的文学”，列宁在世纪之初允诺道，在提到一种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时，他说：“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①

伟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迷人，或者是因为它们想象一个较少有疑问的过去，或是展望一种美妙的未来，于其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得到每样东西。他们经常是迷人或朴素的论据及允诺更多地需要信仰而不是理性，如果知识分子不是被失望、无用和需要逃避的感情所支配，这些东西很少能获得大规模的流行。

然而，不仅是知识分子，或那些想要从事创造的人感到失望，同样接受者，即观众也感到失望。阿尔伯特·斯庇尔（Albert Speer），曾恰当地指出纳粹的知识分子根基，他在回忆他的老师坦森奈尔（Tessenow）对他说的某些东西时说：“以某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去思想的人必定会出现。今天的思想已经变得太复杂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农民，正像他实际上所是的那样，在应付所有这些问题时将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因为他还没有受到污染。他也有力量能实现他的简单思

①引自《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1 页。

想。’(阿尔伯特·斯庇尔:《在第三帝国内部》,考林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 页）实际上许多受惠于文化的人的生活也已经被迫转向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转向背离当代精神、背离那种思想运动和革新，这种断裂已经使他们感到不安。从对他们说话的人中，他们期待着一个有意义的、能够理解的信息，而不只是接受更多、更富有挑衅性的革新的东西。观众感到知识分子已经将他们抛在后面。这势必引起对思想和精神价值的抵制和冷淡，但更主要的影响是为许多人打开了通向伪价值及对于一种理想化的过去或得到拯救的未来的简单化图景的大门。

观众和这样的知识分子分离开来，这些知识分子迄今仍然忠诚于他们所理解的东西，将其视作自己的内心冲动，去发展他们从中继承的价值。观众们加入到另外一些知识分子中去，这些人和他们本人一样，在寻找一种逃避。他们遇到了一种日益加剧的普遍的坍塌，因为没有人加以制止。

在这种联系中，值得考虑的是为什么极权主义制度，不管他们采纳什么意识形态，都拒绝现代艺术和现代人文科学，将其视作不可理解的、堕落的或异己的东西。通常的解释是他们害怕革新，害怕非传统的思想和表达。事实上他们仅仅正确地推测，他们这样做将赢得大多数人的拥护，更多的人将首肯他们对于现代思想和艺术的谴责，甚至在那些失望的知识分子中间。我不敢宣称我自己年轻时没有经历的先锋艺术家令人注目的变革，他们曾经深信实验，后来如何转变成早期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徒。他们现在相信有一种对“千百万劳动人民”来说能够理解的文学。当然，许多人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或恐惧，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是摆脱他们所受的约束及更加接近观众的一种途径。（极权主义制度很快失去了对知识分子的偏爱，也失去了对这些“观众”的偏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制度本质上残酷地求助于暴力，很快使他们从所有富于创造性的人们中异化出来。）

这些事情是如此复杂，他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原因来解释，而且这也不是我的意图。我仅仅想指出在精神领域中有关限制的必然性。所有精神的努力，包括现在和未来，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而它比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

那些在物质领域提醒发展的限制，要求我们改变自己的期待、目标和生活方式的人，并没有要求我们返回到石器时代。如果我们同意在精神领域也需要限制，这也并不意味着要求人们返回到野蛮时代，或者我们要拒绝传统，即使有时候它是建立在虚幻的假设基础之上。恰恰相反，我们文化的有机发展论，说到底，它有能力承担一种不断的自我估价，一种对危及其自身的每一件事情的意识。这意识也将能够克制自己的急躁和证明自己的妄自尊大是危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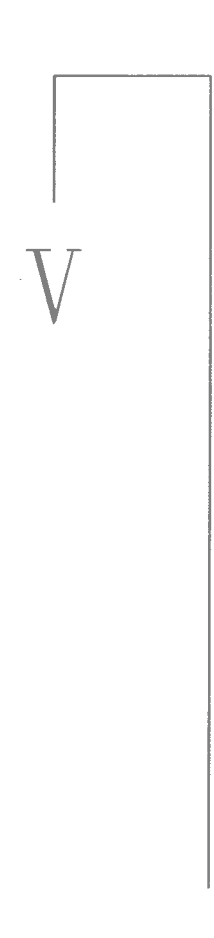
一次我重读卡莱尔·恰佩克，在半个世纪以前，他便对知识分子集体的瓦解感到困惑，并且试图理智地给出我们时代文化的使命：“至少去了解某些经验，了解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知识和价值——并且不要离开

地面，不要滑到已经达到的水平之下。是的，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是保护性的……迄今为止，文化首先表现为和所有人类行为的一致；它不能失去这一点………去保护这些如同一场占领和征服一个新战场的严峻斗争。如果人类精神仅仅感到自己有权利去冲锋陷阵……而不去保护已经赢得的成果，那么，它将是一个不合格的战士……”

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会认为，还有某个地方仍然带着最初的神秘的面纱，它不可被富有创造性的人们发现，也没有人以为在不知不觉之中，某些事情从整体上已陷入衰落。但是我们必须从本世纪带来的文化衰落中得出我们的结论。一个时代如此看重高效率，如迅速的发展、竞争、变化、进步、革新和新式样，通常以抛弃其他的价值为代价。它将富有创造性的人们在许多领域中带入极限，有关可能性、可以接受、可以使用和能够理解的极限。许多当代优秀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著作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例如，我的同胞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中已经发展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形式，这种形式返回到了我们文学传统的源头，返回到一个时代，于其中哲学或历史学的沉思在小说中起着和叙事或预言同样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是我们正在进入的那个时代的预兆，这个时代必须是更加“生态学的”。它必须捍卫和保护前人的价值，并试图使它们广为人知和分享。它不会轻蔑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仅仅”寻找一种我们都能理解的一种语言，因此试图缩小在不同的艺术和科学领域中工作的人们之间危险

的距离。越来越显著地，我们将同时以两种身分出现：在自己的领域中是行家里手，而同时在别的方面，则是局外人，被动的观众，在那里和任何人一样处于较低水平的位置上。

1990 年



刀剑在逼近

——卡夫卡灵感的源泉

50 年代初期，即直到我 25 岁之前，我对卡夫卡一无所知，那时我已经从布拉格大学捷克文学和语言学系毕业，但是我们的大学讲座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位土生土长的布拉格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当时他应该被归在捷克文学之中。

1957 年，一本收入 20 世纪重要作家作品的十部中篇小说集在布拉格出版。其中最后的标题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在这之前，我的研究全部在于现实主义作品，但是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卡夫卡的故事给了我巨大的冲击力。无疑地，我感到这是有关我自己生活的一个寓言。仅仅在几年之前，我不是正像那些无辜的囚犯那样，被迫躺在一种行刑机器的“床”上？我目击了那些穿制服的刽子手，他们认为自

己的恐怖行为正好是合法的和确切无误的。而我，后来居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从毒气室中被叫回，正和被判有罪的士兵被从死亡边缘上叫回来一样。

像几乎每一个在集中营熬过时光的人那样，我读了那么多其中充满谋杀机构制造的令人恐怖的细节的书，我的头脑开始抵制它们。但是，卡夫卡关于具有行刑机器和狂热执行者的一个荒芜山坳的意象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不可能回忆起以前读任何文学著作像这样深深地吸引我。

1

从外表上看，卡夫卡的生活展现为一种正常的、几乎是单调的式样。一个举止良好的年轻人，不情愿地结束了高等中学阶段，接着又以一种心不在焉的方式学习法律。一个模范的事务所办事员，平静地在一家保险公司履行他的责任，逐渐地，甚至有些犹豫地，走着他的晋升之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徒劳地试图克服对婚姻的深深反感。解除婚约之后，大部分的假期都花在奥地利或波希米亚的疗养地。夜间写作。身体上的种种不适：失眠、周期性偏头痛、疑病症。在他生命结束之前，一种晚期的肺病。几位朋友，以及和他作品的品位相比显得令人惊讶地世俗化的几种爱好：农艺、园艺、游泳，与一般市民的兴趣没有什么两样。他并不是教徒，对政治只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尽

管有一次因参加无政府主义之类的集会被布拉格的警察所驱逐。他是一个犹太人，生活在布拉格的捷克人世界中，用德语写作，但是这些矛盾似乎并不对他的日常生活造成妨碍。

如果说卡夫卡个人的生活倾向于平淡，那么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情形就不能这样说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历史上最动荡的一个时期写成的。当他 21 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他没有应募，但是他不能摆脱战争造成的后果。布拉格饥饿和悲惨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残酷、痛苦和暴力死亡围绕在他的周围。接着而来的和平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而布拉格——卡夫卡的出生地——成为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接着发生了匈牙利和德国的革命，还有其他地方的社会动乱，甚至在布拉格。在俄国，正在发生内战。

大多数作家都卷入了社会事件之中，卷入了外部世界的活动。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成为见证，发出警示，展现走出灾难的道路，寻找一种更好地组织社会的方式。他们的作品被革命事件和观念所耗费。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这种东西。1914 年 4 月 2 日，在他的日记中只有两个句子：“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这种将一件无关紧要的个人细节与重要的世界崩溃的事件联系起来，可以或者说应该看作一个格言，一把解开每一部卡夫卡作品的钥匙。那个时代的外部世界完全不同于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在他的日记和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将注意力如此集中于他自身，他的病，他的梦，他的焦虑，他最

琐细的日常活动。像爱丽丝·卡内蒂所指出的：“在涉及他的个人生活和内在生活时，他绝无类似的轻率，这使得有想象力的作家区别于二流作家。”卡夫卡本人，在战争的开始，也写道：“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

要想了解卡夫卡作品的意义和详情，人们必须先去寻找他的内在世界的规则和秩序。

这个布拉格的法律学生从外表上看有着一个平静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像查尔斯·狄更斯那样受饥饿之苦，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被拖出去判死刑，也没有像他的许多同代人具备逃离战争恐怖的经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内在生活没有戏剧性，不受激情支配，或从来不存在被行刑队瞄准的想象。

在他写给那位捷克记者、翻译和作家密伦娜·雅申斯卡的一封信中，卡夫卡这样说起自己：“我精神上病了，我的肺病仅仅是精神上的病移到了内部。我以这种方式病了四年或五年，甚至从我第一次订婚开始。”尽管卡夫卡往往夸大他的虚弱、无能和不舒服，但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一样脆弱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生命的晚期，他仍然记得由他父亲早年所施加的内在伤痛，后者为了惩罚他，将他在夜间叫醒并把他单独锁在阳台上。他所受到的伤害，在后来出现在他生活中的人们看来，也许不超出通常的父母管束。但父亲教给他的不信任，则是那个潜在的并被隐蔽的原因。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在商店里和在家里，你试图

反复向我灌输不要信任大多数人……然而奇怪的是，它从来没有特别地构成对你的心理负担……当我作为一个孩子时，这种不信任并没有在我的眼中得到证实，因为我到处看到好得难以企及的人；结果这种不信任转变为对我自身的怀疑，转变为对其他每一件事没完没了的恐惧。”

密伦娜·雅申斯卡在描绘卡夫卡时写道：“对他来说，生活彻底不同于它在别人那里所显现的那样。钱、证券交易、国外交易市场、打字机，他把它们看作具有神秘意义的事物……对他来说它们是奇怪的谜，他与它们的联系完全不同于我们。你以为他的事务所的工作像通常的工作别无二致？对他来说一个事务所——哪怕是他自己的——是某种神奇的东西，像一个小孩子眼中的火车头。他从来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

一个不能被剥去其神秘外衣的世界，一个既不能适应也不能理解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迷宫，想要进去必得通过许多道入口，而所有它们都被锁着或被人把持着。它是一个引起焦虑和不适的世界。卡夫卡写道：“要意识到这种幸运：你脚下所站立的地面不超出你脚面所覆盖的地方。”

“在这个世界上他感到被关押，被禁闭；感到被悲哀和无力所压倒；他头脑中关于囚犯的狂想导致了他的疾病，他不需要什么安慰来安慰自己，因为这全部的安慰恰恰是一种借助于被囚禁的残酷事实而获得的脆弱的、叫人头疼的安慰。”于是这个世界是一座如此陡

峭的大山，几乎无法攀登。“如果你在平地上行走，试图作出艰苦努力但却迈不出一步，那么这也许是绝望的一个来源，但是当你攀登一面陡坡时，它陡得如你在山底下所看到的那样，那么你无力攀登的感觉也许仅仅是地势使然，你便没有理由绝望。”这个世界看上去总是在威胁卡夫卡，使他不安，并且他总想逃离，总是“闩上门窗和这个世界对抗”，然后重新决心和这个世界决战一场。“没有人仅仅从知识中能够得到满足，他还必须试图根据他所知道的而行动。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被赋予那种力量，所以他必须毁灭自己，尽管那是一个危险；他也并没有因为将自己毁灭而获得力量，但是除了这种最终的尝试之外他没有其他办法。”

在这场斗争中，卡夫卡从来没有找到那必需的力量，他总是从那顶峰退却。他将此看作一个令人羞辱的失败，作为他无力长大变为独立的人的依据，无力跨出未发育成熟的那样一个边界，在那里，他至少可以得到保护。“我从来没有到过成人的年龄”，他悲哀地说：“我将从一个孩子直接转变为白发苍苍的老翁。”在29岁的时候，他写道：“我被赋予这张可鄙的孩子气的外貌，我同样也认为不配为自己准备一个伟大、严肃、富有男子气和责任感的概念。那种未来对我来说通常是不可能的，以至我所向前迈出的每一小步几乎是装模作样的，而下一步则无法达到。”

到他生命的终结之时，卡夫卡的行为已变成完全是他个人风格的，在某些方面，是孩子气的。他总是试图以他的受苦，他的恐惧，他的虚弱，他的孤独，他的疾

病来制服他所感兴趣的女人。他试图获得她们的同情。在 1912 年日记的开首，他就解释他为什么（缺少力量的缘故）为了写作不得不放弃他的所有爱好和兴趣，“现在我的发展结束了。我尽可以断言，我已经牺牲了能够牺牲的一切，现在只须抛弃我的事务所的工作，便可以开始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于其中，伴随着我的工作的进展，我的面庞最终将会自然变老”。

然而，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卡夫卡从来没有主动情愿地撂开他的工作，就像他从来没有建立过一个家庭，或从未完成他的一部更长的作品。

对卡夫卡来说，紧张的反省产生于他无力改变他的生活环境。如果他处于保持被动或在外表上是无助的情况下重新启动生活时，他将变成它的主人。但他却通过非凡的推论，预见到了他处境中所有的变数，并为自己的未来做好所有的准备——当然是更加成功的——与生活交战。可以被分析、描述因而可以作出判断的东西，这个世界的模棱两可和矛盾性、事物的复杂性、他的精神所拒绝接受的每件事情，如果不是完全无害的话，那至少是可以忍受的。甚至他自己的“自我”，也可以被划分为这样一个东西，其一赞同可以被认可的甚至是有吸引力的那面，而另一个的“自我”则充满恐惧和厌恶。

然而，一次又一次，生活证明比哪怕是最聪明的头脑所能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一百次，他准备与费丽丝·鲍尔结婚，或者和密伦娜·雅申斯卡幽会，他把赞成和反对这些计划的理由都列出来，准备向前迈一步，然而

事情都在它们开始的一瞬间崩溃，于是暴露了其因行动的缺席而更为痛苦的那一面。“他已经看到了两种景象，第一种是安宁平静的，充满生气的，没有令人讨厌的反省那样的满足，它们的范围和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甚至对荨麻这类植物来说，如果它想生根，便要求墙上开出一条大的裂隙。但是这些活动根本不要求空间。哪怕不存在任何缝隙，成千上万的它们也可以彼此纠缠在一起生存着。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在一个瞬间，一个人被召唤前来表述，但却不能发出一个音节，因此又被抛回反省之中。但是此时，因为毫无指望，他也不再四处踉跄挣扎，内心变得狂躁不安，只须一个诅咒就会让他沉没。”

卡夫卡所喜爱的作家之一克尔凯郭尔说：“将仅仅产生可鄙的积怨。”由于没法对他周围的人积怨，便把这积怨倾注到自己身上。他抱怨他的外貌，他的身体（“我，一个森林里的动物，很少有在林地上躺着的时候，我躺在一种肮脏的坑里，——当然，那坑仅仅是我自己存在的一个结果。”）他恨自己的虚弱，他的工作，他的单身生活，他自身的存在，他从中感到的是愧疚的一种源泉。他贬低他最关心的每一件事，他的精神，他的能力、他的才华，他的作品，他伤害自己的身体，并考虑毁掉他写下的所有东西。

生活如果不通过行动使之丰富，不以奋斗努力代替反省它将会变成越来越不可理解，不可琢磨，越来越富有敌意。它引起焦虑和衰竭。

他的日记，他给费丽丝和密伦娜的信，充满了这种

困乏和焦虑。这是置身于一个大世界中的一个小小的、少不更事的孩子的焦虑，是有意识的人担忧将事情全部想透、担心成功、担心把他所理解的东西转变为行动的恐惧。“你有 30 岁，但比老年可能使得你变成的那样更加疲倦困顿。或者，更准确地说，你根本不疲乏，仅仅是得不到休息，你担心在这个世界上迈出哪怕是一步，世界将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这就是为什么你将总是把双脚悬在空气中。”“这是肯定的，离开你之后我将不能生活，除非我认可我的恐惧，并且我这样做不带有什么强制性，反而带着愉快：我不知道它的内在法则，我仅仅知道它将手卡在我喉咙上，这真是我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将卡夫卡拖离这个世界，拖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事物和人类关系保持着它们的神秘性，在那儿他是那个决定事物形状的人，在那儿他既是被审判者又是审判者，既是猎物又是猎人，既是国王又是那信使，在那儿他至少可以幸福一小会儿，一直到他能够“将世界托起来置入纯粹、真实与永恒之中。”

2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被别人写了这么多书和文章的艺术家，一个以其魅力吸引了许多二流作家竞相模仿的人，一个认为文学，或至少是自己的写作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的人，居然没有写下什么关于文学和

他自己文学信念的东西。

除非去刺激它，或问一个直接的问题，卡夫卡并没有习惯去谈论任何与他本人不直接相关的事情，甚至在信任中也是如此。那些思想观念、哲学体系、别人的著作，都在他直接的兴趣范围之外，就好像他对待某次战争中的战役，由政治家和外国革命家发表的讲演一样。卡夫卡完全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是否有能力从理论上去思考问题，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妄念。“我没有对任何东西的记忆，不论它是我所学过的还是我阅读到的东西，我所听到还是经历过的事情，以及对于人还是事都是如此。我感到我什么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也没有学习过，实际上我知道的不超过一个小学生，并且我知道的都是浮泛的，而任何第二性的问题都超出我的解答能力。我没有能力思索；我的思考总会碰到极限。我偶尔也能抓住个别事物的本质，但我没有能力作连贯性的思考。我甚至不能恰当地讲一个故事；事实上，我几乎不能谈话……”非常奇怪的是，他把这番自我剖析夹在向费丽丝·鲍尔求婚的信中。过了一些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和别人谈话是很困难的。因为我的思想，或者毋宁说我意识里的内涵，简直是一片雾蒙蒙的状态。就涉及我本人而言，我并不感到担忧；我有时甚至对自己很满意。但是与别人交谈，要能够给出一个重点，保持谈话的协调和连续性，这是我不具备的素质。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坠入云山雾罩之中，即使有人愿意，他们也不能赶走我头脑中的云雾。”

不考虑其中言过其实的成分，像卡夫卡所有消极的自我表白一样，这些关于他自己思维的评估，也许可以被理解为他对于复杂的理论思维厌恶的一个表征。即使卡夫卡从逻辑分析中得到享受，即使他喜欢将生活环境中内在可能性细细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灵感还是建立在他自己对于世界的经验之上，或者可以说来自于他基本的生存的经验，而不是根源于沉思的观念领域。的确，这些经验采取了一种几乎是梦幻般的视觉形式，从这些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想象中，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一个新的世界，它如此远离最初的激发，因而失去了由直接经验带来的透明性和力量。许多显然是非逻辑的故事情节和象征。诱使读者进入广泛而多样的探寻，并经常作出矛盾的解释，因此卡夫卡著作中的精神密码可能被解释为一种原创性的观念，或者是宗教的或者是哲学的。但这个立场是建立在对卡夫卡如何创作这一问题的基本误解之上，它一直和我们对于他的作品的接受和理解相冲突。

《在流放地》是卡夫卡所完成的最长的一部小说。和他的其他作品相比，这本书的背景是异乎寻常的，对于令人受折磨的行刑机器的描绘和它如何工作的解释泄露了作者的受虐狂。这部作品非同寻常的一面是，通常和他的主人公相认同的卡夫卡，在这个故事中他却在两个主人公之间摇摆不停。“困难在于卡夫卡的写作，尤其是‘在流放地’，给读者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卡夫卡自己所采取的立场既像是军官又像是旅行家。”

在这一小说中，有好几种关系难以解释，其中最重

要的和最复杂的是那个军官和他的机器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作为一种象征的想象中的恐怖机器到底是什么？被输入其中的是什么样的命令？为什么那个旅行家不能阅读它们？为什么这部机器正好在那个军官躺上去时崩溃？在由犯人那里落到军官手中并又归还的那块手绢有什么含义？为什么那军官选择了死亡，仅仅是因为旅行家拒绝支持他？为什么在一间茶馆里突然发现那位老司令官的坟墓？在他的坟墓上的碑文说明了什么？

这个故事引起了许多矛盾的阐释。它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一种残酷法律的描述，或它可能代表一种倾轧社会中的非人性化现象。这个故事的比喻看起来描绘了我们的文明机器始终和一种野蛮的传统相结合，并显示了这种联盟的可怕后果。在象征的意义上，它代表了写作是冷酷的自我牺牲的行为。或者，它代表了一种残酷的古老的宗教传统：那个行刑机器可以被破译成："作为一种祭坛，在那儿人们以一种可怕的偶像的名义而牺牲——这就是法律。"而这部机器的崩溃"变成一个新世纪到来的基础，那是一个更为人性、更为理性的世纪。"

这个故事最惊人的东西不是那奇异的地点（在任何意义上，它如同在卡夫卡大多数散文作品中一样难以形容），而是对于行刑机器富有魅力和充满细节的描述。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任何对于技术的描写都是极少见的。（《布雷齐亚的飞机》是惟一的记者般的速写，是卡夫卡在马克斯·布洛德的建议下写的），如果在《美

国》中出现一种电话交换机，或放着一只标准钟的桌子，或在《视察矿井》中所出现的一只测量装置，那么，这种将技术作为对象仅仅是偶然的。但是现在，突然在他最长的作品中自第三部分始，连续有着这种可怕的机器以及它怎样工作的描写。的确，作者在好几处中断了他的描写，但是他又返回到此，好像为了加强这种观念。在这个故事中，这部机器是最重要的东西，而其他每件事情仅仅是附带的。

如果说卡夫卡大部分故事都是从他最内在的个人经验中汲取主题，那么，什么样的经验可以代表那种行刑机器的想象？在给密伦娜·雅申斯卡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知道，当我试图写一些东西（关于我们的约会），那些在我周边对准我的刀剑便开始慢慢地逼近我的身体，它是最彻底的折磨；当它们盯着我看时，这是如此可怕，乃至在最彻底的尖叫中，我背叛你，我自己，每一件事情……"

卡夫卡对婚姻的前景感到恐惧。在这封信中他所使用的意象准确地使人回忆起那种行刑机器，因此，这对考察写作《在流放地》时的境遇不无启发。

在卡夫卡的日记中首次提到这个故事是1914年秋天，同时提及的还有《审判》的开端章节。这两本书都直接跟在影响卡夫卡生活的两起事件之后。在认识了21岁的费丽丝·鲍尔之后，于6月1日卡夫卡在柏林鲍尔的家中与她举行订婚议式。但是6个礼拜之后，还在柏林，在阿斯坎饭店有过一场奇怪的会谈。除了卡夫卡和费丽丝，还有另外几个人在场，其中有费丽

丝的妹妹埃尔娜及她的朋友格蕾特·布洛赫。在他的日记中，卡夫卡把这次会谈归结为“审判”。显然卡夫卡未来的婚姻被讨论过。在被证实之前，那位未婚妻表达了她的恐惧和对未来新郎的指责，一句话，她“公布”了她对于未来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的看法。对卡夫卡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他从来没有将婚姻视作一种结局，视作他生命的完成，并且他反对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观念。“不是我不需要这样的一间屋子，而是如此一种观念把我吓坏了。”他试图解释他的矛盾心理。“在我内部总是存在着两个冲突的自我，其中的一个是你想让他成为的那种人，如果他还要有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他将如你所愿取得一点成功。在阿斯坎饭店你诅咒我的那些和这个自我没有丝毫关联。然而，第二个自我，除了工作什么也不想；这是他惟一的兴趣。这两个自我被捆在一起互相斗争，但是，这不是通常的一场斗争，于其中它们只是试着互相挥挥拳头。第一个自我依赖第二个自我；第一个永远不会……取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第二个自我取得胜利时他会感到高兴，而一旦第二个自我感到无助时，第一个自我立即会相帮于他，并除了他其他什么都不考虑。’当然，3个月以后卡夫卡将全部这些告诉了他的未婚妻。在“审判”期间，他始终沉默，费丽丝由她的家庭成员陪送前来让他感到惊恐。然而，他保持沉默，并不是以蔑视的方式，而是因为他对她的指责没有根本的异议：“我知道每件事情都已错过……我不能挽救这种情形，只有通过做出某些惊人的坦白，但是这儿已没

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了。”

6 周以后，婚约解除。卡夫卡再次看望了费丽丝的父母，接着又给她本人写信。他将这封信描绘成一封“在绞刑架下写的信”。不久，他和他的朋友恩斯特·魏斯（他反对和费丽丝订婚这件事）去了海边两星期。卡夫卡在日记中简短地描绘了这次婚约：“他像一只野兽一样手脚被捆住了。假如他们把我放到一个角落，使用真正的锁链，警察站在我面前，把我丢在那儿，并供人观赏，情况或许也不会更糟糕，而这是我的婚约，他们试图把我带入生活，当他们这样做没有成功时，就一任我像以往那样。在所有这些人中费丽丝是最微不足道的，而公正地说，她最有权利这样做，因为她受的苦最多，对其他人来说仅是一个短暂事件对她却是一个威胁。”

这和《在流放地》中最初出现的意象没有什么不同。在那里，“除了那位军官、旅行家和士兵之外，只剩下那个被判刑的人，囚犯显得很呆蠢，张着宽大的嘴巴头发凌乱，一脸放纵的样子。那个士兵手举沉重的大铁链，大铁链连结着锁住囚犯手脚的更小的链子……在任何情况下，那个囚犯就像狗一样恭顺，他们那好像尽可以允许他在山坡上奔跑，他们只需要吹个口哨，他就会跑回来……”

其中令人着迷的细节是那个军官在描绘他的机器时的暗示，他比所有其他人都先占用这个机器，但是他不仅仅是囚犯的死刑执行人，他也是检查官和法官。

由描绘那个机器最初的段落中所作出的揭示，于

《审判》的基本场景中得到了回应。《在流放地》中，军官指出了囚犯的罪过，主要是当他的上司鞭打他时，囚犯大喊道：“放下你的鞭子，要不我吃了你！”换句话说，他的罪过仅仅是试图用口头威胁阻止肉体上的暴力。这也变得很明显，那个囚犯就像《审判》中的约瑟夫·K，并不知道已经宣告的对他的裁决。“将其宣布已变得无关紧要。说到底，他将自己经历这一切。”那位军官说。被宣判的人也没有任何机会保护自己。对此无可解释，他被告知说。“我总是据此来决定的原则是：有罪总是不容置疑的。”这位军官的话几乎逐字逐句被《审判》中的画家蒂托雷里所重复：“一旦法庭对某人起诉，那么他就被认定有罪。”

约瑟夫·K从来没有被给予正当地保护自己的机会。卡夫卡，在他的柏林“审判”期间也保持沉默。《在流放地》这个故事中，囚犯甚至有一次被用毛毯塞进嘴里。因此，那个囚犯和那个旅行家（目击者）沉默地听着那个军官煞有介事地、情绪激昂地和令人恐惧的解释。他们知道执行过程将需要12个小时。对前6个小时来说，囚犯依然显得生气勃勃（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宣称，关于囚犯将遭受的痛苦，但是，这个时间段事实上和另外的现实相关，因为订婚正餐也许延续恰好是12个小时，并且对卡夫卡来说，他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得出这样的结论，于其中，他发现自己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但是后6个小时，这个人将怎样陷入沉默！即使是这个世界上最粗笨的人也将明白过来。”至于后6个小时，没有别的，那个囚犯将通过他的伤

痛，仅仅作为这项裁决内容的译码。于是“耙子刺穿他，他被扔进一个坑里，倒在一张沾有血水和棉絮的床上。执行便算完毕……”

比较起来，《审判》中的法庭是腐败的、卑鄙的和恶劣的，而流放地的那个军官则全身心地献身于他的事业，他的真理。即使他所描绘的东西看上去像恶魔般的、冷血的杀手，但那个军官相信，他是在捍卫一种最高正义所需要的一种可靠的、真实的和传统的仪式。当他了解到一切事情都转过来反对他，他努力维护那项仪式，挽救那部机器，从而也是挽救“他的老司令官的遗产”而遭受失败时，作为对他自身罪过的一种谴责，他写道“：要公正！”但是那个旅行家，对军官给出的这两个词，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阅读它们。“也许我相信，”他说，“这儿是这么写的。”

当那位军官为那部将要给自己行刑的机器编排好程序并置身于自我毁灭时（这个机器不可能使他幸免于死，就像一桩婚姻没有另一个搭档不能作出结论一样），他从衣领下面掏出了两块女士的手绢，把它们还给那个囚犯。这是偶然的、几乎是梦一般地暗示出一种女性成分，因此也暗示了这个故事真实的灵感来源。

现在为卡夫卡所真正认同一致的性格是一目了然的：那个处于无助状态的囚犯，背负罪过却对自己的罪行一无所知，他面对一部机器，它根据旧有的、难以辨认的、不可解释的命令以及古老的但却是富有敌意的法律而行事。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外部力量的干预，这个法庭残酷的逻辑不可思议地恰好转向反

对那个起诉者。受害者逃脱了，尽管没有从那片土地上逃脱，惟一能走掉的是那位旅行家，即目击者。而受害者甚至未能逃脱那个行刑机器所能控制的范围，也未能摆脱它的代理人，对后者来说茶馆中墓碑上的预言对他正好适用。

弗兰茨·卡夫卡和他的朋友登上了小船。作为一个自由人他离开了法庭去了海边，这个故事的结尾显得这样有说服力。但是他的下一个主人公，约瑟夫·K，却没有从执行人手中逃脱，他被赋予一种奇怪的审判。

3

卡夫卡从“柏林审判”返回不久就开始写作《审判》。约瑟夫·K在判决之前受折磨的经验持续了12个月(与《在流放地》中的12个小时正好相对应）。它采取了这样一种审判的形式，其中被指控者屈服于一种神秘的、难以接近的法庭。像在流放地的故事一样，有罪的问题并不是审查的主题。被指控者实际上没有赦免的希望。关键是在一个正在实施的审判中这种受折磨的经验是没有出路的，甚至最好的辩护都没有机会被听到一个字。

这场审判从一个熟悉的场景开始：当约瑟夫·K在睡觉时，陌生人闯进了他的房间，搅扰了他的私人安宁。搅扰者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目击者，在他周围扩大

了他们一手制造的令人痛苦的网。这个较早的情景不包括任何有关罪行、法庭的性质或它所执行的法律，尽管越来越多的新的目击者出现。看守进来了。一个主管正等着约瑟夫·K，女房东露了一下脸。住在马路对面的老太太拽着一个老头从窗前看到了发生在约瑟夫·K房间里的一切。在刚才那个主管等 K 的房间的角落里，三个年轻人不期然地出现。在马路对面的窗子后面，三个老人又出现了。“走开！”约瑟夫·K 对他喊道。他感到被伏击和包围。“多管闲事的、不通事理的讨厌鬼”，他对他的围观者说。他被羞辱的感觉在增长。那三个年轻人，他把他们看作来自业务上的挑战者。

审判在继续。约瑟夫·K 被告知要对他的行为进行调查。但那调查并没有发生并永远不会发生。预审官仅仅说了几句话，事情变得很显然，他并不是被当作约瑟夫·K，而是被认作一个油漆装饰匠。

K 作了一个讲演，分析自己的处境。这次讲演的实质，或更准确地说，其中的某些细节，并不比给他本人准备的地方要更加令人吃惊。它可以概括成这样几点：

1，K 宣称他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人。

2，K 宣布除非他自己认可，整个程序才会有意义，而他愿意在某个时刻，在出于同情的时刻才认可它。

3，K 从预审官手中拿过了一种笔记本。原指望它包含有关他的情况的材料，但是他却发现这是

一笔欠债记录。

4，K 声明："落到我头上来的，当然，仅仅是一种个别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因为我本人并不拿它当一回事，然而它却是针对其他许多人的一种典型做法。为了他们我才在这里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为了我自己。"

5，K 回忆他被捕的情况。"至于我被捕的事实，就其本身而言，简直令人可笑。虽然不必在此地谈论它。那个早晨我在床上被叫起……两个粗暴的看守强占了我隔壁的房间。即使我真的是一个危险的歹徒，也不会有比这更严密的防范措施。"K 抱怨这种行为武断专横的性质和它发生在许多目击者面前。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散布我被捕的消息，以诋毁我的名誉。"

6，最终 K 揭示了在被捕的背后，在法庭背后，站立着一个完整的机构，它的目的就在于逮捕清白无辜的人们，对他们实施愚蠢而腐败的审讯程序。于是，"无辜的人们，不能得到正当的对待，而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受到羞辱。"大厅里某人激烈地喊叫反对 K 所说的话。然而，当他结束时，K 意识到不管是对他的话产生积极还是消极反应的，在他们大衣领子上，都别着同样的徽章。只是到现在，当一切都结束时，K 才明白了他正在向他的敌人说话。"原来如此，照我看来，你们都是当官的，你们正是我刚才所抨击的贪赃枉法的人。"

当 K 知道自己被和另外的某人搞混淆之后他为什么还要参加诸如此类的活动？为什么只有在他本人认可时整个程序才会具有意义？谁是他感到要给予同情的那个人，并且这将使得他认同整个程序？为什么那位法官有着一册账本而不是正当的文件？说到底，它也许被假定为“一个大银行的襄理过着一种令人尊敬的单身汉生活，不存在任何债务。”更令人惊奇的是 K 声明他的情况是许多情况中的一个，他了解到它是作为代表和典型。到此为止，它显示了 K 已被整个事态所淹没，他已经变成一个神秘的、离奇的审讯程序的对象，而且他并不了解任何这种“针对许多人”的事实。并且为什么这个法庭审判是在一幢私人公寓中召集？为什么不是从事一桩调查，而是由 K 提供了一次起诉？为什么所有出席的人都别着一种徽章而 K 直到最后才注意到？在约瑟夫·K 发表演讲时，在洗衣女工和那个不知名的男人之间肉欲的接触意味着什么？

这是无疑的，在这个场景中，作者通过想象表现了一种自主的现实，其中许多完全是武断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事件和议论是令人咋舌的。但同时，卡夫卡将它们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武断性——或看上去是武断的，与通常引起错误解释的那些东西完全没有联系。

在柏林婚约没有解除之时，卡夫卡关于他的生活道路，可能在夜间连续工作的内省式恐惧已经显现出来。他去柏林旅馆漫长的旅程预示了约瑟夫·K 在寻找受邀前往进行那项调查的地点时的彷徨。然而与卡

夫卡不同的是，约瑟夫·K有机会在法庭上为他自己辩护。考虑到K既不知道指控的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个奇怪的法庭的本质，他的那番讲演可以看作一篇弗兰茨·卡夫卡的辩护词。

卡夫卡首先反对的是：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我不配做一个丈夫，我也不希望过我的未婚妻想要过的那种生活。因此你们的法庭是愚蠢的，而我之所以认可并屈服于它是因为我同情她。你们希望我记起我是一个负债的人，但是除了一桩债务我并不负债。（结婚的概念是作为一桩巨大的债务出现在卡夫卡的头脑中："现在已经到了制订一张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了，这就是结婚尝试。由于需要付出一笔巨大的投资，因此事实是不存在任何最微小的收益；一切都汇成一笔巨大的债务……"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作出结论道。）

卡夫卡行文中大量奇异的、梦幻般的不合逻辑，正好与他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冷静的事实描述形成对比，它们产生于直接的行为和经验与适当的想象性形式的融合，直接的经验世界和寓言世界的融合，以及将一种常见的隐喻或讽刺转变为卡夫卡式的东西。但是这两个层次的现实的结合，并不是促使卡夫卡世界诞生的惟一源泉，它的另外一个源泉是其不一致和脱节。从这个立场出发，这个看起来被讲述的故事或被理解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一种转述。如果约瑟夫·K身兼自己和卡夫卡的双重身分，K神秘的审判是他自己最个人化的"审判"的一个意象，那么在整个小说结构中保

持这种平行线是不可能的。虽然约瑟夫·K也是一个单身汉，他的职业也差不多相当于他的创造者，但是，他缺乏一种整体上的尺度——那个仅仅想着写作的第二个自我。弗兰茨·K作为一个小职员和未来的丈夫，为了这第二个自我，不懈地奋斗着，他屈服于第二个自我，也由于第二个自我的原因，他通过互相让步，放弃了终结他的“审判”的全部希望。约瑟夫·K不可能有这样第二个自我，或至少它不可能显露出来，因为这样做的话，他的创造者将泄露为何必须保守秘密，他将公开他最害怕失去的东西，他自己的私人性。因此，约瑟夫·K的处境仅仅是弗兰茨·K的真实“审判”的一个局部的隐喻。

弗兰茨·K有理由坚持他的私人性，坚持一种生活方式，于其中至少他的夜晚将全部属于他。而约瑟夫·K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东西？对弗兰茨·K说是可以解释和可以理解的，对约瑟夫·K则显得不可解释和难以理解。在弗兰茨·K感到他恐惧的起源的地方，约瑟夫·K遇到了神秘性。当弗兰茨·K力争加入别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生活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分离为两个冲突的存在。约瑟夫·K至多听那个牧师谈谈守门人和那个想进入法的大门的人的故事，他们因为各自利益的冲突而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场斗争，那个想进入法门的人，永远也不能战胜守门人；在弗兰茨·K为他的写作，为他生活的意义、为他的自由而斗争的地方，而约瑟夫·K仅仅是为了他的名誉和试图回到原先的生活而斗争——那充其量是一种有条理的和合适的生活。

弗兰茨·K 知道他的法庭和对他的起诉；约瑟夫·K 却什么也不知道，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弄清这两者。弗兰茨·K 了解他的冒犯的致命本质，因为它是争论的所在。约瑟夫·K 除了他的羞辱，其余什么都不知道，并且他试图摆脱这种羞辱。但是，正和弗兰茨·K 如果不去承担他冒犯带来的耻辱，不去以那些认可另外的价值、法的秩序的人的眼光来判断自己，便不能从中逃脱一样,约瑟夫·K 也不能幸免于他的羞辱，他羞耻的感觉。

卡夫卡不能完全把他自己从他主人公身上的那个自我中区分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小说的结论中，约瑟夫·K 看起来是承担了弗兰茨·K 所感到的某种罪过，——因为总是“经过第二十手进入生活”，并且更进一步，因为“一种不值得骄傲的结局”，尽管在最终他被赋予了看见来自法的光线的能力，一种他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寻找到的光线。

然而，《审判》的主题并不是关于罪过的。更毋宁说，它展现了主人公作为一个人被突然袭击和侵犯；他是一个牺牲品，而不是一只野兽。约瑟夫·K 没有找到自己的罪过；他寻找替自己辩护的道路。并且因为他的无辜是显然的（甚至某种指控从来没有被宣布），他主要地是寻找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能递交他的辩护，与此同时，他寻找那些可能为他递交辩护的人。

他被判处死刑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法庭是有成见的，耳聋的，难以接近的，并且它提出指控时它就不可动摇地相信自己的看法，相信被指控者是有罪

的，因此才被判刑。换句话说，“一个刽子手可以取代整个法庭。”

不管这个法庭多么神秘，不管它的法官们是如何地难以接近，它没有隐蔽任何形而上的东西在其中：它是一个人类法庭，尽管被赋予了一种无所不能的形式。那些法官们是愚蠢的、卑劣的、受贿的和令人讨厌的。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他们的机构，他们的等级制度，他们的人数，他们潜在的影响和他们不想也不能去听被指控者的辩解。“一个人到底怎样才是有罪的？说到底，我们都是人类成员，每一个人都像其他人……”但是他知道每一个人“在这场以成见反对我的程序中扮演着一个角色……我的位置因此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当他进入那场审判所发生的房间，他就屈服于这样的感情，认为他没有机会得到释放，意识到成了一场审判的受实验者，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焦虑的困扰的情感。然而，他试图更多地发现自己的罪行，找到可以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的某个人和因此能听到他自我辩护的人。但是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这种徒劳无益——事实是他知道他自我辩护的努力是不得要领的，至少部分地解释了约瑟夫·K 的突然放弃，他接受了并实际上是在等待着他的刽子手。

在弗兰茨·K 内部两个自我的斗争不可能有结局，因为它们谁也不能改变，或“没有遭到毁灭”便互相一致。然而约瑟夫·K 知道逃脱是徒劳的，在某种意义上，死亡将给他带来摆脱，而斗争的一种结果会耗费他的力量。弗兰茨·K 愿意走向被放弃的采石场并在那

儿死去，但是和约瑟夫 ·K 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他的斗争，同样也在于意识到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他人而活着，因此约瑟夫 ·K 在采石场死去时关于自己的罪行仍然一无所知，而仅仅死在一种羞辱的感情之中。“好像只有耻辱能拯救他。”

4

卡夫卡的生活似乎在这两种焦虑之间摆动：孤独的恐惧和与他人交往的恐惧，前者可以剥夺他的世界，后者则剥夺他写作的能力。他一次又一次渴望从“仅仅以惩罚告终”的孤独中逃脱。他甚至作了第三次订婚的努力，这次是和尤丽叶 · 沃里泽克，但恐怕除了急于摆脱孤独的绝望企图外，她便没有什么能吸引他了。

在差不多 38 岁上，他又一次以激情的和绝望的尝试，企图通过和他爱的一个女人生活来结束他的隔绝状态，并以婚姻充实他的生活。

他以常见的方式开始他最后的情感沟通：在麦兰和维也纳之间，弗兰茨 · 卡夫卡和密伦娜 · 雅申斯卡几乎每日都有信件来往。但是这次和他早期做法只有表面上的相似，而实际上存在很大的距离。密伦娜是卡夫卡所遇到的第一个能进入他的世界并理解他的写作的女人（她是他的翻译）；也是第一次给他提供自己丰富的世界的女人。她不仅仅像费丽丝 ·鲍尔那样，是一个“卡夫卡通过她可以和自己进行对话”的人。

但是“这个生气勃勃……同时也最优雅、勇敢和聪明的女人”，这个可以爱上他也许还可以和他生孩子的女人，就社会地位方面，就她的背景和她的年纪方面，却不同于他以前遇到过的其他女人：密伦娜是已婚的，她是捷克人，而且她比他年轻 13 岁。尽管有着这些障碍，他们的关系还是迅速发展，在通了几个星期信之后，他们在维也纳会面，并一起呆了四天，在这期间，卡夫卡显然将他的焦虑，他持续的消耗甚至他的病都置之脑后。“整天他跳上跳下，在阳光下走动，再也没有咳嗽，吃得可怕地多，睡得像一条狗。总之，他是健康的。”

他从维也纳的沉迷和转变中回到家里。突然，他强烈地决意要赢得密伦娜，和她度过自己剩下来的时光。这个总是以信件进行个人接触的人突然写道：“所有的写作似乎都是没有价值的，正如实际上它所是的那样。对我来说最好的事情也许是去维也纳，将你接过来和我在一起，或许我会这样做，即使这不是你想要的。”他准备和她私奔，将她从她丈夫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他开始计划这次会面，这回是在德国边境小镇格蒙德。但是在描述这次幽会细节的信中，那个古老的恐惧——对于密切接触，“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呆在床上”——又开始浮到表面。“把所有这些都拿去吧，我对此已经感到惊恐。”他的焦虑开始生长并引发了失眠症。在维也纳见面六个星期之后，他们两个再度会面。这是“所能发生的事情中最不幸的遭遇，”密伦娜的女儿回忆道，“一方面是朝气蓬勃、猛烈的、激情的密

伦娜，另一方面，却是生病的、谨慎的和毫无激情的卡夫卡。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在格蒙德不幸的见面之后，卡夫卡无可避免地回到了他自己的孤独状态。（“爱情是一把刀子，我用来不停地在我的伤口内转动。”）

“把我现在所做的归于我曾经做的那些事情中，你也是对的。我不能做别的，只能总是老样子和重复同样的生活。所有能改变的是我已经具有某种经验，我不再等到人们拧紧螺丝逼供才开始大声喊叫。”这种来往持续了几个月，信中充满了恐惧、自我谴责、绝望和压抑，直到卡夫卡切断了它。他彻底地转向孤独。“我很少能通得过处在孤独和交际之间的十字路口，实际上简直不能……相比而言，鲁滨逊·格鲁茨的岛是一个多么美丽和有活力的世界。”他后期的伟大作品《地洞》、《饥饿艺术家》和终结之作《城堡》,都产生于他逝世之前巨大的孤独时期。

5

卡夫卡最后一部伟大的作品《城堡》中的开头的情景和《审判》中正好相反。《审判》开始于早晨，而《城堡》开始于夜晚。约瑟夫·K是在城市他自己房间的床上被惊动的。而在《城堡》中，那个土地测量员想进入一个陌生的村庄，寻找一张床。他找到的客栈条件很差，在厅堂的地板上仅仅有一个草垫子而已，而且已经

有其他的顾客坐在上面，换句话说，根本没有私人的空间。K 是一个谦和的人，他就地躺下了，并沉入梦乡。可是没过一会儿，他被一个年轻的官员摇醒，这个官员让他出示在这儿投宿的许可证。 K 感到惊讶，从他的回答中得知，显然他并不知道自己身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对于那年轻人根本不予理睬，并且声明他是一个土地测量员，正是城堡里的伯爵本人邀请他来的。

但是 K 真的是一个测量员？在一个简短的误会之后，那个官员证实了他的身分，似乎不仅是这位官员收回自己说的话，K 本人也感到惊讶“这么说，城堡已经承认他是那个土地测量员了。从一方面来说，这对他是不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关于他的情况，城堡已经得到了详细的报告，估计到了所有可能的情况，因此，它含着微笑接受这样的挑战。然而另一方面，对他又非常有利，因为如果他的解释是对的，便是他们看轻了他的力量，而他也就拥有比他自己敢于希望的更多的行动自由。而如果他们指望以傲慢的上司的态度承认他是土地测量员来吓唬他，那他们就打错了算盘。”

摘出来的这一段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文本”，其中隐藏了许多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东西。为什么他们承认他是城堡的土地测量员却令 K 不知所措：要么他是一个测量员，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什么理由要对此惊讶。要么他伪装成一个测量员，那么为什么城堡中的某人还要接受甚至认可他的欺骗？这样的句子该怎样解释“城堡……接受了挑战……?”K 是否为了测量去过那个村庄或卷入一场斗争，如果他曾经卷人一场

斗争，那么它是关于什么方面的？最后，为什么他们承认了土地测量员身分的事实暗示了城堡傲慢的上司？

又一次，和在更早时候的作品一样，这些“不合逻辑”的东西是由两个层次的互相渗透造成的：直接经验的层次和由潜在经验转换来的想象的层次。

K作为他所不是的某个人出场。（这儿，情形又如在《审判》中的相反，在那儿，只有法庭相信约瑟夫·K是他实际上并不是的某个人。）他在村庄里从未测量过什么。他没有工具。他和他的助手交谈，但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甚至无意识说出一句话有关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是他这样做是想给别人造成关于自己身分的错误印象。K根本没有来这个村庄进行测量，但是来战斗过；某人正在等待着K,他不是作为土地测量员，而是作为一个对手，并且对方带着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和微笑，正是这些优越感吸引了他。这个对手，后来表明，是一个卡夫卡称之为克拉姆的官员——Klam在捷克文中意味着“欺骗”。然而为什么，城堡的这个更高职位的人对K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如果K考虑到他的对手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这显然指向这个事实，即被期待的斗争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斗争，同时也将发生在另外一个层次上。更进一步，K关于他对手的优越感的假设指出，他已经知道他和谁形成冲突。

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位测量员斗争的目标？为什么他长途跋涉来到这么一个迷离陌生的地方加入他的战斗？

故事开头的场景揭示了K决心战斗的目标。K

即将为他摆脱孤独而战，为获得一个在人们当中的位置而战，为证明他自己能够与人交往而战。显然这是K想达到的：找到和别人一起生活的勇气，找到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的勇气，通过分享和他人的亲密关系来战胜他的焦虑，去建立一个家庭，去完成他自己的生命，并由此而进入生活法则。

正像《在流放地》和《城堡》的灵感来源于他和费丽丝·鲍尔的婚约，《城堡》的写作冲动来源于和密伦娜·雅申斯卡失败爱情的痛苦经验，这是卡夫卡的生命中“最强烈、最深刻和最天翻地覆的经验”。

然而，前两部作品的主人公仅仅是想摆脱自己命运和挽回自己生命的牺牲品，而《城堡》的主人公是从相反的意图开始其故事的：他打破他隔绝的囚牢，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战胜阻止他进入城堡的樊篱。

也正和约瑟夫·K命中注定要完成那场审判，要徒劳地寻找有罪的证据、法庭和一种辩护一样，对土地测量员K来说，则命中注定要完成他徒劳的但却是决意要进入城堡的尝试，或至少要和权威人物克拉姆说话。

K带着他和自己命运作斗争的企图进入故事，因此在他的行为中拥有在卡夫卡作品的早期人物身上所缺乏的某些素质。他甚至制定出一种抵达城堡的策略。这显然会出现两种结局——作为普通的村民而做一个劳动者，或相反，成为某个旁观的人物，甚至高踞于他人之上，但后者完全处于城堡的支配之下和惹城堡不高兴，于是，他将选择作为劳动者的身分。“如果他希望在城堡之内获得成功，便仅仅作为村子里的一

名劳动者，尽可能远离城堡的势力范围。”他期望能接近村民，因为“这样一切道路都会向他打开。”K 指望在同城堡官员的斗争中取胜，因为“像他们这样严密完备的组织，他们所做的就是维护那些远距离的不可见的老爷们的同样遥远而不可见的利益，而 K 则为他自身，为了切近他根本利益的东西而奋斗，并且，至少于最初时，他要赢得主动权，因为他是一个进攻者。”

带着这种日益增长的决心，K 试图会见那个显然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人，他企盼和对方的会面是他将经历一种自由的时刻……“看到我的言词对他产生影响这将令我满意，并且如果它们不产生影响，或者被愚蠢地忽视，无论如何，我也将为自由地和一位大人物谈话而感到心满意足。”然而，与此同时，他却怀疑这种相遇——像外表上看起来的那么不可能——是否能转变他的命运，或者决定他奋斗的结局。

这本书中最有力的场面之一是 K 决定在乡村的一间小酒馆里等待克拉姆，在那儿为克拉姆返回城堡准备好了雪橇。但是克拉姆无心会见 K。当 K 拒绝服从一个下级官员反复要求他离开乡村的时候，那个赶车人不得不再次从雪橇上把马匹解下来，但是 K 继续等待。他感到“好像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人也和他断绝了联系；在这个对他来说通常是被禁止的地方等待，他仿佛也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以前几乎没有人得到过这种自由。现在好像没有人可以碰他或赶他走;但是——这种想法也和上面的同样强烈——再也没有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以及这种不受侵犯更毫无

意义和绝无希望的了。”

然而，那个令 K 只能从一个小孔中瞥一眼的有权者克拉姆，看起来并不是惟一事先知道 K 的到来和决定 K 将永远不被城堡所接纳的人。那个酒吧女招待弗丽达也似乎一直在等着 K。用他的话来说，她仅仅认识他刚半小时，他不可能告诉她关于自己的任何事情，弗丽达却回答：“噢，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你是那个土地测量员。”在这之前一直是克拉姆情妇的弗丽达，立刻接受了他的邀请，在用一根鞭子赶走了那些酒巴的老主顾之后，便与 K 做爱。

当 K 取得和弗丽达联盟之后，他的失败便开始了，包括他争取控制自己命运的徒劳绝望的努力，冲破自身闭塞的企图，包括从越来越变得像是致命诅咒的异化、孤绝的经验中解放出来的尝试。性爱这种行为激起了错综复杂的和矛盾的感情。它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安静的和私人性的地方，在床上或哪怕是一个独立的房间，而是酒巴的地板上，“在积着残酒的小坑和其它聚集在地板上的垃圾当中，”而当这种结合完成之时，K“感到自己迷了路，或者误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比人类曾经误入的任何国度都更远，这是一个如此奇异的国度，连空气也完全同于他自己的故乡，在那儿，一个人可能因为这种奇异而死去，但是它又如此富有魅力，乃至一个人只有继续和更加遥远地自我迷失”。

这个外乡人 K，至少在开头还拥有某些尊严和独立的地位，但很快变成村庄中的被驱逐者，最终弗丽达也离开了他。

卡夫卡和密伦娜关系的结局，与土地测量员 K 和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之间的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使得出版者马克斯·布洛德得出结论道：

> 在《城堡》中我们发现卡夫卡和密伦娜之间关系的奇怪而被怀疑和贬低的反映……密伦娜，作为“弗丽达”在小说中最高度漫画化了的形式，采取了拯救卡夫卡(K）的步骤，她和他做爱，她为他在贫穷和自我否定但仍然是快乐和有决心中创造了一种家庭气氛。她想永远属于他，并以这种方式把他带到人群中去和带到真实生活的直接性中去。但是当 K 开始同意并接过伸出的手时，她以往生活中的联系对她产生了影响（《城堡》中，她卑贱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尤其是和神秘的克拉姆先生的关系，后者建立在夸大自负如恶魔般的幽灵的密伦娜丈夫恩耐斯特·波拉克的基础之上，对于他，密伦娜从未放弃过），虔诚地渴求幸福很快走到了尽头，不是因为 K 的半心半意和不想让弗丽达做他的妻子，或者因为他本人……而是她背叛了他，她又回到城堡所属的范围中去，回到她从中而来的领土中去……

（卡夫卡的确将某种东西归因于波拉克的一种优越性“她是生气勃勃的，”他给布洛德写道“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种类型，而尽管这一切仅仅都是为了他而燃烧……但是他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能

够内在地激发她。”

然而，布洛德所指出的联系过于直接了，并且忽视了卡夫卡将自己的经验转换成一个故事的想象性结构所采取的手段的复杂性。

从对卡夫卡本人及其他和密伦娜的关系的了解来看，如果想要贬低她表达这种关系或因其迅速恶化而发出抱怨，显然离卡夫卡还远着呢。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将任何东西带进他的生活而达到一个满意的结局——而爱情关系是最不能达到的那种——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他不可能因为这种关系的失败结果去抱怨自己。在格蒙德那次不幸的、致命的相遇之后他写给密伦娜的信便是这种证明。

《城堡》的目的并不在表现他和一个女人之间否定性的图景，而是返回到卡夫卡伟大的主题——与命运的斗争。卡夫卡（在和密伦娜的情况下）意识到（和他的主人公一道，那个土地测量员也意识到）和行刑机器之间的斗争，和神秘的法庭、城堡及在婚姻面前进退两难的困境的斗争，其主要的障碍不是外在的敌人，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主人公自身的软弱，他无力跨过他自己设立的门槛，他无力劝说别人的“我”允许他进入他认为是一种不能遏制的激情源泉的地方。

土地测量员K和约瑟夫·K所共同的这种奇怪的、游移不定的软弱，在小说的开头，即当土地测量员仍然似乎充满战斗的决心时就已显露。被弗丽达抛弃之后，土地测量员继续从事他的希望被城堡所接纳的斗争。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之后，他鼓起勇气去小酒

店去见给他带来某些消息的那位官员。但是土地测量员犯了一个错误，他进错了门。那个官员布吉尔，请他进来并逐渐揭露了不光是城堡的官僚作风的秘密，同样还有土地测量员的斗争的秘密，这种斗争存在着一些“机会，碰到这种机会，仅凭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信任的手势，便能获得比耗尽终生努力还要大的成绩”。原本是讨论官僚作风的某个场景，显然越来越变成讨论爱情的某个场景，最终残余的官方语言仅仅是对其实质的一种冒充的伪装：在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要求方面，这里并没有太多的软弱。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能保持它的平衡的原因。

当布洛德将《审判》和《城堡》进行比较，指出它们是由两种主要的但却是相反的原则所制约的寓言——正义和宽恕——时，看起来他也许犯了错误。《城堡》，远远不是一部关于宽恕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迷失被滥用的宽恕、一种错过的机会及一种失败的小说。

和约瑟夫·K不一样的是，土地测量员自愿地和他的斗争为伴，并且因此他知道他的失败，他的有罪。那么，他怎么能够不受惩罚呢？事实是他所得到的惩罚比给予约瑟夫·K的更为残酷。后者死在他从未寻找过、但是偶然瞥见的光亮照耀下。土地测量员K以虽然追求过、但却从未获准见到那种光亮而结束他的斗争。

6

卡夫卡的生活充满令人受尽折磨和无法解决的冲突，这一最个性化的经验，刺激了他创造的动力。但是，那些有关行刑机器、无所不能的法庭、神秘的审判或者城堡的意象，如果抽掉了它们的艺术真实性，或否定它们和人类、社会环境的联系，将变得难以解释。相反，这种来自卡夫卡经历的生活真实使得他能够去揭示生活复杂多样的层次；存在于他经验中的矛盾也全部隐藏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自然，《在流放地》的意义不可能被局限为卡夫卡试图订婚的一个寓言。它仅仅是卡夫卡经历失去自由的体验——一种对多数新郎来说熟悉的经验，带着那种强度，促使他以将被定死罪的人放在一种行刑机器的床上的这种恐怖意象来表达他的情感。至于费丽丝，她仅仅是按传统和世俗的眼光期待他，而他意识到了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矛盾。对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将和惯例常规、社会的普遍赞同取得一致，而人自己的良心，他对于别的东西的要求则被视作致命性的东西而遭放弃。而从这种认同到那个军官的形象之间，即那行刑机器狂热的执行者只有一步之遥，到那个他坚信不移地服务于热爱和维护的机器，在它身边他预备诚实地死去的那个机器之间也只有一步之遥，并且从这种认同到那个法庭——不管它是多么卑鄙、腐败、恶劣和杀气腾腾，但却

能自视或普遍地被视作理所当然甚至正义的机构，这中间也只有一步之遥。

卡夫卡将生活中经历的失败看作绝对的。然而大多数人都能为他们的失败找到借口，并且倾向于相信他们可以中断他们已经进入的斗争，离开他们已经卷入的那场诉讼，不去做一个情人、丈夫、妻子、父亲，不再感到有罪，而卡夫卡知道从他进入他的审判或斗争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可能从中逃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停下来，一旦开始，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中逃离。一个过程一旦发生，它将在我们、我们的意识外部进行。这是一种基本的人类处境；卡夫卡仅仅以绝对的方式经历了它，于是也按这种方式去解读它。

因此，卡夫卡的大多数意象具有预言般的真实性和普遍的意义，但这不是特意安排的，不是因为他服从于这个目的而发明和构思了它们（像许多他的模仿者那样），而是因为他直接地、深入地、毫无保留地和不屈不挠地经历了这些冲突；因而他所进入的每种处境具有内在的普遍性。从这种经验中所产生的意象是如此有力，在外表上如此远离它们原初的刺激，以至于最初刺激的可见性乃至其意义常常是被隐匿的。

卡夫卡从两方面汲取这些意象：一方面，是传统来源——动物学或古典神话；而另一方面，即主要的，是从当代世界，从他自己的直接经验中。因此，在他的写作中，显现一种神话的形式。现代政府机关、法庭、机器、法律，更重要的，是那种不仅具备作者个人的素质，而且也具有现代世界中大多数人普遍的性格特点的主

人公；孤独，一种在权力的摆布之下，既替它服务又不可避免地向往自由的感情，同时还有在上帝被逐出之后，或至少拿不准如何称呼这件事，一种向往法和秩序，感到承受持续的威胁或异化这样一个世界的终极状态。

于是一种新的富有想象力的甚至是神话的现实诞生了，它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含义。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不仅对卡夫卡作品的解释带来某种限定，而且也有助于在其本来的精神上估价卡夫卡的作品，而不是把它归结为几乎不可掌握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归结为对于世界的一种解释。用最重要的捷克文学批评家瓦克拉夫·科尼的话来说；“神话照亮了现实……但是并不解释现实，因为它无法满足理性阐述的需要，并且它并不从任何原因推演出结论……简言之，哲学和科学是回答由理性提出的问题，而神话和艺术并不回答问题，而是一束束经验。生活是比提出和作出结论更为前在和基本的东西。”

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诉讼，从外在于我们的不合理的裁决转向那种不可避免的裁决。

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

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和真理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最个人的最后的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

在将外部目标认作最高东西的一个世界上，在人们消失在自己的所作所为和革命纪元的巨大的阴影之中，卡夫卡是作为一种专注偏执的人出现的。和历史的风云激荡比较起来，卡夫卡提供的经验是微不足道的。和丰富多样的生活比较起来，他所描绘的图像是微型的和苍白无力的，而当有人相信他找到了回答宇宙意义的问题时，卡夫卡的主人公们徒劳地想要回答最普通的问题、想要超越他们的生活空间，似乎显得太真实了。但是这正是卡夫卡通过现代人的最基本的经验和情感取得自己道路的方式。

被强迫导向外部的文学，大部分是站不住的，它把读者的注意力固定在外在目标上，于是激起了虚假的希望和表面的绝望。在卡夫卡的世界中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它有着非常内在的视角。像在真实世界中的人们那样，卡夫卡世界中的人们直到折磨来临之前始终过着外表上看是非常宁静有序的生活。而这一刻也许是由命运选中的，也许是由某人自己的决定所导致的，但是总是带来与世界的一场冲突——和他人的一场冲突。陌生人包围了卡尔·罗斯曼、在流放地中被判死刑的士兵、土地测量员 K，他们都经过审查，被挡住

去路，都要递送信件和备忘录，作出关于生命或外部自由决定；对于爱情、绝望和性，他们都是一些旁观者。在他们身上既没有恨也没有爱也没有同情。在他们身上生和死相遇并且混合在一起，正如在《城堡》中“生命和使命是……这样交错在一起，有时让人想到他们交换了地方。”而那个官方机构，那个法庭、城堡都是这种地方——和经验相配合——它们具体展示了异化的含义，展示了摆在人们面前不可逾越的沟壑。

卡夫卡的主人公们移到了一个空间，于其中不再有冲突发生，于其中甚至亲密的人也变成了敌人，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有意义的行为。像被否定了行动的可能性的每个人一样，这些主人公们都处于权力的摆布之下，而权力必然以敌意的方式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既不能对其施加影响也不可能去理解。这样一个人生活在焦虑和怀疑之中，生活在他周围的世界和他自己生活意义的变化无常之中，以及对他自己生活的忧虑之中。生活的意义，它的确凿性，正在不断减少，正越来越缩减为私人范围，一直到作为私人性的独一无二的象征——自由或个人私密性最后的空间——那张床也被撤走。而这是由未被邀请的奉命前来的役使所完成的，他们未曾卷入并毫不相干，目的是为了亵渎那张床，是为了剥夺主人公最后的藏身之地，是为了将他拖出去，置身于寒冷中，在另外一些同样是陌生的毫不相干的用刀子刺入他的心脏之前，把他折腾一番。

尽管很多人将卡夫卡的努力归结为最高的形而上的目标，但他的主人公，说到底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主人

公。这是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那更高意义的权力，已经由传统惯例、法律形态以及官僚主义机构支配的空洞权力所取代，即由人所建立的制度所取代。比起为争取自由和地位而被剥夺了所有手段和武器的人，那些具有心灵自由空间的人，则比他们更充满希望。无论周围的世界将他看得怎样顽固和愚蠢，“至少可以在一位权势者面前自由地说话，”至少他可以自由地表现出自己的真实面貌。无论多么困难，无论是否面临死刑的结局，而真实地生活，完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并为之进行不懈地斗争，至少让一线光亮进入生活，那是由法所发出的永恒之光。说到底，对于土地测量员来说，这就是生活或斗争的意义。

正像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是人类历史英雄时代的一个神话一样，约瑟夫·K和土地测量员的故事则属于现代人类历史中没有英雄时代的神话。也正同普罗米修斯如果没有献身与受难，没有拒绝别人有损于他尊严的同情便不是英雄一样，如果没有弗兰茨。卡夫卡全部的牺牲和受难，也将没有躺在行刑机器床上的囚犯、约瑟夫·K或土地测量员 K 的非英雄的故事。只有那个愿意让自己铐在岩石上、并将自己的内脏贡献出来喂鹰的人，才能提供火来照亮人类穿过黑暗的道路。

1983 年

译 后 记

帅克的爸爸对他儿子帅克及其伙伴的描写满怀深情，而又毫不留情。这是发生在拘留营里的一幕。身患严重风湿症又一心要为国效劳（天晓得！）的帅克被当作装病逃避兵役送到了这个地方。“好，把什么都脱掉，只剩下背心小裤衩，到第十六号牢去。”在十六号牢里,帅克看见 20 个人都穿着背心小裤衩。而要是他们的背心小裤衩不脏，要是窗口没有铁栅栏，一眼看去你会以为是置身于一间游泳场的更衣室。“明天有场把戏看。有人带咱们去教堂听道理。咱们穿背心小裤衩的只能紧贴着讲坛下面站着。简直笑死人了。”第二天，那位将脚后跟的马扎子蹬得铿然作响的神甫果然劲头十足地登场了。 20 名穿背心小裤衩的光明天使在台下和善地望着他。“我赞成把你们这群人全枪毙掉，你们这群废料。”“你们应当先忙着追求天主，虱子

回去再摸也不晚。”新的表演弥撒开始后，与会的教众微笑地欣赏他们的神甫如何反穿着祭衣，如何不动声色地把整句整句的经文都念乱了。并且实际上把这天的节日也搞错了。这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一名“新出壳的基督徒”吗？不仅如此。“他喝醉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进一步阐述这些场景所包含的意义，一切都在其中了。令人惊讶的这是怎样一位奇特的作者，他是怎样毫不费力、接二连三地弄出这种随随便便的笑话？极有耐心甚至是精雕细琢出这些乱七八糟的场面？要不他本人如同帅克一样“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要不他是从许许多多这种“穿背心小裤衩的光明天使”中提炼出来的富有智慧的人？在昆德拉的那本《被背叛的遗嘱》中，我感到至为遗憾的事情之一是他对自己本民族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哈谢克只字未提。要说幽默，中欧这个地区用捷克语写作的这位先生真是太够格了，几乎有点过头了。当然因为他写的恰好是一位小人物，发生在帅克身上每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便又显得那么合情合理。

人们经常提到的是另外一位布拉格作家，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这两个人表面上相差如此之大乃至无法将他们相提并论，而实际上，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个时期，从同一个时代中汲取营养：两人的出生日期只相差几个星期，去世的时间也相距不到一年，在相隔仅仅几条街道的地方他们度过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当然，他们的确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典范：哈谢克，一个醉鬼，无政府主义者，美食家、嘲笑自己的职业

和责任的人，在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写作，为了一点啤酒就地把自己的作品卖掉；而卡夫卡，一个素食主义者，绝对戒酒和自我专注的苦行僧，如此着迷于他自己的责任、使命及自身缺陷，活着的时候竟不敢出版自己的大部分作品。后来的布拉格人理所当然地同时接受了这两份礼物，他们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和以幽默来面对暴力及整个儿是消极的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就我接触的几位布拉格当代作家哈瑞伯（1914—1997）、哈韦尔（1936— ）、斯可沃瑞斯基（1924— ）而言，他们更像是骨子里都是卡夫卡，都是那么认真和执着，而在外表上看起来多少都有些帅克的味道。

“悖谬”，本书作者当代另一位享有广泛国际声誉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如此称呼这种现象。这些作家身上和他们之间体现出来的悖谬是从这座城市的悖谬精神中生长出来的，而这座城市的悖谬精神则是从它自身的历史中生长出来。在近300多年的时期内，这座有着迷人魅力的中欧城市屡遭侵犯，屡次被占领、解放、又占领，互相对立的东西在这里来回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意志被引向不同的目标，旧的统治者和新的统治者之间使用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把所有阶层的人们带往不知何处，形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布拉格布满了悖谬”，克里玛道。它布满了教堂（被誉为“有着一百个塔尖的城市”），但实际上基督徒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它为自己拥有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及拥有相当数量的文化名人而

自豪，但这里的人们同时那么轻视学问和厌恶“精英”。最能把悖谬的精神集于一身的是这座城市最权威的建筑物——那座城堡，总统所在地。从奥匈帝国崩溃以后建立的第一共和国（1918）开始，九位前任总统，有四个坐了三年以上的牢；第五个在牢里度过了不长时间，而另外一个（也许更容易遗忘，因为大部分他在任期间和纳粹占领期相重合）死在狱中；后来三位之所以免遭牢狱和行刑之苦，仅仅因为他们逃到了国外。“在监狱和王室城堡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奇特和悖谬！”

再三落入敌人手中的城市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从反复沦丧的地区是否能发展出某种积极的东西？这取决于这座城市人民的素质。他们若不是大批地趋炎附势，不轻易地丧失自己的人格，统治者或占领军的代理人本身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不能得到人民真心拥护的胜利有什么可夸耀的？克里玛在1994年出版的他的这本论文、随笔集《布拉格精神》中指出，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大城市，布拉格的另一特色是她不夸张。在市中心你不会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那儿的确有许多宫殿，尽管里面也同样富丽堂皇，但却有着一个毫不起眼的外表，表面上几乎像军队的营房。上个世纪末，布拉格人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它的原件要缩小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幽默的讽刺挖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喘息期间，他们建了许多学校和医院，却没有造一座辉煌宏伟的议会厅，她的邻居维也纳、布达佩斯等都那样做了，可她对此一声不吭。1955

年，有人树立了巨大的斯大林纪念碑，可 7 年以后，正是这些人他们自己又把它推翻了。一种比例感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来。捷克生活从不追求夸张卖弄、胡诌乱吹，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性狂欢、娱乐场或大型军事游行。这个地区的人们更倾向于日常生活、市场、季节性节日和简朴的舞蹈。对那些扎眼的、耀武扬威的东西他们本能地感到厌恶。

卡夫卡在他写于 1914 年 8 月 2 日的日记中只有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将重要的世界崩溃的事件和无关紧要的细节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在旁人看来，总是有些奇特，而它不仅是理解卡夫卡全部作品的一把钥匙，实际上也触及了这个城市的秘密和核心，它扎根于这个城市的命运之中：一方面，欧洲的战争很少有不影响到布拉格这个地区的，欧洲的危机和风暴尤其会造成这个地区的灾难和沦丧，而另一方面，处于危机中的人们仍然过着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视日常生活和私人性领域为最后的藏身之地和避难所，这是他们自我保护和蔑视强权的一种方式。这仿佛在说：我有权不加入你们这些侵犯者的行列，不以任何一种方式增添耀武扬威者的威仪，我也用不着学你们那种腔调和语言说话。用卡夫卡口吻来说：“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克里玛在指出卡夫卡灵感的源泉，分析他的这位布拉格前辈如何从完全是个危机（出于捍卫个人写作的自由而对婚姻的恐惧）中产生出他的全部作品后总结道：“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

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

此刻我想起人们更为熟悉的那位捷克作家伏契克在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段描述。直到几年前，我才突然理解了它们。伏契克谈到一次他被提审时从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穿过城里所见到的情景：“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人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快乐，带着他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蒋承俊译。）

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现任捷克总统的哈韦尔，在他一度身陷囹圄时说的一句话也曾如此深深地打动了我:“信仰生活，也许。”

伊凡·克里玛，对国内读者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冯亦代先生在 1995 年第 8 期《读书》上曾介绍过他的一本新作《等待光明，等待黑暗》。他生于 1931 年，父亲和母亲都来自犹太人家庭。母亲的犹太人背景有些特殊。17 世纪，波希米亚这个地区只允许两种宗教——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许多新教教会不得不通知他们的教徒宁愿采用犹太人的信仰以利保存。当那个时代结束后，原来的新教教徒已经变成犹太教徒。实际上，克里玛的母亲一直自视为一名捷克人，为自己的福音派祖先感到骄傲。但这些并没有使得这个犹太人色彩非常淡薄的家庭（克里玛的父亲是位电机工程师，相信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新的未来），能够摆脱纳粹集中营的厄运。1941 年底，10 岁的小克里玛和 3 岁的弟弟随同父母来到泰里茨（Terezín）集中营，在那里一直呆到苏军到来。在这段对人来说是观察和体验世界最强烈的年龄于牢房中度过，给了克里玛不同寻常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后来反复强调这一点。那是一种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有的刻骨铭心的经验。他的所有朋友——每一个男孩和女孩——全都进了毒气室，惟一剩下来的一位，集中营囚犯自我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儿子阿瑞尔，12 岁时死在枪口之下。人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灵车上面高高地堆着那

些额外的尚未油漆的棺木，人们推着和拖着它们，许多人自己也很快在这样的车子上面告终。每天在大门口，我读着那些不能再活着看到早晨的长长的人们的名单……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僵硬的胳臂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于是，作为一名 14 岁的孩子，刚出狱时，他被一种狂喜的经验抓住，如此着迷于复仇的思想，紧张屏息地聆听广播中宣布的当时那些重大审判，欣喜地数着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死刑的人，这种情况没什么奇怪的，他和周围的大多数人的没什么两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日后渐渐增加的另外一些经验，他的视角产生了变化：剥夺别人生命和自由的人是可恶的和不能容忍的，然而从被剥夺的人的经历中也许并非必然生长出真理和正义：因为极端的经验可能使人们的判断力发生倾斜。以一种脱节的立场，一种边缘的眼光，这个世界要比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有所不同，实际上要复杂、具体得多。而如果仅仅从“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我们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它们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不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很可能因为身处另一极端，重新犯下由极端和狂热所导致的错误：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打着“拯救”旗号的种种狂热的学说，有的是需要牺牲人民的利益至少是部分人民利益的各种借口。这样一种深远的眼

光，对于有着种种相似经验的中国人来说，是可敬佩的。

在那种极端境遇中人们损失的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些。克里玛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来说明。在被关押的人们中间，除了有已经被称赞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以外，还存在经常发生的偷盗行为。在面条生产车间的人偷带一小块擀面团，在菜园劳动的妇女夹带一些蔬菜，而这些都是从其他被关押的人们身上弄走的。克里玛自己和一个伙伴有次则得以进入一间贮藏室，里面放着党卫军从别的囚犯那里偷来的行李，他拿走了整整一只箱子，乃至若干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成功的经验带来的强烈感受。这当然可以被解释为贫困和饥饿。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侵犯者的仇恨，但是，这样一种事实也是不可回避的：当一种犯罪的制度是被允许的，当某些人可以高踞于其他人之上为所欲为，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平也势必受到影响，另外一些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便被视作理所当然。在一种普遍的虚无的情境中，很难有人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实际上，为了生存，人们或多或少地以某种可怕的也是不自觉的方式与之共谋。这就更加深化了他们的危机，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性。当占领军于寂静的黎明时分突然尖叫，点着火把、敲响他们的锅盖和头盔时，许多人也在这一刻被恐惧所吞噬，从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意志，他们的灵魂。此后即便他们有可能从占领军手中重新夺回权力，从占领军的摆布中解脱出来，但很难说他们必然从那种曾经落到自己头上的恐惧经验中

解脱出来。旧的恐惧会产生新的恐惧，新的统治者“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因为这些人尽管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身仍然为恐惧所驱赶”。那么，那些从外到内都被剥夺的人们怎么办？如何摆脱这个窒息人的怪圈？首先摆脱从根本上是来自内在而不是外在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他能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克里玛这么说，屡遭侵犯而又始终保持正直的布拉格人这么说。